

K250.6
31
2:14

革命史資料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四·北京



213150

革命史资料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限国内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9号)
清华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7 字数: 150,000
印数: 1—9000册 定价: 1.20元
统一书号: 11224·151

目 录

少奇同志在淮南抗日根据地

 开创前后作的几次指示周骏鸣(1)

回忆兆麟金伯文(8)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喻杰(32)

延安南区合作社简史多田正子(51)

塞上风云

 ——回忆邓宝珊部十一旅起义始末贺晋年(68)

帮助卫立煌部脱险周长胜(85)

蒋家狱中四百天见闻季焕麟(89)

八路军山东纵队组建前后王彬(124)

回忆第六十七军参加会攻太原韩伟(142)

三一八惨案和中共北方区委冉廷栋(151)

回忆李汉俊老师夏之栩(176)

湖北省委讨论过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

.....袁溥之(183)

怀念拔哥黄美伦(186)

韦拔群同志被害经过陈欣德(194)

人 物

几番蹉跎志愈坚

——回忆许权中烈士生平李 果(198)

阿金在舟山

——金维映同志早期革命斗争事略

.....车鸿云(215)

少奇同志在淮南抗日根据地 开创前后作的几次指示

周 骏 鸣

刘少奇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到达安徽省定远县大桥镇的。他当时是中原局书记，化名胡服。大桥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当时以原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为基础改编的五支队刚成立不久。江北指挥部主要是指挥新四军四支队和五支队。五支队司令员是罗炳辉同志，我任副司令员。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少奇同志。

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到一九四〇年七月中旬，少奇同志在淮南地区前后七个多月，作过许多指示，对我们认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王明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项英的精兵主义思想（项英说“兵在精不在多，兵多了没有饭吃，会破坏统一战线”）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部队的发展和淮南根据地的开创，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年代虽然久远了，但有几点在我心中仍留着深刻的印象。

抗战要有枪杆子 抗战还要有个家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新四军四支队（包括从桐柏山游击队改



一九四二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左起：张树才、刘顺元、方毅、张爱萍、张云逸、陈毅、宋文（蹲者）、罗炳辉、杨梅生、龙潜、周骏鸣。

编的第八团)从大别山区进到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五县之间的抗日前线。当时南京已经失守，国民党向江北溃退时，沿途丢弃的大批枪支散落在民间，江北沿江各县的国民党党政负责人大多在敌人到来之前就逃跑了，土豪劣绅和土匪帮会势力趁机实行封建割据，设卡收税，大发国难财，搞得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高潮，许多青壮年来到部队驻地，要求参军。但当时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和项英的精兵主义，把大批要求抗日保家救国的人们关在大门之外，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扩大。大别山是鄂豫皖老革命根据地，可是我们原来驻在大别山的新四军四支队开走了，没有建立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不发给我们抗经费，只好靠募捐，打汉奸、打“资敌”（“资敌”指到敌占区做生意，在经济上资助敌人的人）过日子。部队连每天每人五分钱菜金也不能保证。正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少奇同志来了。他问指挥部领导同志：“抗战怎么不知道要枪杆子呀？抗战还要一个家嘛！给人家做苦力（指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扩军、巩固政权），出力不讨好，最后把你们赶出来，打你们几个耳光，再踢上你们几脚，还骂你们几个‘丢那妈’（广东骂人语），有的甚至被抓起来坐牢或处死。”这段话非常中肯。少奇同志很快召集了干部大会，传达党中央六中全会的指示，要我们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迅猛扩大抗日力量，不要因怕破坏统一战线而不敢发展，不能被统一战线捆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听了传达之后，好象拨开了云雾，有了明确的方向。仅三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由四千多人发展到近万人。顽固派看到这种情况，就红了眼，但也不敢公开打出反共的大旗，于是不宣而战的摩擦就开始了。

不要怕摩擦 要坚决反摩擦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龟缩在大别山的桂顽李品仙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密谋对我东西夹击。当时我同另一个同志到了江北指挥部。一天，少奇同志把我们找去说：“赶快回去，准备反摩擦。”怕我们不能很好理解中央的意图，他又补充说：“不要怕摩擦，而要反摩擦。要在摩擦中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要在反摩擦中建立自己的家。顽固派一定要摩，那就以摩反摩；非摩不可。坚决地摩，不摩就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他的话非常坚决而有信心。我们立即骑上骡子赶回路东。回到路东不久，果然路西的摩擦战就开始了。桂顽大举向我路西部队进攻，我们在路东的主力 and 苏皖支队均调到路西。韩德勤乘我主力调到路西之机，以超过我十倍的兵力向我五支队司令部附近半塔集教导大队进攻。因师出无名，士兵也不愿打新四军，他的部队进到半塔集东门外一个乱坟地里，就卧倒向半塔集开枪，乱放一通。这实际上等于向我教导大队通消息。当时教导大队正在西山上出操，听到枪声，才从操场上飞跑回来。半塔集被韩德勤的部队包围了三面，如果他们在山上用火力的掩护，一个冲锋即可冲进半塔集。但占山之后，士兵都趴下不动了，顽固派军官用棍子打，士兵就是不动，结果围了七八天，也没有进入半塔集。路西战斗结束后，张云逸副军长和罗炳辉司令员回师路东。苏北挺进纵队叶飞副司令员率领四个营增援半塔集，这时顽固派官兵都象穿了“兔子鞋”，一天一夜就跑过了三河以北。这样，我们很快建立了天长、盱眙、来安、嘉山、六合、高邮、仪征、甘

泉八个不完整县的政权。路西发展也很快。路东路西都建立了联防司令部。少奇同志说的话实现了：“抗战还要有个家嘛！这个家叫淮南抗日根据地。”

今天向你们讲老实话

反摩擦战斗胜利了，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我们进行抗战有了自己的家，少奇同志当然很高兴，整个淮南根据地的军民都很高兴。有一天，少奇同志说：“今天可以向你们讲老实话了。当我初来到大桥时，感觉很不好办，你们的兵少，只有四五百人。我有什么办法？有了扩大部队最好的时机，你们没有扩大部队，最好的抗日根据地——大别山老苏区这个家，你们让给人家了。”听了这番话，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党中央三令五申指示项英，要他把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开到江北来。可是项英一直不听，而执行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以至在皖南事变中，九千多人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如果项英遵照中央指示，率部队开到江北，把军部安在群众基础最好的大别山老根据地的中心，就可避免这个惨重的损失。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京之后，经合肥和舒城、桐城公路向武汉进攻时，沿途国民党军队和县政府都跑了，地方处于无政府状态，混乱不堪，正是我们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最好机会。如果当时不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束缚，在平汉铁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东至海边，这个广大而富饶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二十几万到三十多万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一来，华东的抗日局面就大不相同了。这个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一下。

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要多做伪军工作

反摩擦战斗胜利后，我们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因为有了家，抗日的积极性更高了，经常袭击鬼子和伪军据点，破坏津浦铁路。我们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说：“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鬼子要安据点，不让它安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力量还达不到，要多做伪军工作。”如果不是少奇同志这个正确指示，我们经常搞袭击，威胁南京的安全，妨碍津浦路通车，就会逼着敌人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打封锁墙，甚至加铁丝网，增设据点。那就会使路西路东两个根据地隔离开来。路东根据地三面靠水，不能徒涉，西面靠津浦铁路，这种天然地形很容易被封锁。那就真象少奇同志所说的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可以肯定地说，二师的师部及以后新四军的军部，就不可能在黄花塘一个小村庄上，盖上平房住到抗战胜利；大柳郢盖的医院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使很多伤病员得到治愈，使很多医务干部得到培训。这样的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是不多的。这是执行了少奇同志“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要多做伪军工作”指示的结果。

变分兵把口为集中力量歼灭敌人

根据地刚刚建立时，地方武装尚未健全起来，顽固派对我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他们分散成很多小股，袭击和侵占我尚未巩

固的根据地，使我防不胜防。当时我们采取分兵把口的办法保卫根据地，结果每天挨打造成伤亡。根据地不断缩小。少奇同志指示说：“要把分兵把口变为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不要怕根据地丧失，没有失就没有得。中国有句老话，叫‘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要集中力量一个一个歼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结果很快把顽固派蚕食阴谋粉碎了，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部队。

我对少奇同志的认识

少奇同志在抗战时期出去工作没有带多少人马，经常是带一个秘书，两个警卫员，一匹马，穿一身灰布衣服，戴一顶八角帽，同普通战士一样，谁也看不出来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由延安党中央到华北，由华北到华中，由华中到华东，由华东到山东，由山东回延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辛勤工作，功绩是卓著的，是不能忘记的。少奇同志从不要什么“秀才”班子，也不带多少人马保卫他，看起来他不太忙，经常可以看到他读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著作，或同干部谈话。可他走到一个地方就能把这个地方的工作搞好。

少奇同志善于深入浅出，根据每个人的水平来解决问题。他常说：“讲话是给人家听的，写文章是给人家看的，首先要使人家能听得懂，看得懂。如果人家听不懂，看不懂，是个极大的浪费。可能是他自己还没有真正搞懂。”

④ 忆兆麟

金伯文

东北抗日联军著名领导人之一李兆麟将军被敌人杀害已经三十七年了。兆麟，他既是我的领导、战友，又是我的兄长和丈夫，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这篇文章就算一件菲薄的祭品吧。



李兆麟同志遗像(画像)

我一九一八年出生在吉林省汪清县哈蟆塘大房子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里。父亲金善极因参加朝鲜独立军，反对日本统治，一九二一年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哥哥金银植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是早期汪清县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被敌人枪杀。在父兄的影响下，我十三岁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九·一八

事变后，我离开家到游击区从事儿童团工作，一九三五年五月入伍参加了抗联二军。不久又转到五军，随部分同志到牡丹江边深山密林中的后方被服厂工作。一九三七年初，组织上决定调我到铁骊后方建立新的被服厂。这次调动后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了兆麟。

二月的东北，冰天雪地，我随交通员刘升同志在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里踏着齐腰的深雪跋涉。冬季在深山里赶路要算天刚亮的这一刻最难熬，西北风一刮，狗皮帽子上满都是霜，两边脸蛋儿上冻起了鸡蛋大的两个大泡，难怪当地老百姓说这是“鬼毗牙”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走了近一个月，才到达目的地。

到了目的地后，才知道远征部队没有打下铁骊。当时大部队已经撤走，不少伤员还留在铁骊附近的深山里。组织上决定让我和于桂珍到离伤员一、二里远的一个原来给胡子队种大烟的老大爷的小房子里住。这位老大爷有六十多岁，病得很重，第二天中午就咽了气。部队又派一个老同志带着枪来小屋和我们作伴。说是给我们壮胆的，可这个老同志说小屋闹鬼，夜里时不时地跑出去放枪壮胆。我虽说参加部队多年，打鬼子没有害怕过，可是说起鬼来，我还是真有点怕。正在此时，兆麟到了我们这里。这时他是反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赵尚志同志任总指挥），用名张寿篈。

兆麟先和伤员住在一块，没多久就到我们小屋这儿来了。他穿着战士的棉军衣，背上背着背兜。当时兆麟只有二十七岁，但长年在深山老林里风吹雨淋，满脸的连毛胡须，猛地一看特显老成，说他有三、四十岁，也会有人相信。只是他两道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给人以威严而又刚毅的感觉。他到我们这里是

为赶写一份材料，所以话不多。只见他时而埋头写着，时而又倒背着手来回踱步思考，大概是写顺手了，有时还哼上几句京剧。我那时汉语说不好，平时很少同他搭讪，只是默默地观察这个看去颇为严肃的指挥员。

于桂珍原来就认识兆麟，见面后，兆麟问她我是哪里来的，于桂珍便一一向他作了介绍。这时，兆麟对我说，三军也有不少朝鲜族同志。当他听说这里前几天死过人，还闹了鬼，我们都害怕时，顿时没了那股严肃劲儿，大笑起来。他说他小的时候也怕鬼，有一次路过一片坟地，天下着雨，黑得不行，坟地里一亮一亮的，真瘆得慌。只觉得背后鬼在追他，吓出一身冷汗，头都不敢回，拼命往前跑。后来想想谁都怕鬼，不知到底有没有鬼。于是他壮壮胆，猛地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他说其实世间根本没有鬼，都是自己吓唬自己。他讲起故事来有声有色，特别生动引人，我们听后都笑了。我虽说参加革命多年，生活再艰苦，也从未退缩过，为的是要报仇。“无神论”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革命者除了要不怕死，还应该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兆麟却懂很多革命道理，我在他面前显得多么单纯和无知啊！

几天后，通讯员来报告说敌人要进山讨伐了。当时我们的粮食不多，兆麟立即赶到伤员的住处，当机立断先把自己骑的唯一的一匹战马杀掉，给伤员每人分了几块马肉，其余的人只分到很少一点点口粮。他让伤员连同护送的战士先向伊春方向转移。为了伤员的安全，兆麟把我和于桂珍留下来和他一块观察敌人动静，第二天才离开这里。为了挽救这二十几个伤员，我们应尽快地找到部队，好让他们带着粮食来接应伤员。兆麟带着我们俩日

夜兼程，在深山雪地里急行军。

这时正值一九三七年春节后，雪下得很大，有的地方直没过了腰，走起来是很艰难的。随大部队行军，还可以由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轮流在队伍前面踏雪开道，其他人能跟在后面走。而这次只有三个人急行军，深山里道路又不平，就更为艰难了。兆麟用随身带着的罗盘辨别方向，在前面踏雪开道，还不时扶着我们一起越过难攀的山路。白天不能点火，怕烟引来敌人，我们就一口炒面一口雪充饥。晚上就在雪地里宿营，先用盆子把雪推到一旁，清理出一小块地方，然后用锯放树，再把树锯成段搭起来，再用干树枝点火。不多时火就熊熊地烧了起来。这时我使用盆子化雪做点稀米汤充饥。后几天粮食没了，只能化盐水充饥了。吃了饭，又用盆子化雪水洗脚，然后用针穿上线挑脚上的泡。再用火烘干鞋、包脚布和鞋里絮的乌拉草。遇上鞋坏了还要用帆布缝个套子当鞋用。最后就着火光相互把白天刮破的衣服缝好。于桂珍刚参军不久，能走下一天急行军来，就很不容易了。我尽量照顾她，多承担这些琐碎工作。夜深了，我们在火堆旁铺好的干树枝上合衣躺下，用背兜当枕头，一天的紧张和疲劳，使我们感觉不到凛冽的西北风和鹅毛大雪，一躺下就睡着了，醒来时常常是胸前挺暖和，背后却结了冰霜。兆麟一路上象兄长似的照顾着我们，把自己唯一的一条军毯给小子盖上。夜间睡觉时要轮流值班，他也总是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没多久，我们就赶上了伤员的队伍。在冰天雪地里爬山越岭，好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些流血负伤、口粮不足、体质极差的战士。兆麟一面鼓励伤员同志：“坚持到底，部队很快就会来接我们的！”一面对我们说：“不能看着伤员继续流血牺牲。他们能在敌人的枪口下幸存下来，决不能

让他们死在转移的路上。”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兆麟决定将于桂珍留下和伤员同志们一块行动，独自带着我又继续上路了。想起这二十几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伤员，我们心如火燎，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几天后，我们到了伊春军官学校。兆麟马上派部队火速带上粮食去接应伤员，不久伤员都陆续到了伊春军官学校。兆麟安顿好伤员，带着我和于桂珍又上路了。

一天，兆麟突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密林深处有烟火，他立即警觉地拔出手枪，果断地命令我和小于就地在两棵大树后藏好，自己独身一人向前。他告诉我们假若听到枪声，就立即返回一里以外的深山密林里隐藏，并约定敲打树干几下为联络信号；假若看到他招手，我们就立即跟上去。说完他拿着枪朝前走去，我们俩全神贯注地看着兆麟的背影，只见他渐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过了一会儿，见到他在远处向我们招手。我俩松了一口气，急速地顺着他的脚印追了上去。原来这里有一间小屋子，住着一位长年不出深山、以种地打猎为生的老乡。当地都称呼这种人为“把头”。我们在这个把头的小屋里借住了一夜。这一夜兆麟还向他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这个把头继续上路了。

我们又走了近一个月，才返回汤荆川三军留守处。第二天，兆麟派人送我们回三军被服厂。临行前，兆麟对我说：“天已暖了，我要到松花江以南去活动，毯子送给你吧。”我们和兆麟分手了。

回到三军被服厂，我仍当负责人。据当时被服厂留下的王正平、于颜秀、于秀珍等同志说，我走后(指到铁骊去)，鬼子讨伐队到了这里，破坏了被服厂，杀死了这里的一个小把头，另一个

年纪稍大些的姓严的老把头跟省委走了。

不久，组织上决定将被服厂搬到帽儿山。帽儿山的山势陡峭，可是山顶却很平，山上有泉水，自然环境可真美，有如神话中描写的仙境一般。这里原来也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把头，山上有一间小房子，周围还种了点地。我们当时就住进了那间小房子。北满省委就设在我们山下面的河边上。前面说的那个严把头这时在山下省委干些杂务。

这年的七月份，张兰生、赵尚志、冯仲云和兆麟同志来这里开会。记得于保合同志也来了，还有二、三十人的警卫部队。被服厂的几个女同志为他们洗衣、做饭、缝补衣裳，没多久就跟他们混熟了。休息时，冯仲云、赵尚志等同志总是拿我和兆麟开玩笑，兆麟若无其事，倒背着手，来回踱步，一言不发。我只当玩笑话听，但我心里挺纳闷的，兆麟为什么不制止他们呢？

一天下午，兆麟把我喊了去，他直来直去地开口就说：“同志们这几天总是开我们的玩笑，你怎么想的？”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兆麟是省委和抗联的领导同志，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识几个汉字的年轻战士，这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往这上头想过，于是照直说：“我没想过。”兆麟诚恳地说：“要是我真爱你？你……”没说完，他就停下话头，期待地看着我。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心慌极了，只说了一句：“让我想想。”就跑了出去。

自从省委领导同志到这里开会后，小屋的炕就让给他们睡，我们几个女同志在小屋里打地铺睡。这天夜里，我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和兆麟头一次见面的前前后后。说实在的，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敬重他。对我来说，他是领导，又是

兄长和朋友，而且他爱我，我还要求什么呢？我觉出来了，兆麟在炕上也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我就答应他了。这以后，我们常在一起聊聊，对兆麟了解得越多，我越觉得他是很值得爱的。

省委会议在这里开了半个多月。会议结束前，省委研究同意我们结婚。一天中午，我照顾同志们吃午饭，有人提议，当天下午给我们举行婚礼。大伙儿采来了许多五颜六色的野花，把房子前面的空地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当时省委有一台留声机，放起了歌曲。冯仲云同志为我们主持婚礼。冯仲云和赵尚志同志平时就没有领导的样子，爱开个玩笑，这下可得到了机会，加上一帮警卫战士在一旁起哄，直闹到天黑。就这样，我和兆麟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在战友们的欢乐声中结婚了。因为没有条件，我们虽说结了婚，仍是他和省委领导睡炕上，我和女同志睡地下。后来有一天大家好象恍然大悟，想起来我们已经结了婚，也应该有个“新房”了，于是天当房，地当床，同志们在小屋附近支了一个小帐篷，还特殊优待，让给我们一条军毯。可这天半夜起了狂风暴雨，刮跑了帐篷，把我俩淋得透湿。我们跑回小屋叫门时，冯仲云和赵尚志同志还捉弄我们，说什么也不叫开门，让我们在外面整整浇了半夜。这就是我们新婚第一夜，真是永生难忘。几天后，兆麟他们就离开这里走了。

兆麟离去后没几天，交通员捎回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

“贞顺同志(我原来的名字)：我已过了松花江，一切都好，你近来很闷吧！被服厂的工作不多，要抓紧时间学习文化。”

这是一张极薄的小纸，兆麟的一笔字又工整又秀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因为搞不到布，被服厂的工作停了。组织上决定我们下山和当时留在省委的冯仲云、张兰生等同志并到一块。我们

就利用这大好的时机学开了文化。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没有纸、笔，我就用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写，碰到不会写的，就去问同志们。这段学习为我学习汉族文化打下了基础。

又过了些时，兆麟和黄成植同志来到我们这里。这时组织上已经决定让他去六军当政委，调我去六军帽儿山被服厂工作。他到这儿的第二天，我便随他们出发了，约有半天的时间就到了六军被服厂。第三天，兆麟就和黄成植同志走了。

当时六军的被服厂的厂长是裴成春同志，除她之外还有李敏、李桂兰、小穆，六军军长夏云杰的爱人和女儿，还有一个裁衣工人张世臣同志(绰号张瞎子)。李再德同志当时也在这里，但我去后不久就调走了。为了被服厂的安全，在离我们住处一里以外的地方，驻了一个排的部队，记得排长姓张，指导员姓金。我们在这里紧张地赶制冬装，大批冬装做完时就到了一九三八年初了。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夕的一天，交通员送信来，说敌人要进山讨伐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把缝纫机、剩余的布匹和棉花就地藏了起来。三月中旬的一天，天刚亮，敌人的讨伐队果然由西南方向的山上下来了。当山上的岗哨发现后鸣枪往山下跑时，敌人的机枪就响起来。我们陆续冲出房子。不幸，李桂兰、夏军长的爱人、女儿和张世臣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他们把张世臣同志捆在房前的大树上，点上了火，连同被服厂一块烧了后就撤走了。等到天全黑下来，我们派了几个同志下山掩埋了张世臣同志后，就向汤原方向开拔了。

我们在汤原地区深山里活动时，与兆麟带的教导队会合了。刚参军的陈雷同志也到了这里，他一身学生打扮，白净净的显得挺斯文，引起了同志们的注目。我们大约在汤原地区活动了近两

个月，五月初又随兆麟重返帽儿山地区。

一天，天阴沉沉的，下着雨还夹着几片雪花。部队路经六军被服厂的遗址，看着被烧毁的房子和树，不禁想起了被捕的同志和英勇献身的张世臣同志。我们流着泪，心情极为沉痛。

我们向死难的老张同志默默致哀后，又往西走了二、三里路，在接近黄昏时，停下来宿营了。同志们四处找柴生火。我看见兆麟坐在一个倒下的树干上，手中拿着一个本子，陈雷同志坐在他旁边。篝火熊熊地烧起来，同志们都围在火旁烘烤着被雨水浇湿的衣裳。兆麟拿着本子，站在篝火旁，一句一句教唱他编写的《露营之歌》。兆麟嗓子很好，他不但爱唱歌，还能哼上几段京剧，没用多长时间，同志们就都学会了《露营之歌》，当时教唱的歌词如下：

(一)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湧。

这一部分后来成为整个歌曲的第一段。遗憾的是我未能继续留在兆麟身边，不知后三段歌词是怎样写成的。这支歌全部问世是在一九三八年底，全歌分成四段，分别以春、夏、秋、冬为背景，生动而又逼真地写出了抗联战士的艰苦生活和坚强斗志。这支歌深为抗联战士喜爱，很快就在抗联部队中流传开来。兆麟为

国殉难后，人民为了纪念他，把《露营之歌》做为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的遗作刊登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全国解放后，又将这支歌连同兆麟的血衣和遗物一齐展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中，载入史册。后三段歌词是这样的：

(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情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爆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四)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这支歌写成到今天已有四十五年了，《露营之歌》的第一段写成和问世的全过程，至今仍极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

这以后的第二天，我们来到帽儿山省委所在地，兆麟在这里住了四、五天，就把队伍带走了。而我留在省委秘书处工作。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抗日联军三路军正式宣告成立，兆麟任三路军总指挥。这个历史事件我没能参加。但与路经省委的部队接触时，曾听到过流传的兆麟写的《三路军成立纪念歌》，当时我们都会唱，歌词很雄伟。解放以后，这支歌连同《露营之歌》一齐，做为李兆麟烈士的遗诗二首，载入《革命烈士诗抄》。现将四段歌词抄录如下：

《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一)

绚烂神州地，
白山黑水间。
八载余，强敌嚣张，
铁蹄肆虐。
中华民族遭蹂躏，
惨痛何堪言，
骨露原野，
血染白山巅，

义愤填胸，
揭竿齐向前，
誓驱倭寇，
团结赴国难。
民族自救抗日军，
铁血壮志坚，
杀敌救国复河山。

(二)

驰骋吉、黑边，
横扫哈东南。
军威远，松江动荡，
兴安亦震撼。
冰天雪地朔风吼，
夜雨复霜天。
救亡壮志，
永矢兮弗谖，
鼓角乍鸣，
将士各争先，
杀声四起，
敌寇心胆寒。
六载于兹未稍懈，
伟哉豪气长虹贯！

(三)

机动游击队，
突破嫩江原，

貔貅健，长驱挺进，
到处得声援。
反日怒潮澎湃起，
爆发指顾间，
响应我党全民总抗战，
消灭日贱走狗与汉奸。
精诚团结，
粉碎封锁线，
救国重任万众担，
势急不容缓，
国耻血债血未还。

(四)

举国鼎沸兮，
全民总抗战。
烈焰炽，
战争烽火延烧遍中原。
东北抗联齐奋斗，
统一指挥建，
三路军成立军民齐腾欢。
厉兵秣马，
慷慨赴火线。
果敢冲锋，
寇氛一扫光。
民族革命成功日，
红旗光灿烂，

高歌欢唱奏凯旋。

离开兆麟两年后的一九四〇年春，我随一个姓金的省委交通员又到了铁骊，见到了兆麟，久别重逢，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战争环境残酷，夫妻之间离别是常事，常常是离开后，就无法得到对方的半点音讯，是死是活全不能知晓，能够重逢，实在令人喜出望外。

一九四〇年的七月底，王钧和王明贵同志率三支队到平原地区弄粮食去了。兆麟因要赶写材料就和我们二十几个老弱病残留在后方。粮食已经快吃光了。王钧和王明贵同志带部队打粮食返回时，河水上涨无法渡过南北河；后面又有敌人追赶，迫不得已，只好把弄到的粮食就地藏起来后，带部队撤走了。这下可苦了我们在后方等粮食的二十几个同志。我们断粮了，幸而还种了点玉米，那时苞米还没包浆，也只得把青嫩的苞米砸碎，用水冲了喝。这样只维持了几天就又没吃的了。兆麟带着同志们在漫野深山里挖野菜，拣榛子，采蘑菇和野葡萄充饥。又维持了一段时间。东北的山区到了八月，已经开始冷了，山上的野物也渐渐地找不着了，同志们肚子里没食，时间一长都打不起精神来。兆麟鼓励大家说：“宁肯饿死，也要忠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绝不能动摇我们抗日到底的信念。”接着又诙谐地说：“等到打跑了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咱们一块到哈尔滨去看京戏，你们看怎么样？”说得我们都笑了起来，情绪也稳定下来。我在延边游击区挨饿时，曾吃过松树皮，这种东西根本不是吃的东西，很难吞咽，可是现在只好吃它了。于是我们就到深山里扒松树皮，拿回来后先把外面一层老皮去了，留下里面的嫩皮，用刀剁碎，加进木炭灰水（当碱水）煮，把松树皮煮烂后再用水泡上一夜，这时才能用水冲着吃

了。虽经过反复加工处理，松树皮仍是极难下咽的，但是为了生存，同志们都强咽了下去。吃这种东西，大便都解不出来。十几天后，男同志的耐久力不如女同志，都躺倒不能动了，只有几个女同志还能爬出去找些吃的东西。当时，我怀着孕，身子已经很不方便了，就这样我也随同志们爬出去找吃的。有一次，我们突然发现了一种我在家时常上山采的一种包饭用的野菜，叫“大耳朵毛”（朝鲜人叫무늬），它长得象南瓜叶子那么大。我们如获至宝，把它采回来，回到住地后立即用水煮，再放上点儿盐，就连汤带水地喝起来。此时此刻，吃上大耳朵毛，真可以说是最高的享受了。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时刻，兆麟不愧是党的忠诚战士，他躺在地上，说话的底气都不足了，还对周围的战友们说：“同志们，别丧气，我们就是饿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后代不会忘记，我们今天吃苦挨饿，是为了他们明天过得更幸福。”听了这激动人心的话，同志们都含着激动的泪水，点着头。

虽然几乎是到了最后关头，可是不论谁弄到了野物，都不肯先吃一点，总是自觉地拿回来，交给兆麟分配。兆麟也总是先照顾伤员，后照顾老弱，轮到他自己时常常只剩一点点了。当时战友之间的关系若用“阶级友爱深似海”来形容，绝无丝毫的夸张。

幸好一个姓兰的交通员由中苏边界某地给兆麟带来了重要文件，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炒面和粮食。同志们近两个月没见到一粒粮食，恨不得一次吃个饱。可肚肠都饿细了，一下子吃得过饱，会断肠丧命的。兆麟亲自监督着大家，先喝点稀米汤，然后才慢慢地增加食量。这样，我们二十多个同志总算得救了。

这时已到了九月末，过了一段时间，我已接近分娩了。组织上决定让一个叫朴英善的朝鲜族女同志陪着我，给了我们一匹马

和半袋粮食，并派一个战士送我们到深山密林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去生孩子。兆麟把这里的工作安顿好后，就随兰交通员到中苏边界的一个地方开会去了。

我和朴大姐离开部队一段时间后，就遇上了后方留守的老弱伤残病员。听他们说，鬼子开始冬季讨伐了，而且把他们当成三路军总指挥部紧追不舍，到处宣扬：要消灭三路军总指挥部。我的孩子就诞生在这行军途中。

这时已到了深冬，敌人大队人马，又有不少的民工为他们运粮草，因此行动起来总是不如我们这二十几个人的小股部队那么轻便，尽管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敌人也一直未能追上我们。后来我们绕到敌人的后面，这下可把敌人转迷糊了。而我们可以捡些敌人扔下的马料、剩饭、死马，不愁没吃的了。

行军途中，我们有时离敌人远些，有时又离敌人挺近，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而孩子不管有没有敌情，说哭就哭，每当这时，同志们都很紧张。为了不暴露目标，我时常往孩子嘴里抹点鸦片，让他迷迷糊糊地睡觉。那时常年在深山里行军打仗，为备急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鸦片。时间长了，孩子受罪这且不说，假如因为孩子的哭声暴露了目标，这二十几个同志就有生命危险。我考虑再三，最后找张参谋和马指导员，对他们说：“干脆把这孩子弄死吧！我真不忍心拖累同志们。”可是他们听都不要听，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首长的孩子，他还没有见过！你放心，一旦发生了意外情况，我们会立即采取措施。抗联战士就是死，也要死到一块。”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雪化了，敌人找不到我们的脚印，就撤走了。这时我的孩子

已经有半岁了。我很可怜他，除了母爱之外，正常条件下儿童应该得到的，他什么都没得到过。说也怪，虽然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他倒是挺聪明的。这时他已经会坐了，时常独自坐在火堆旁，抬头看着树上的乌鸦和山雀子，咿咿呀呀地学着它们的叫声。同志们都喜欢他，宿营时这个抱过来，那个抢过去地逗着玩。每当这时，我便忘掉了背着他行军所受的艰辛和惊吓，兆麟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孩子，要是他看见这么聪明可爱的儿子，不知会多高兴呢！

就在这时，兆麟和金策等领导同志到了我们这里，随来的还有陈雷等十来个人。他们每日忙着赶写材料。一次空闲时，金策同志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怎么还用着在家时的小名，这个名字带点封建色彩。”于是我改名叫“伯文”了。

出乎意料，兆麟对我们的儿子并没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就是背着人也极少同孩子亲热，只是常常默默地看着儿子，脸上的表情却显得那么严肃。我心里很替孩子委屈：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活下来，见了父亲连张笑脸都没得到。不过我理解兆麟：为了更多人的安危，他只能把父爱藏在心里。

兆麟穿的裤子实在太破了，我用破布块给他缝了又补，补了又缝，花了足足一天的时间，才算补好。第二天，他独自去交通点跟下江来的交通员接头。等他回来时，同志们都楞住了，原来他穿着一条白色的土布衬裤由树林里走了回来。他把一条破得无法再穿的裤子递给我，说：“这条裤子是那个交通员的，我看他的裤子破得实在无法再穿了，就把你补好的那条裤子换给了他。”兆麟就是这么个脾气，他总是关心他人胜过自己。我什么也没说，拿出针线又补了起来。

环境还是那么严峻。为了躲开敌人的骚扰，兆麟和我们一块，

不停地在深山里行军、宿营。天气渐渐地转暖了，东北深山里的瞎蠓子、蚊子、小咬特别厉害，常常是边走边用手拨开挡在脸前的杂草和树枝，还要不时地轰赶瞎蠓子。一天下来，大人、孩子都被叮得满脸手的血印，日子不比冬天好过多少。这时我们仍然没有粮食，一次陈雷同志写材料时，饿得实在头昏眼花，就找了一块马皮在火上烧一烧吃了起来。大人没有吃的可以忍耐，可是孩子小不懂事，常常哭闹，怎么哄也哄不住，我心里急得象猫抓，舍弃儿子吧，现在已经不是刚刚生他那时候了，我实在下不了手。送给老乡抚养吧，这一带早叫鬼子扫荡一空，基本群众都随部队行动，再没什么人家了。真愁人啊！一天宿营，我把孩子安顿在火堆旁就忙别的去了。开始他还懂事地坐着，大概实在饿了，就又放声哭起来。我赶忙跑过去，没容我近身，兆麟已几步走到火堆旁，一把抄起饿得直打晃的孩子，向几百米以外的树林走去。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兆麟对孩子那么严肃。原来一见面他就在考虑这小生命的归宿了。为了这个孩子我和同志们吃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他哪里只是个快满周岁的孩子，他是我的心血，我的骨肉啊！我真想立即跟上去把孩子抢回来。一下子，我好象听到四周满是孩子的哭声，又仿佛看到瞎蠓子把孩子叮得满地爬滚。我心都扯碎了，但一步也没动，只是任泪水流了满面。同志们也都难过地沉默着，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我才好。至今我不能忘记这个孩子。他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们共过患难；他是我那些难忘岁月的一部分，他同我对战争年代的回忆紧紧联在一起。同样，我至今不能忘记兆麟是怎样战胜亲子之情，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无私胸怀的。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十年来，我一直为兆麟的行动自豪。后来，一位随部队活动的陈大爷实在

不忍心，又偷偷地跑出去把孩子找回来。为了不影响众多同志的安全，这以后，我就带上孩子随陈大爷、朴大姐和半身瘫痪的张熙淑同志一块，离开大部队单独在山里活动了。

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间，冬天又到了，江水都冻起了老厚的冰——封江了。日本帝国主义又调重兵进驻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实力，组织上决定抗联到苏联境内休整训练，为与日本鬼子决战做准备。

我因生孩子后一直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受冻挨饿，整年经血不断，身体十分虚弱。当部队到黑龙江边时，我的两条腿僵直，一步也迈不出去，下肢瘫了。一个同志上来把孩子从我的背上取了下来，另两个同志拖着我往前走，还是不行，又有一个同志在后面推，才过了冰封的黑龙江。

到了苏联，我被送进医院，孩子也被送进托儿所。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我才恢复健康，出了院。当时抗日联军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特别旅，周保中同志任旅长，兆麟任政治副旅长，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交通营，我被编入交通营。这几年的生活，以后被统称为“野营”。

在这里，领导同志都可以带家眷单住。我们当时和金日成同志家住在一座房子里。一天，我到他家去，金日成同志和他爱人让我看照片，指着一个孩子的照片说：“伯文的孩子要是还活着，也有这么大了。”我这才得知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回到家我足足哭了几天。这时兆麟才告诉我，由于长年在深山里生活，受冻挨饿，孩子体质极差，到了幼儿园，对新环境适应不了，加上初次离开亲人，不吃也不喝，不到半个月就死了。他有些抱歉地对我说，孩子死本应早些告诉我，但因我身体不好，怕我听了后

受刺激，影响我的学习和训练。想起孩子跟我在深山老林里风风雨雨、冰天雪地的一年，又想起这一年里牺牲的同志，我个人的损失毕竟还是很小的。

“野营”生活虽说比较安定，但仍是极为紧张和艰苦的。我们除了自己动手盖营房、开荒种地外，每日还要进行正规化训练，学无线电收发报、学军事技术、学跳伞、学游泳和滑雪。这一切都是为了重返东北战场做准备。当时正值二次大战期间，粮食严重不足，物资也很困难。兆麟生活待遇比一般战士好些，他时常将一些食品送给身体不好的同志。我与兆麟相处多年，他这个人党性极强，从不在家中谈军中要事，对我和孩子们要求极严。当时部队战士除了每人一套军服外，其他便一无所有。兆麟发的衣服较多，又不需上缴，有了孩子后，我跟他商量，是否把他的旧衣服给孩子改两件衣服穿。他发了脾气，不许我改。重返东北后，他将苏军军服全部交给苏军人员带回去了。我们在苏联过了五年野营生活，很多同志都作了长期的打算，积极地学习俄语，以适应在苏联的生活。兆麟却不学，我问他为什么不学俄语，他说：

“我是中国人，在这里只是暂时的逗留，早晚我们还是要打回东北去，解放自己的国土。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国土上。”我们的两个孩子，出生时苏联医生给他们起了苏联英雄的名字“阿立克”和“卓娅”，但兆麟坚持又重新给他们起了中国名字“振环”和“振英”。

转眼到了一九四五年。从广播里，我们听到了苏联红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日本鬼子也失去了当年的气焰。我党中央于八月九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大举反攻，收复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组织上决定特别旅重返东北，准备配合东北野战

军和苏联红军彻底击败日本关东军，解放整个东北。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高兴极了，多年来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就在八月，周保中和兆麟带着大部分同志先回了东北。李兆麟这个名字这时才开始用。我因为当时身边有两个孩子，被暂时留下来，十二月，随着其他几个有孩子的女同志一块，乘火车返回了东北。

十二月九日，我们到了哈尔滨，住在南岗、马家沟一带的一座小楼里。这座楼是我党市委所在地。房子里空空的，什么家具也没有。常住在这里的就是我们一家和钟子云同志一家。我们家只有两个单人草垫子，并排铺在地上。夜里睡觉时，我把身上穿的一件破皮袄脱下来，铺在草垫子中间，让两个孩子睡在皮袄里，我和兆麟就一边一个睡在草垫子边上，挡住两个孩子，唯一的一床旧被子把我们四口人盖上。就这样也很知足了，这比深山里露宿要强得多。

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党全面收复失地，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国民党也厚颜无耻地来摘桃子，他们往哈尔滨派来许多要员，公开出面与我党纠缠，当时的环境极为复杂。我到哈尔滨时，我党还没有全部公开，只有兆麟等少数同志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面与国民党上层打交道，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阴谋。兆麟的口才极好，善于宣传群众，因此成为敌人的眼中钉。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繁忙的工作使他不能经常回家。而我又不许外出，每天守着孩子。他有时回来，我就对他说：“这种生活我实在适应不了。我很想继续工作，哪怕暂时离开你。我有收发报的专长，现在战局紧张，我就是干这个工作也行。”他劝我说：“现在情况复杂，时局不稳，孩子又都小，托给别人也不放心，还是暂时忍耐一下。”

又说：“我们是患难之交，又是两个民族的结合，十多年的战斗岁月都已经过来了，我们朝思暮想的和平、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别性急；要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环境。”第二天，他抱来了一堆书，有《联共党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叫我没事时多翻一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但要能吃苦会打仗，也要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理论，将来还要学会建设。”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踏下心来了。

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市长提出，要看一看李会长的公馆。为了应付这位市长，组织上让我做了几件衣服，并让我们搬到打直街的一座小楼上，还没来得及布置新居就出事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那天，兆麟白天参加哈尔滨市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头一天还为大会题了词：“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八日晚上他参加了苏军庆祝三八节的活动。直到很晚了他才回家。这天他有些感冒，我给他找了几片药吃，就让他躺下了。这时冯仲云同志来了，他坐在床边上对兆麟说：“最近，常有你的黑信，说要杀你，你可要当心啊！”兆麟不太经心地说：“杀我干什么？我值几个钱？”又说：“抗战这么多年，鬼子的枪子儿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个眼，也没碰到我的肉。要是再碰上事的话，恐怕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一直谈到很晚。临睡前，他对我说，明天跟那个市长有个约会，让我早上起来把衣服给他熨一下。

三月九日那天早上，他抱着卓娅，领着阿立克，等我给他熨衣服。大约九点左右，他坐上汽车离开了家。下午六点钟，天已经黑了。宋兰云和李桂林同志来了，神色慌张地问我李会长回来没有？我说没有，又忙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什么也没说，赶

紧就走了。我预感到出事了，坐在家里一夜没合眼，一直等到天亮。我再也坐不住了，把孩子留在家里，就独自摸到马家沟市委机关去了。那里只有钟子云同志一个人，我问他兆麟有消息没有，他说没有，现在同志们都分头去找了。我觉得兆麟怕是凶多吉少了，边流着泪，边往家走。我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直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得到了确切的新闻。

原来三月九日那天，兆麟同志收到一封信，信上称有重要事情与他商谈，请他当日下午四时到水道街九号。当天的下午，他由市委坐汽车出发，当车开到高中苏友好协会不远的地方时，突然坏了。兆麟下了车，让警卫员李桂林同志帮助司机修车，自己独身一人步行到了中苏友协，告诉秘书于凯同志说他去水道街九号，汽车修好后，到那里去接他，说完他就独自去了。到了水道街九号，一进门，就有专人帮他脱了大衣（手枪就在大衣的口袋里），然后进了一间布置得象会议室的大房间，他们给他倒了一杯有毒的茶水，他喝了后，特务们就窜出来，乱刀将他杀害了，真是凶残到了极点。

国民党特务还想把兆麟切成几段，装进麻袋里，扔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进而达到毁尸灭迹、嫁祸于人的目的。由于我党发现得快，才未得逞。事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编造无耻谰言，用以诋毁兆麟，可是谎言终究不能成事实。

兆麟的血没有白流，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他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千百万人民的觉醒，哈尔滨市民都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各大报纸连续发表社论和报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罪行。在各界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的省长和市长也不得不虚情假意地出面，参加了群众的追悼和遗体安葬仪式。人民为了

缅怀他，把他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并为他树起了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十一个金色大字，还刻着他的亲密战友冯仲云同志写的碑文。

我带着未满三岁的阿立克和刚满周岁的卓娅，也参加了追悼会。兆麟被杀害的遗体令人惨不忍睹。回想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日本鬼子杀了我的父亲和哥哥，国民党杀害了和我风雨同舟，志同道合的兆麟。要知道这时兆麟才三十六岁，我才二十七岁啊！这血海深仇何时才能让反动派偿还，我盼着这一天。

伟大的解放战争迅速摧垮了蒋家王朝，我们终于解放了全中国。回顾历史，有多少仁人志士英勇战斗过，又有多少先烈流血牺牲，为了无愧于为革命而死难的亲人和为新中国捐躯的战友，我要把历史留给我的深深的怀念和记忆记录下来。我将告诉我的同胞和后代，新中国是先烈们创造的，不要忘记——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本文由李兆麟、金伯文的女儿张卓娅整理)

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由的解放而奋斗！

李兆麟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喻 杰

(一)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粮饷、被服、弹药，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企图将我军困死在军事、经济封锁和日寇夹攻之下。

国民党当局制订了许多法令、条例，名义上是加强战时物资管理，实际上是对付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群众的负担加重了。边区的十多个县，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公粮增加到二十万大担（一大担三百斤）。每年群众还要义务送运公盐二、三十万驮（每驮二百斤，由盐业公司代为出口，钱交财政），义务做军鞋十几万双。一九四一年还发行了五百万元公债。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

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这是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毛主席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批评了那些片面地看重财政，不懂得统筹发展整个经济的重要性的同志。说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毛主席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要靠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就只能束手待毙。“财政的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八路军三五九旅由王震将军率领在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镢，开荒种地，养牛喂羊，自办工厂，如纺织厂、铁工厂、木工厂、农具厂、酱菜厂，真是百行百业，无所不有。他们的“大光纺织厂”出的布匹、毛巾厂织的毛巾、肥皂厂制的肥皂，除了供自己使用外，还拿到市场销售。荒凉的南泥湾到处种上了庄稼，牛羊成群，肥猪满圈，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三五九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新四旅、六旅在甘泉、槐树庄等地开垦荒地，以农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农、工、商都搞。其他军队则在较小的范围搞生产；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进一步扩大生产，增加自给，少要财政拨款。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都是自己打窑洞、种粮、种菜、喂猪，搞工副业生产。不少单位做到大部分开支自给，只要财政给一点补助。军队和机关学校团体的几万人员，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当时那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在农业方面，边区政府向群众提出“耕三余一”的号召（即种三亩地，留存一亩地的粮食备战备荒用），还提倡多种和种好棉花。为解决纺纱力的不足，要求机关干部、学生每年纺两斤纱。毛主席和中央同志都纺。三五九旅后勤部部长何维忠仿造出了平江的纺纱车。这种纺车比陕北的纺车轻，用料也省一些。他把这种纺车给毛主席和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送了一架，也送给我一架。这年我抽空纺了四斤纱。我爱人陈希纺不好，她就和我兑工，替我登记文件，抄、摘有关文件内容的提要。我则替她完成了纺两斤纱的任务。除机关纺纱外，农村妇女有义务纺纱的任务。

土产公司把纱收起来，送到难民织布厂去织布，以解决军队、机关等必需的被服。军队自己也织布，如三五九旅从敌占区运回二百台手拉铁制织布机，在干谷驿安装织布，这些机子比难民织布厂的机子效率要高些，织出的布质量也好些。在农村由于放手发动群众种棉花，土纺土织，使农村生产的布，不仅够穿，还有余。土产公司便将多余的布收购起来，调剂余缺，或交机关、部队用。土产公司还在蒋管区吸收一些棉花、洋纱、洋布进来，以后进一步采取洋纱做经、土纱做纬，布的质量又提高了一步。

当时陕甘宁边区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大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

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费用，大部可自给，有些单位则能做到全部自给。

边区的工业如兵工、纺织、毛织、火柴、造纸、肥皂、石油、印刷等也都具备了一定基础。在近两年内做到了花、纱、布、铁、纸及其他用品完全自给。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

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边区的生产建设，在困难条件下，还是蓬勃发展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王云五等十多人曾来边区参观、考察，看后大为震惊，感慨颇深。后来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这些人中除王云五没来，其他人都来了。

（二）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贺龙同志找我谈话，要我担任边区政府财经办事处秘书处的工作。财经办事处驻在光华农场附近。那时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指挥和财政经济建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成员由财政厅长南汉宸、建设厅长高自立、物资局长叶季壮、银行行长黄亚光等同志组成。下设财经办事处，贺龙兼办事处主任。财经办事处除设秘书处外，还设计划研究处，王思华任处长。

边区物资局局长是叶季壮，副局长范子文、张永励。物资局下设土产、盐业两总公司（主要负责对蒋管区的进出口贸易工作）及在全边区境内经营一般日用品的光华商店。物资局是当时边区财政经济的主要支柱。土产公司经理李玉昂、副经理李戒迷。盐业公司经理李建新、副经理耿万福。为了开展业务，我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的边界上设立了专门的分公司，如进出口贸易公司、土产和盐业两公司在关中、陇东、定边、绥德设立了四个分公司。

贺龙在旧社会单独组织过军队，对如何解决军饷问题很有办法和经验。他一手抓军事，一手抓财经，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从一九四一年起，领导晋西北军区的指战员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亲自下连队检查生产情况，还

亲手种菜，种粮食和棉花。隔不了几天，他总要到财经办事处来了解财经动态，掌握“行情”，研究措施。他说做经济工作好比打仗一样要知己知彼，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他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要求：边区的军队在一九四三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自己解决。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边区的军队还种了一些适合边区土地特点的经济作物，搞了一些工副业生产。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更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供给。这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有着很重大的意义。

一九四三年，我在财经办事处秘书处工作期间，除了抓边区大面上的财经情况外，还重点抓了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这一年，机关学校向政府领的款只占开支的一小部分，自己的生产解决了绝大部分经费开支。一九四二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一九四三年达到自给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牛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资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增多了。另外，边区当时已经组织了许多农民合作社。除了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

谓“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边区土产公司经理李玉昂被康生当作内奸逮捕了（后平反），剩下副经理李戒迷支撑土产公司，业务开展很困难。贺龙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去担任经理。他说你去把经理的担子挑起来。当时我看到那里情况有点乱，怕难搞好，所以不想去。他一定要我去，说：“你完全可以搞好。”我见他不松口，便提出要求“三个权”。他问：“哪三个权？”我说：“一是业务自主权，二是人员选拔权，三是人员调动与奖惩权。”贺龙答应了，并向西北局、边区政府讲清楚，取得了他们的同意，这“三权”一直沿用到大区撤销为止。

领导同志都非常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经常鼓励我们，要我们大胆地放开手脚干。到后来西北局书记高岗、组织部长马文瑞，只要是我拟的电报即签字照发。

朱德经常骑着一匹灰马到我们公司来了解物资购销情况，帮助我们想办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他对我们说：我军之弹药、被服、医药、粮饷等等，三、四年来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供给的数十万大军，全靠自己，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奇闻，而这确是我们抗战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是奇迹。他还说：“边区遍地是黄金，边区的土特产品只要想办法搞出去，都可以换回钱和东西来，解决我们的不足。”那时，我们住在窑洞里，朱老总常到我家作客，我留他吃饭，他很随和，边吃边和我谈如何搞活进出口贸易。以后，他还在我们召开的各分公司经理会上作报告，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合影的照片，年深日久，照片已经发黄了，但朱老总关心财经工作的事，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三)

一九四四年一月，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我作了较长的发言。主要是谈经营管理问题，财经制度问题。当时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边币受法币贬值的影响甚大，财政和银行的关系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他们两家都可以发行货币。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相当混乱，困难很多。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和部队）要东西就找叶季壮批，拿走东西不给钱，记笔账就算了。这样，物资出去了而不能回笼货币，财政只得增发边币，造成通货膨胀，币值下降，物价上涨。由于货币贬值，物资局账面上金额数目大，按实物计算却大大亏了本。我接着讲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批准和结算制度。财政不能象银行一样发行钞票，只能由银行一家发行钞票。各部门也不能随便到物资局或土产公司来拿东西，拿东西要经过批准，要办理手续。还要整顿财经纪律，要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不然，就会造成财经上的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参加了会议，他仔细听了我的发言。

实际上毛主席和中央同志已在考虑这个问题。当时内部矛盾和外埠矛盾很多。有些直属中央的机关单位，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管不了。当时单位之间的一些矛盾，如果不采取一定制度来制约和用经济办法去管理，光靠行政管理，越管则矛盾越多。这次高级干部会议着重研究了方针、政策问题。因贺龙同志要上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决定由陈云同志兼任财政经济办事处主任，贾拓夫、白如冰两同志任副主任。贾代表西北边区，白代表晋绥边区。

陈云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身体不太好，但每周总要抽一两天时间到财经办事处来主持工作。他找各方面的同志作调查，接触很多具体材料，加以分析研究。他善于听取专

家、学者的意见。对一些重大问题，他和西北局、晋绥分区、贺龙等同志商量后，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汇报，定下了各种制度。如金融管理制度，货币发行制度，财经结算制度，财产保管制度，费用开支制度以及价格政策等；改进了各项业务；对人员也作了调整，撤换了不称职的干部；将发行货币权收回到中央；银行只承担利润交财政的任务。通过税收将企业的利润交财政；财政不许向企业调物资，不许摊派东西或赊欠货款，要物资必须通过买卖；各机关单位、军队的开支，通过预算审核，除自给任务外，各单位都有一定的财政任务，统一归财政口管理。并针对以前财经上的一些混乱情况，进行清理和整顿。

陈云同志常到土产公司来具体指导我们开展业务。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我们边整顿边改进，对家底进行了一次全面盘查，建立健全了各种财务账目和管理制度。我们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挑选了忠实可靠的知识青年李维新到关中任土产分公司经理，把二十来岁的薛宏福提拔为土产总公司的会计科长，让大学生刘卓甫担任西北贸易公司副经理。他们的积极性很高，又能干，一个月时间就把全部家底盘点清楚了，各项制度也建起来了，以后业务开展得很顺利。

为了保持市场稳定，我们加强行政管理，尽量保证供应正常，不使物价波动过大；同时也根据情况进行价格引导和节制。事实上，要保持市场稳定，必须以物资为基础，充分运用价格这一有力武器。没有一定的物质力量，想控制价格，那是一句空话。摸不清市场涨、跌的底细，也是要失败的。我们摸索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用三个价格（高价、中价、低价）浮动，保持在中价上。我们提高收购价以刺激大量物资进口，大量物资

达到时，则降至中价，进行大量收购。达到饱和时，则降至一个低价，这样平均起来就可达到中价。出去的物资也是采取这三个价格浮动，以稳定市场。我们在边区和晋绥边区采取中价稳定政策，也有时没有注意到，价格上涨了，则不采取中价抛售物资硬压，硬压就会消耗力量，再是会给投机商以可乘之机，他们囤积一批物资，等待你的物资消耗完了，他再涨价，赚暴利。抛物资硬压是蠢人的办法。如何办呢？我们准备一定的物资，在价格上跟上去，以稍低于市价的价格抛售物资；等找购劲减弱时，把价格拉到中价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这样既能节省物资，保存实力，又打击了投机商，回笼了货币，还赚了钱，稳定了市场，边币信用提高，可以一举几得。这样搞了几次，投机商不敢轻举妄动了。甚至有些国民党机关、部队请来的投机惯手，大都烧了手，赔了钱，以后就逐渐就范了。

边区贸易公平合理地得点利润，将这利润补助机关、部队财政的不足部分。能够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要黄金给黄金，土产公司硬起来了，信用竖起来了。

采用经济办法，价格政策引导、节制的手段，不仅内部统一了，还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也冲破了。“价高招远商，货高招远客”。西安、长武、彬州、平凉、西峰镇、宁夏都成了我们的物资进出的转运站。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队也成了我们过封锁线的运输保护队。国民党军队因法币不断跌价，士兵吃不饱饭。班长便叫战士背东西进边区，搞点钱补充伙食。后来，一些连、排长也背着东西来了。进一步发展到商人给他们点钱，骡马队可以顺利地运盐、冰碱、纯碱、煤油出去。这样，封锁线被冲垮了，我们的业务不断地扩大，扩大到晋察冀、晋东南边区。边区的财经

达到物资丰富，仓存充实，金融、市场比较稳定的水平。财政支出减少，利润、税收多，财政收支平衡，而且稍有余，再不需要靠发票子过日子，各单位也有了靠自己生产积累的“小家务”。一九四四年真正做到了毛主席号召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在农村、城镇、机关、部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和西北局下达的向外搞钱搞物资的任务。陈云同志要银行搞一万两黄金作为发行基金的任务也办到了。这年开支财政没有发行货币，贸易上还是发行了，是因为业务扩大，市场交易增多，筹码不足而发行的，是有黄金作后盾的，所以并不影响市场物价，还起了扩大生产的好作用。

(四)

一九四五年春，法西斯阵线轴心德国日本逐渐垮台，反法西斯阵线的英、美、法、苏联、中国由失败转胜而反攻。日寇在中国已无力进攻。党中央、毛主席根据这个形势，决心反攻，准备打仗。提倡群众休养生息，“藏粮于民，藏富于民”，陕甘宁边区公粮减至十四万大担。各地各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回到延安学习、整顿“三风”，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七大”路线指引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工、学、商一齐行动起来，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巨大生产热潮。

这时，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为保存实力，准备反攻，撤回几个主力旅，以保卫延安。边区一下子增加了几万人。要不是边区财政、经济调整制度的建立，贸易业务的开展，市场的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的大生产运动都实现了的话，那困难是不可设想的。政府没有再增派公粮，只从关中、洛川、陇东产麦区吸收了一些小麦进来，一则补充不足，二则改

善生活。小米配小麦，均按人口配给。军队每人每天一斤半，机关一斤，加上自己生产的超产粮，足够吃了。每星期会一次餐，搞得好每天还有点猪、羊、牛肉。粗布衣可以满足需要，纸张和办公用具也有，只需从外面采购些军用原料。

一天，朱德总司令高兴地来到我们公司，对我说：“要把边区的土特产多搞些到外面去，把钱和需要的物资换进来。加强军事生产，保证对于前线的充分供给。”为了解决武器装备，朱德总司令还号召各地建立“军火田”。“军火田”是专为解决民兵军火经费而开垦耕种的公共田地。一般由民兵和群众以变工互助的方式耕种，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制造弹药、地雷等。

延安当时只有两个较大的骡子运输队，一是粮食局的运输队，二是土产公司运输队，各有三百多头牲口，都分为三个队，每队下设三个排，每排分为三个班。在当时可谓强大的运输力量。每个分公司也有百把几十头牲口的运输力量。我们组织这些运输力量，日夜不停地将收购到的粮、盐、医药等物资运回延安，将边区的土产运出去。

经过一年多努力，土产公司把原来所亏空的挣回来了。为准备打仗，把各单位投入的股金折算成实物，一一退还了。应交财政的税收和利润如数交清，一个不欠，没超支银行分文；还剩下十万两黄金的家底，物资仓存充实，周转也更加灵活。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我军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许多县城和集镇，大大缩小了敌占区。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九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八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十日至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道命令，八月十五日朱德总司令命令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投降，要日军就地不动，准备缴械，待命接收。

这时候，国民党抢先接收，美国派飞机帮国民党往东北等地运军队、人员。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中央派各地方军队的领导人先赶赴岗位，组织部队、人员准备做接收工作。这就要并机构、抽人员，备钱、备骡马。骡马得从关中平原、陇东平原、晋南等地购买，由部队押运来。分配的原则是有随军家属的给一匹或两匹，单身汉四人共一匹。中央负责同志给两匹或三匹。这样多的骡马，需要很多钱去买，光靠财政上出钱有困难，也迟误。这时各单位搞生产积累的小家务起了很大作用，解决也快。只有学校和小家务不大的单位，则由财政上拿钱解决。中央只留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和一些办公人员、生活管理人员、警卫团（小团），其他部队都上前线去了。彭德怀、陈云、叶季壮等同志也都亲赴前线。西北局、边区政府机构没有动，但也抽调了一些干部上前线去。财经办事处亦缩小了，中央从此不直接管。办事处正副主任由贾拓夫、白如冰担任，并搬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办公。贸易总公司撤销，盐业公司和土产公司并为西北贸易总公司，下设关中分公司、定边分公司、陇中分公司、绥德分公司。分公司以下设支公司，下面设购销站。总公司经理由范子文担任，我和余建新担任副经理。余建新在旧社会学过商业，业务很熟悉，做工作也很熟练，很细致，又耐烦。陕北同志称我为“长江鱼”，称他为“黄河鱼”。

在这次合并机构的变动中，人员减少很多，我们公司的业务

还是照常进行，进出物资比较顺利。工作虽然紧张，但账目、物资一清二楚。

当时国民党中央银行抛出黄金量比过去多。蒋管区的商人以为法币^①从此可以稳定了，不知道一展开接收工作，开支就要增大，国民党一定又要增发钞票。不少商人认为法币看涨，物价看跌价，因此，当时跌价的物资多，黄金亦运进来多。我们的措施是：边区的边币^②不动，物价不动。因为当时我们的物资库存充足，品种比较齐全，加上大批人员调出边区，消费减少，这些因素都大有利于我们开展业务，不怕物价波动。商人要出售的物资我们予以收购，人民需要的物资我们尽量供应。把库存的法币运到关中、陇东、定边一带，到蒋管区按涨价的法币价格购进跌价的黄金和物资，为打仗准备财力和重要物资。

这段近两个月时间，工作特别紧张，各个分公司的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收到的黄金十多万两，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细布（雁塔、龙头布）两万多匹，棉花十多万斤。至此，法币价值又开始下跌，黄金价格又开始上涨，物价也开始上涨。而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物资雄厚，边区的金融、市场也很稳定。

（五）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胡宗南率领几十万国民党军向延安猛扑过来。我们忙着疏散物资，汽车、驮骡队日夜不停。可是没有一定的后方，四处都是物资，也无法尽快取得通讯联络，物资疏散工作一时有些忙乱。敌军进了边区，步步逼近延安，我们把财

注①②：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边币；法币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钞票。

贸机关、银行等撤退到安塞。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靖边县和安塞之间一直住了两月之久。敌人找我主力决战，用大兵力向清涧、绥德前进。我们的重要物资二百多驮（其中包括黄金十万多两，是用木箱盛的。）放在清涧靠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由郭林森带一个警卫班看守。好险呀，敌人到了离这个村子五里路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的掩护，没有走漏一点风声。敌人没进这个村子，在前面那个村子宿了一夜营，第二天便收缩到蟠龙做工事。彭德怀同志知道这批重要物资，特地派保管科长谢扶琴带一排驮骡，准备将物资运到清涧转移。谢扶琴到达时，郭林森已在晋绥边区后勤部和贸易公司的大力帮助下，将大部分物资和黄金渡过黄河，放置在柳林和军渡之间。郭林森和谢扶琴又把这批东西转移到临县和兴县之间的一个村子里，就更为安全了。如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异常激动。多亏人民啊！要不是他们帮助掩护，我们搞了两年的钱和物资，就会丧失殆尽。另一方面也得了教训，这就是无后方作战有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次若是遭受损失，则军队的供给、金融市场都要成大问题。

此后，我军转向西面，在陇东地区寻找敌人弱点打击敌人。

我当时任贸易公司总经理。彭德怀同志想到军队棉衣问题，要我随军贸易，收购物资，解决棉衣问题。我到指挥部后，在后勤部住着。胡宗南部队受打击后，调青海马步芳骑兵来参战。骑兵在当时是很机动的，你走一夜，他只用一个早晨就赶上了。这时部队的采购工作困难极大，若不是群众条件和“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政策，军粮都要成问题。好在我们实行了这个政策，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深藏起来（包括公粮）。我们的军队到哪里，群众都把自己的粮食和油拿出来供我军吃。敌人来了，则找不到

人和粮食。

我随军了解到一些情况后，与刘景范同志商量，我先回去，到其他地区去采购。刘同意我的主张。我请他转告彭德怀同志：保证部队有棉衣穿。

我们的布匹、物资都寄放在平桥一带群众家里。我回到平桥时，机关已移往绥德的义和去了。运输队在转运布匹。清点后，少了十一匹，不知错在哪里。棉花没藏好，大部分被敌人烧了。我到义合后，立即给晋绥后勤部长陈希云去电话，要晋绥贸易公司向太原、北平、天津吸收布匹，在平原收购棉花，拨黄金三万两。并要后勤被服厂增加力量，赶制棉衣和棉被。这任务陈希云完成得很好，天寒时部队都穿上了棉衣。

这时，敌人用更大兵力从陇东、关中、延安向我出击，企图压我军过黄河，或在黄河边消灭之。这时毛主席和中央同志亦撤到黄河边。我后方人员和物资全部东渡黄河，在临县、兴县驻扎。在渡黄河时，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银行副行长听谣传说敌人来了，怕“资敌”，赶紧把三百多两黄金和一些重要物资投入黄河，结果敌人并没有来，过河后被逮捕。后查明他确是一个书生，没打过仗，便释放了。

敌人占领清涧、绥德后，即向我军进攻。我军在沙家店大胜胡宗南主力军，使之失去进攻的力量。马家骑兵也不敢深入边区。这时延安、关中、陇东、定边的贸易公司，又回到当地开展贸易工作了。

（六）

一九四八年春节快到了，部队在绥德一带休整过春节。贸易工作就紧张起来了，要筹备吃的、用的，猪肉无法解决，只有羊

肉还可解决，牛肉也不多。预定供应总数二万五千只，分派各贸易分公司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并要如期送到绥德交贸易总公司，分发给军队及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各机关。当时天气不好，下了一尺多深的大雪。在党政支持下，共买进三万头牛、羊，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如期送到了。在敌人进攻，破坏严重的情况下，部队没想到能过这样丰盛的春节。那是由于我党在边区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群众有了一些家底，又打了胜仗，群众很拥护。

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已迁移到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并讨论了财政、经济方针及如何接收敌人的政权和经济机构，决定保留保甲制度。这一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对我军筹集粮草起了很大作用。部队到一地，就地有人筹集粮食，有饭吃，这就解决大问题了。

春节过后，贺龙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代表西北局召集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边区的财经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绥边区陈希云和负责财贸工作的主要干部；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的贾拓夫、白如冰和我。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毛主席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在晋绥、陕甘宁边区具体实施，即集中人力、财力，“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准备反攻，接收城市的政权和经济等。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抽出人力，必须合并机构，精兵简政，才能集中力量，支持打仗。决定晋绥贸易公司和陕甘宁贸易总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总公司，由我任经理。晋绥派刘卓甫、余建新为副经理。晋绥农民银行和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改为西北农民银行；为了集中使用力量，归贸易公司领导，由我兼任行长，乔培新、张定为副行长。晋绥银行改为分行。货币统一发行，收

回原两行发行的旧币。

我军攻克宜川后，延安敌军连夜逃走。各边区机关随即撤回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适应反攻和接收工作的需要，进行了整编，机构改为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农林厅、工商厅。工商厅由我任厅长，刘卓甫、余建新任副厅长，主管工业、商业、银行、工商行政工作。这精干的小机构，工作效率特别高，扯皮的事情大大减少，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恢复特别快，市场很快繁荣起来。这时西安一些大、中专院校学生在地下党支持下进边区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吸收了一些加以培养，对发展边区财政经济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七）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随后成立华北政府，贺龙率陈希云、王磊和我一同去开会。经晋东南的壶关、长治到邯郸。我们乘的是一辆中型吉普，要连夜赶到石家庄去。在石家庄休息两天后，中央派车来接我们。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参加了华北政府成立的庆祝会，并研究华北、西北的财经统一，以增强财经力量。当时参加研究的人员是：姚依林、林海云，西北方面是陈希云、王磊和我。研究后决定西北统一于华北。后因形势发展比预料的要快，要好，难于执行，此议作罢了。

我们回来时是从阳泉到同浦路，在汾阳下车，当天回到军渡的。贺龙、陈希云、王磊回兴县了，我回到延安。

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在休整后，转向邵阳、浦城、韩城一带，威胁西安。我贸易系统即派梁受民以邵阳为中心，开展贸易和银行工作。

我们在晋绥边区的物资已大部撤回延安，小部分给晋绥了，

黄金亦拨给两万两。有往来的部队亦给一部分黄金，带回延安的只余三万多两，向西安商人陆续抛售一点，只收边币，不收法币。这样一来，边币的信用大大提高，流通到西安城内去了。其时国民党已经没有黄金抛售了。

为了紧密配合军事行动，搞好接收工作，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将银行的工作独立进行，增加干部和培训干部。银行作为常设机构准备接收工作，拟定各省负责接收的领导人 and 干部班子。进军哪一省时，即由预定的领导人带一批人马和一定的物资及资金，随军去开展贸易，支持货币。货币一流通有信用，军队的供给就地即可解决了。这些准备工作，在一九四八年冬就准备好了。

当时陕甘宁边区各地还存放着不少的物资，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经研究决定留马帅冉在延安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这年冬太原解放，除阎锡山带少数人坐飞机逃跑外，其他无一漏网，缴获甚大。至此，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就更巩固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我军占领潼关、渭南一线，我接收人员从延安赶到西安做接收准备工作。我组织随军贸易机构，一面开展随军贸易，稳定市场物价，一面接收敌人的机构。史唯然带领贸易干部随总部行动。确定李维新负责接收陕西省的贸易工作；余建新负责接收甘肃省的贸易工作；郝怀仁负责接收宁夏省的贸易工作。干部由定边分公司抽调，今后仍归陕西省领导。还派薛宏福负责接收青海省的贸易工作；高燕先负责接收新疆的贸易工作。新疆和平解放，从关中分公司调去干部。

我军攻打宝鸡、天水后，直捣兰州，宁夏亦很快解放。晋绥、

陕甘宁边区准备配合二野进攻四川，由贺龙同志领导组织入川的准备工作，刘卓甫负责入川后的贸易工作。

至此，西北五省都解放了，原陕甘宁边区积下来的钱用完了，物资也不多了。各地新的贸易机构建立起来，新的艰巨任务又摆在面前，那就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稳定市场。我们一股作气，担负起新的使命，投入了新的战斗。

（凌辉整理）

延安南区合作社简史

多田正子

延安南区合作社是一九四三年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模范单位之一，它的主任刘建章同志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特别介绍了南区合作社，表彰它的工作。

多田正子女士是一位攻读过汉语的日本朋友。她读到作家欧阳山同志以南区合作社及其主任刘建章为模特创作的小说《高干大》以后，深为刘建章等人的献身精神感动，将这部小说译成日文。并在一九八〇年来华访问，同欧阳山及原南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用



多田正子女士一九八〇年访华时与当年南区合作社副主任王耀明同志合影

汉语写成这篇《延安南区合作社简史》。

这篇文章史料翔实，文字简洁，是研究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一篇很好的资料。本文标题系多田正子女士的手迹。

——编者

这里所说的合作社不是中国解放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而是解放前在农村的一种群众性供销机构，保护农民不受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当时农村没有工业，故合作社是联系农村和城市的重要桥梁。中国共产党从很早就重视这种合作社，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合作社运动列为农民运动十四件大事之一。他明确指出：为了保卫农民的生活，必须设立消费、贩卖、信用等三种合作社。中国革命从农村开始，一开始就要发展并组织农村的经济，办合作社就显得尤为必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合作社。十二月通过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接着，在各个苏维埃区试办了消费、生产、信用等三种合作社。

一九三五年十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十一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这一年的冬天，在延安县南区^①试办了合作社。当时在打仗，群众生活很不稳定，合作社也没有铺面，全靠工作人员背着包袱串乡。由于群众不理解合作社，货物来源又少，所以并没成功。西安事变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延安县政府响应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号召，

作者注^①，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有五个分区（陇东、关中、三边、绥德、延属），在分区下面有县，县下面有区。

决定在南区沟门正式创建全县第一个合作社。由于当时边区还不能生产纸张、火柴、布匹、农具等工业品，国营商店也没有建立（边区第一个国营商店——延安光华商店在一九三七年建立），农民只有到城市在私商那里用很贵的价钱买生活日用品。

起初，南区合作社只有主任王天经，会计刘建章，采买李生章三个人。他们都是由上级派来的。由于前次办社失败，群众不信赖合作社，起初只好采取半摊派半自愿入股的方式，规定每股三角（苏票^①），每人最多不能超过五股，只能入股，不能随意退股，社员急需用钱时，得事先写申请经理事会批准，才能等下一期结算时把股本取回，还不准拿红利等。这种不顾实际的“条条、框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在“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中除有上述限制和合作社种类的限制外，还有“须先将章程、股本、社员人数和营业项目等向当地苏维埃政府报告，经审查登记后，领取合作社证书，才能开始营业”等规定。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刘建章先在亲友中借了一点现款，到外地买进了一些食盐、火柴、布匹、针线、鞋袜等日用必需品。买回来以后，他便挑起担子，走乡串村，一面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群众卖货，一面宣传群众入股，并提出“谁加入合作社，合作社就卖货给谁，价格比市价低”。群众缺钱时，他就收购土产（如羊毛、皮革等）带到外地去销售。这样提高了群众对合作社的认识，社员发展到一六〇人，入了五三三股，共收集股金一五九

作者注^①：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成立后发行的苏维埃货币，一直使用到一九三七年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改用国民党发行的法币。

元九角，三个月以后长毛利一九九元。

限制一个人最多不能超过五股，使合作社经常感到资金短缺，为了增加资金，刘建章主张不限制入股。王天经认为没有限制，私人入股多了，就会操纵合作社，滋长资本主义。刘坚持说合作社并不是国营商店，如果合作社不发展，私商就增多，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市场没有好处。后来，把问题汇报到上级政府，在县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刘世昌的支持下，终于得到了解决。一九三七年三月，刘建章当了南区合作社的主任。

刘建章当了南区社主任以后，不限制股资的多少；社员有困难急需用钱，不仅允许退股，合作社还给以贷款。芦沟桥事变后，国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边区政府决定收回苏票，三元苏票换一元法币。为了不使群众受损失，南区合作社决定：一切入股的苏票，都当做法币计算。这样存有苏票的老百姓争先入股。一九三八年秋天，农民很需要犁铧，刘建章用每头牛入一元股金的办法筹得一笔钱，亲自去韩城，买回两千张犁铧，廉价卖给群众。另外，入股二十元者，合作社就解决他的一切日常需用品。入股不限于货币，一切实物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都可以折价入股。结算起初三个月一次，后改为半年一次，再改为一年一次，使合作社在运用资金上更为灵活。

一九三八年五月，南区社由沟门移到柳林，新开设了一个门市部、一个骡马店(是脚户的一种旅馆)，将沟门改为分社。柳林离延安城很近，在公路旁边，附近盛产木料、木炭等。这对于发展合作社很有益处。

为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为群众办更多的事，一九三九年六月，南区社和一个名叫文表六的私商一起在三十里铺开了一个铺

子。南区社出二百元，区政府一百元，私商七百元。当时私商被认为奸商，上级不同意与其合伙，故创建的时候不能称“社”，只称“兴华号”。后来得到上级的同意，称“兴华社”，为南区社的分社。

“兴华社”标志着和当地私商合作的民办合作社的诞生。民办社既可以凑比较多的资金，又吸收了私商到合作社工作，不仅解决了干部不足的困难，能够利用商人的经验和社会关系，而且可以教育改造这些人，逐渐把合伙转变为一般的合作社，这是合作社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益加紧，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也日益加紧。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兴起了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南区社把“合作社要民办”的政策推广到整个南区，在南区各地办了七处分社。这些分社都是由南区社投资一部分又吸收私商以及群众的大小股金而建立起来的。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入股多少不限，社员资格不限，改变了过去强迫命令，摊派股金，限制多的方法。主任及工作人员是从社员，特别是从农民中选拔的。社务业务民主管理，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包办代替、委派干部的作法。各个分社服从南区合作社的计划和方针，接受南区社的指导和检查，但在业务上、组织上又各有其独立性。合作社的业务初步形成了兼营消费、信贷、运输和生产的综合性合作社。所以把原来的南区社改为南区合作总社，刘建章任总社主任，王耀明任副主任兼会计股长，并调南区区委书记白玉德、区长张和堂分别担任总社的指导员和副主任。

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是南区社的初建时期。当时合作社的规模比较小，主要是经营消费品，以刘建章为首的合作社

干部经常背着包裹，挑着担子，跋山涉水，下乡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建设厅根据南区社的经验提出了“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公助”的方针，之后，各地的合作社运动也走上了轨道。

二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是南区社组织规模和经营范围大为发展的时期。一九三九年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集中兵力推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和“扫荡”。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实行了反共路线，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包围封锁边区，完全断绝了边区和外界的经济往来，在边区出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被盖的情况。

南区社在一九四〇年建议要在三、四年内通过合作社自己动手解决穿衣问题，并决定在南庄河建立纺织工厂，但没有技术工人和设备。刘建章等人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从自己的老家乌龙镇找到了技工和织布机、纱。就这样，开始了纺织，同时号召村里的妇女纺纱。但是，有的妇女担心赔工、赔钱，有的害怕变成公家人，不愿纺纱。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纺纱的人，合作社规定一斤棉花纺半斤线(余下的是纺纱人的工钱)。这种鼓励办法，大大调动了妇女纺纱的积极性，很多不会纺纱的妇女主动学习，也去合作社领花纺纱。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南区社和边区建设厅合作指导局一起表扬了成绩显著、热心传授技术的纺线模范，并宣布了新规定：一个月能纺五斤线的奖毛巾一条，能纺十斤线的奖毛巾两条，纺的线不论好坏，合作社都收。纺线的收入全归家庭，政府不增收公粮。这样，纺织运动不断发

展，不仅满足了新合工厂织布的需要，而且还向公营织布工厂供应上纱。由于公营织布厂分级论价，在头一年，南区妇女收入虽多，南区社却亏损了。以后，南区社也分等论价，对纺线好的，除给工资外，还奖励毛巾、袜子等。后来又设立了织袜厂。纺织运动使在家里的妇女参加了社会活动，接近了合作社。南区社总是以群众的实际利益为出发点，起初亏损一点也不担心，仍然积极工作。由于南区社的积极赞助，群众不仅纺出了好纱，而且以后织布也大大普及了。

宁夏回族地区的盐池一带出产很多盐。这是边区主要特产之一。盐池一带过去是盐水湖，现在虽然是沙漠地带，土中仍含有大量的盐，满地白色。人们挖坑放水，再放入“盐根”（大约三毫米长的小东西），一个星期左右之后，“盐根”上就会有大量的盐结晶，捞出晒干即可食用。边区农民除自己食用外，有时也把盐带到边区外换生产日用品。一些脚户去盐池运盐，南区社不仅给他们贷款作资本，而且给他们发一面写着“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旗子。打上南区社的旗子，就是为公办事，可免支差，这个办法很受欢迎，一直继续到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〇年边区政府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经济封锁，发出运盐号召。南区社积极响应，号召过去熟悉的脚户，吸收光华商店的投资，规定了“三七入股，对半分红”——即十成股金，合作社和脚户入三成，光华商店入七成；十份红利，合作社和脚户分五份（其中合作社只占一份），光华商店分五份。有的队贩卖违禁物品，发生了一些问题，后来进行了整顿。

一九四一年政府规定：除贫苦农民和抗属、移民难民之外，所有农户按家庭经济情况，分别负担运盐的任务（公盐）。一九四

一年，政府分配给南区的公盐任务是九百五十驮（一驮是一头牲口能够驮的重量，一般是一百五十斤。一九四一年的一驮算一〇五斤，比通常的一驮少四十五斤）。刘建章经过详细调查后，决定要包办南区的公盐。凡是每个农户应驮交的公盐数，按市价折成代金（每驮四百二十元）交给合作社，不仅算完成了公盐任务，而且算做农户向合作社入的股金，还能够赚红利（当年不分红利）。当农民没有现款时，可以用一切有价实物折成公盐代金。用这种办法，南区社完成了包运公盐的任务，农民又能专心种地，大大地帮助他们。

一九四二年，南区的公盐任务是八百二十驮，南区社也如数完成了。

运公盐是政府向农民摊派的任务，南区社包运公盐，既保证按期完成政府的任务，又使农民得到股金，给政府和群众都带来好处。以后南区社对公债、公粮等也采取了这一办法。当时的公粮任务重，用累进税法，对多打粮户征收公粮多，群众的农业生产情绪低落。合作社包办公粮，稳定了群众的情绪，对发展农业生产很有利。另外，还包交有奖储蓄券、教育经费、自卫军放哨费等政府分给农民的负担、义务。合作社真正起到了政府和农民间的桥梁作用。

医药合作社（民生公药社）也在一九四〇年成立了。当时疾病流行，没有医生，群众迷信巫神，受害极深。巫神“治病”太野蛮、太凶残，现代的人简直不敢相信。当时很多妇女生孩子得病死亡，妇女到了三十岁就显得很苍老，不能长寿。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县、区政府召开过反巫神大会，教育和批评不科学的作法，对个别能扎针号脉开药方的，发给医生证；还召开过多次医

生大会，献秘方、交流经验。有的巫神不认输，一九四〇年前后，有一个叫陈项的巫神和妻子一起闹鬼，要赶走村里的人。对农村的这种情况，刘建章不采取强制命令的办法，而与中医兼阴阳先生的董四海合伙办起了医药社，并说服董先生，让他一面行医治病，一面现身说法，以自己的过去说明阴阳巫神是怎样欺骗人的。这活生生的宣传发生了很大的效果，人们开始对巫神的鬼把戏产生了怀疑。到了第二年，刘建章又把合作社的迷信品由消费营业部搬到医药社，群众来买就宣传医药治疗，说明烧香敬神是枉花钱。董先生平常出诊都收必要的医药费，表示医生对病人负责。因为他曾当过阴阳先生，有些群众如遇丧事，总要请他看风水，他就应付行事，不收任何费用，以表示“不顶事”。他要群众将这钱入股，叫“迷信入股”。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南区社遭到山洪袭击。南区社在山沟里。山上树木很少，一场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幸亏没有人死伤，但南区社的房屋等等一切却都被洪水冲走了，共计损失一百三十万元。他们并不灰心，刘带领别人出去购货（这个时候，由于遭日本飞机轰炸，他的一只耳朵聋了）。张和堂下乡向群众报告合作社的灾情，动员群众入股。王耀明搞修建，重建家园。由于新的股金和边区、县政府的援助，秋天就修复了。这一年，南区社虽然遭受特大洪水，损失严重，但成绩比建社以来任何一年都要大，群众给南区社起了一个名字，叫“搬不倒”。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群众的反映，编了一个文艺节目《不倒翁》，专门介绍南区社的事迹。

一九四二年底，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十二月在延安举行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做了题为《经

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经验。其中他指出了南区社的优良特点：

第一、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项事业。它组织了纺织、榨油、制毡等六个生产合作社及一个拥有百余头牲口的运输队，是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社。

第二、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它逐渐被群众所爱戴。如每年春耕时，事先从韩城等地运犁铧，以比市价要贱的价格卖给农民。组织各种生产事业，不仅吸收了失业工人，招收了学徒，安置了工作人员的家属，而且扩大了事业的赢利，保障当地人民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第三、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经过合作社，一方面贯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一方面又调剂人民的负担使其更加合理化，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人民的积极性。比如一九四一年政府动员驮公盐时，南区合作社要南区人民交纳代金给合作社，而由合作社的运输队代替人民驮盐交政府……如此种种，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间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四、它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不开社员全体大会，而由社员按村选举代表到会。不采取摊派入股的方式，而是团结社员的积极分子去劝导人民入股。不限制社员入股数量

而照股分红，但在解决合作社的一切问题上，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一社员都有平等权利。

南区合作社，从一九三六年起，经过六、七年的摸索与艰苦奋斗，到现在，已由一六〇个社员发展到占南区户数百分之九十以上，自愿入股的一一一二个社员，股本由一五九元发展到二百万元，由一个社发展到十六个社，净利由数十元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十个月统计的一六二万元。它发展了南区人民的农工商业，照顾了南区人民经济利益的各方面，成为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因此，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高干会上，毛泽东还把刘建章写的一个关于南区社发展情况的报告，介绍给到会的同志，责成边区建设厅负责调查研究南区社的经验，写成小册子，作为县政府第四科（即建设科）及各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教材，并号召边区各地的干部去参观南区社。南区社作为三个先进集体（南区社、延安县、三五九旅）之一，刘建章作为二十二个经济建设英雄之一^①，受到奖励，领到了毛泽东亲手写的“合作社的模范 书赠刘建章同志 毛泽东”的奖旗。

在这个《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说：一九四一年边区有一百五十五个消费合作社，一九四二年十月有五十个生产合作社。

一九四三年春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先后发出了关于组织变工、扎工，劳动互助，开展春耕开荒竞赛的号召。南区

作者注^①：二十二位劳动英雄是：王震、何维忠、晏福生、罗章、黄静波、刘秉温、王丕年、惠中权、刘建章、王世泰、杨林、范子文、胡起林、马文惠、马锡五、王维舟、李丕福、习仲勋、文年生、任成玉、贺晋年、罗成德。

社就发放耕牛贷款。一方面派人到外地去为农民购买犁铧，并且开设了铁匠铺，自己动手赶制铧头，一方面推动群众组织变工队和扎工队。这些工作不但对一般的农民有好处，而且对从外地来的移民难民也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农民迫切需要资金，以扩大再生产。南区社于一九四三年办了沟门信用合作社，办理存款和借款。南区总社和分社配合政府创办了农场以扶助移民难民安家立业。他们对群众和机关单位双方交易承担责任（不从中取利），若订一万斤木炭，单位交给群众一万斤木炭钱，群众分月送交木炭，拿这批钱买成骡、马或驴子，可赚下几头牲口。机关单位建筑用的、做家具用的木料、木板、石料、燃料，都和木炭一样做法，给群众增加了经济收入，又方便了单位。

一九四三年政府分配给延安县的运盐任务是一万八千驮（公盐六千驮）。南区社决定以延安县作一个单位包运，就是以南区社的运输队为基础成立全县统一的运盐队。刘建章当了主任。当时政府规定每驮公盐的代金为一千元，南区社为了扩大运输队的流动资金，每驮又加收二百元。以公盐代金，群众合伙的、盐业公司^①、光华商店、蟠龙合作社等单位来的资金，组织了运输队，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统计，运输队有资金七百二十万元，二十七分队，六百四十八头牲畜，超额完成盐二千五百驮。虽然盐价很不稳定，利益不大，但牲口涨价，获了利益。南区社采用了“四六入股，对半分红”的股份办法（入股个人四、合作社六、分红各五），让私人脚户多分得一点红利，使他们乐意合作。南

作者注 ^①：一九四二年和土产公司一起成立。作有关公盐的对内推销和对外出口工作。当时出口货盐占90%，皮革、药材等土产占10%。

区社负责对盐业公司的交涉，医治牲口疾病。对模范分队、队长、队员，随时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奖励。各分队由运输大队统一管理，股东当队长，经济独立核算，盈亏各自负责（实际上每个分队都是一个不同组织形式的运输合作分社），充分调动了各分队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这一年的运盐，不仅利用了公盐代金，而且还吸收了私人资金和公营部门的资金，所以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个时期的南区社实际上成为延安全县的中心社。这一年的运盐很有名，木刻家古元、诗人艾青也自愿参加了。这样合作运盐，还推动变工、扎工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四四年后，边区经济情况好转，取消了公盐的任务。

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南区社主任刘建章作为合作英雄出席了这个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做了《组织起来》的著名报告，其中介绍了南区社。他指出：“目前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①，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南区社的刘建章和王耀明、刘永祥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模会议，再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别的十五名特等合作英雄^②一起受到了嘉奖。

编者注^①：毛主席在这里讲的合作社，是指农业生产合作社、南区社式的综合性合作社（兼营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业务）、运输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

作者注^②：十七位合作英雄是延属分区的刘建章、曹玉科、刘永祥、樊彦旺、安长庚、肖洪启、王耀明、周岐山，陇东分区的侯生裕、李建堂，三边分区的田保霖、陈丕秀、斯体元，关中分区的张清益、贾恒春，绥德分区的张丕元、安锦城、牛爱彩。

一九四四年三月，南区社以公益金中的教育经费为基础，采取群众入股的方式，在南区沟门村创办了沟门民办小学。当时的学校学生都住在学校里，一切费用都由小米、白面等实物交纳，不过实行合作后，只要每年向教育合作社入一笔股金，学生的伙食、住宿和文具等都由合作社负担，再不要家庭操心了。同时开设了夜校，八月召开了识字英雄大会以后，甚至巫神也有来学习的。

一九四四年春天，南区社创办了干部家属合作社，让政府干部和合作社干部家属参加织袜生产，同时教他们学习识字。

一九四四年初，南区合作总社拥有各种店、社、厂、坊等十六处，其中直接经营的四所，直接领导的合股企业三所，分社九个。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经营范围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加，某些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和脱离群众单纯追逐红利的错误倾向。如为了追求红利，他们放松了对群众日用必需品的供应。营业部的某些货物价格比市场上的还高，有些日用必需品又没有备办，却用很大的力量去从事发展生意，甚至进行商业上的投机。为了使合作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南区总社开了大会，严肃地批评这些错误倾向；开始全面检查，紧缩业务范围。但个别人不接受教育，仍继续做个人生意，一九四七年一月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把三个屡教不改分子开除出社，其中一人交政府依法惩处。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南区社带领秧歌队，到毛泽东当时的住地王家坪拜年。作为回拜，毛泽东在元宵会和长子毛岸英一起来视察南区社。同年五月，毛泽东还视察了南区社的合作职业学校。

南区社经过一九四六年四月的社员代表大会，决定以初创时

期的精神坚持工作，又办了南庄河村小型合作社，推动妇女自纺自织。在南庄河村的影响和带动下，许多村子都办起了小型消费合作社。在交通不方便的农村尽量多办小型合作社来提供群众生活日用品，这就是合作社本来的宗旨。教育合作社于一九四六年初将沟门民办小学与新合纺织工厂合并，作为合作职业学校，让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生产(纺织)，教育和实践相结合。另外，号召妇女上学识字，刘建章首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媳妇送进学校。

当时的南区社，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开一次会。代表以村为单位，由社员小组直接选举，从二十个人里推选一个代表。在选举和表决时，不分股金多少，每个社员都有平等的权利。社员代表大会还有权罢免不称职的合作社干部和开除不良的社员。在社员大会上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会每月举行一次，负责管理和监督社务、业务的进行。合作社的上级领导机关是延安县联社、延属联社和边区总社，并受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指导局的指导。——这种组织形式充分保障了民办社方针的实施，使民办社成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的桥梁。

三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以十倍于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向延安扑来。中共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号召坚壁清野。南区社整顿了各地的经营部，有的人跟随部队北上，有的人参加战时救护服务团，也有人参加游击队离开延安。王耀明等担任了坚壁清野工作，先把盐和粮食用记帐的办法发给群众，将纺纱机、织布机等不易携带的生产工具就地掩埋起来。其他如棉花、布匹等物资，全部驮运出去，转移到安塞、志丹县

一带，并把运输队的七百多头骡马交送军队、支援战争。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开始转入反攻，四月二十二日光复了延安。王耀明在瓦窑堡见到了刘建章，谈到再办南区社。南区社的楼房已变为一片瓦砾堆了。王只好到七里铺过去南区社的集成过载栈（运输的转运站）的地方住下，不几天，就挂出了“南区合作社”的牌子。先开始对农民发放籽种，农具等，三个月以后就恢复了纺织业生产。

“一匹雁塔布”的故事至今还在南区人民中传颂着：南区有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叫梢元梁。南区社的张和堂在这里办起了小型消费合作社。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时才停办。张和堂和群众商量，用资金买成布匹、食盐、颜料等，分借给村里人使用。唯有一匹雁塔布不好分开，张和堂亲自背着随游击队转战走了。一年之后，延安光复，没想到他把这匹布又背回来了。不几天，他们用这匹布及收回借出去的食盐、颜料等作为资金，又恢复了小型消费合作社。

延安光复后，在比过去更艰苦的条件下，南区社还担负了支援解放战争的任务，他们组织长期脚力，包运战勤。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整顿组织，合作社变为国营商店的供销社。现在一般的供销社都按所在乡的名称“×××供销社”。但，南区社虽在柳林，为了纪念原来有光荣传统的名字，至今仍叫“南区供销社”。

为了纪念创业四十周年、毛泽东视察三十周年，一九七六年南区社把柳林的房屋按着原来的样子重新修建起来了。在一九七七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了盛大集会，当年曾经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们欢聚在一起，隆重纪念毛泽东视察三十周年。

现在，延安市有二十三个供销社。南区供销社是其中之一，担负着延安市柳林公社二十三个大队一万一千多人的购销任务。我访华的一九八〇年夏天南区社共有职员四十人，设有三个门市部，三个分销店，十六个代销代购店。

解放后，全国整顿组织，供销社在农村里只担任购销任务了。南区社过去的干部都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了解南区社光荣历史的人不那么多了。但，我实在佩服他们在那残酷战争年代坚持工作的精神，坚持群众办社、政府不干涉的政策，尽量汲取人民的智慧，依靠群众的路线。我认为南区社过去的办法现在仍很适用，应该再给它更高的评价，再学习它。

塞 上 风 云

——回忆邓宝珊部十一旅起义始末

贺晋年

陕北的安边、定边、靖边三城从西到东排列在长城脚下，是我北国古战场之一，常常成为军家争夺之要地；蒙、回、汉三个民族在这里交界和杂居，因此又是三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这里地势开阔，天高云淡，辽阔的草滩上放牧着成群的马、牛、羊；每年都举行规模盛大的赛马会，就是抗战期间也未间断过。骆驼商队往来其间，驼铃声不绝于耳。一九四五年十月，这儿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原国民党邓宝珊部十一旅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起义，曾被毛主席诙谐地比做“火车头”。

十一旅的前身是冯玉祥旧部徐雨生在蒋冯阎大战期间乘机拉起来的几个旅（七、八、九、十三旅）之一。当时，我党为了开展工作，派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到宁夏的平罗、福合堡一带活动。因此，徐雨生的部队中有我党组织。刘志丹同志在八旅十六团任团副，谢子长同志在十三旅当旅长。大约是一九三〇年四、



这是一九三七年四月红军大学一期一科学员合影。站立者左起第一人为边章五，第二人为张爱萍，第七人为罗荣桓，第九人为贺晋年。

五月间，谢、刘向陕北特委要干部。时刘澜涛同志担任陕北特委秘书长，便介绍绥德第四师范、榆林第六中学及地方上几十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我党在八旅十五团办的学兵队学习，这些人毕业后有一部分就留在原部队中，更加强了我党的影响。以后杨虎城、邓宝珊相继进驻甘肃，这些部队也跟着二易其主。十一旅便是九旅发展演变来的。

从土地革命战争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根据地的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中只有两边（定边、靖边）在我们控制之下，安边和宁条梁（靖边伪县政府所在地）一直在国民党手里。抗战时期，十一旅旅部并一团驻安边城，二团驻宁条梁。我曾先后担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和八路军警三旅旅长，司令部驻定边。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巩固三边，西向宁夏，北向伊克昭盟发展，这样十一旅便成了我党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到一九四四年，该旅有我党不少党员（副旅长牛化东，连、营长冯世光、李树林等），还争取了许多同情我党的军官和士兵（代旅长曹又参，参谋主任王子庄等）。由于我党长期的政治影响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攻势，十一旅一直同我们实行联防，共同抗日，摩擦甚少。

另一方面，由于三边战略位置重要，胡宗南对十一旅一直不放心，早想伺机把“杂牌”的十一旅吞并掉。在该旅也有反动军官参谋长石佩玖、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史飭城（二团长）和我党叛徒张丁臣（二团副团长）等与之相呼应。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并且磨刀霍霍，把主力和远在南亚的远征军运往东北和其他地区，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随着形势变化，我党对三边地区的工作方针变化为：巩固发展我党和十一旅的统战关系，保存力量，促进该旅进步势

力，待机发动起义，统一三边。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来了。十一旅的起义，不仅是我党在“三边”地区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并且成了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一个“火车头”，在西北和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起义的导火线

一九四四年，十一旅旅长陈国宾病逝。第一团进步官兵坚决拥护曹又参升任旅长；二团长史钊城垂涎旅长位置已久，又有吴葵（原十一旅政治处主任，后升任副旅长，也是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石佩玖、张丁臣帮他上窜下跳，所以相持不下。最后，邓宝珊还是决定由曹又参代理旅长。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积极反共，为了加紧准备内战，命令邓宝珊将代旅长曹又参调到榆林，企图以武力整编十一旅，并预定史钊城担任整编后的师长。因曹又参不接受这种安排，邓宝珊便不准他回部队。这样，一、二两团形成武装对峙，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发生变故。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几天，十一旅参谋长石佩玖、副旅长吴葵与二团反动骨干密谋，准备把二团从宁条梁调进安边城，以武力整掉第一团。十月十五日，吴命令二团副团长张丁臣率领卫士十余人进驻安边“万发店”，对一团官兵宣扬整编的所谓“好处”，同时用封官许愿的卑鄙手段来瓦解一团的革命力量。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情势紧迫，如不及时起义，一团革命力量即难保全，十一旅的进步势力也会遭到摧残。因此，决定派冯世光、王子庄同志到定边警三旅旅部来找我汇报情况，并请求援助起义。

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准备调我去东北工作，正式命令未下达之前，“三边”地委高峰同志向延安建议，要求留我处理完十一旅的问题后再去东北。

说起来我跟十一旅还有点渊源呢。一九三〇年四月，陕北特委派我们随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到宁夏王子元团的学兵队当兵，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搞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九月我在十一旅曹又参营的四连当过排长；后来参加几次兵暴，都跟十一旅地下党的领导有关。抗日战争期间，我又跟十一旅在“三边”搞联防；统战工作、党的工作都是通过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具体去做的，不论在十一旅的上层还是基层中我都认识很多人。所以，局势变化了，要我留下来处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十一旅的冯世光和王子庄两同志来到定边，商谈有关起义事项，我们决定十月二十七日起义；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驻“三边”保安科科长葛中同志随冯世光、王子庄两同志到安边去，名义上是警三旅的联络参谋，实则秘密地带进一部电台驻在冯世光连里。

不几天，冯世光同志又于十月二十三日到定边向我汇报，说是由地下党员赵武城连长处得知二团已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以长途野营的名义进驻安边整掉一团。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十一旅提前于二十五日起义。我对冯世光同志说，届时将派我旅的参谋长张文舟同志率领先头部队去安边，大部队随后就到，支援起义。

安边得解放

十一旅旅部及驻安边一团的起义工作，虽然处在急迫的情势

之下，由于有长期的工作基础，组织领导又比较周密，进行是很顺利的。从一九四五年春开始，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即按照上级党的意图，在一团办了两期军训班，训练班、排以上骨干。军训班主任是王子庄同志，他那时尚未入党，但一直为党工作。第一期军训队长是李树林同志，第二期军训队长是冯世光同志，都是当时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这次训练，名义上是军训，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 and 民主革命教育。这些经过训练的骨干，为十一旅反蒋起义打下了良好基础。另外，为了团结党外人士，促进十一旅的进步力量的发展，经“三边”地委研究同意，于一九四二年就在十一旅成立的统战性质的群众性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在推动十一旅的上层人员参加起义的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决定十一旅提前起义的指示下达后，十月二十四日晚，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城、高昆山等同志，以及从我们这里派去的葛申同志，共同开会研究，由牛化东同志担任起义总指挥，并命令驻防白泥井的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要听从调动，同时将该营朱子春（地下党员）领导的第六连调进安边执行任务。

十月二十五日拂晓，起义军开始行动。首先，围攻旅部，扣押了副旅长吴葵、参谋长石佩玖，以及伪县长和国民党安边县党部书记长、伪公安局长等人。同时，冯世光同志立即带人来到“万发店”。这是十一旅过去的头头们自己开的一家骡马大店，专门接待南来北往的商人旅客，既是客店，又兼做生意，烟土、毛皮、布料、盐巴什么都有，满院子拴的骆驼、骡马、毛驴等。这儿还是十一旅某些有烟、赌嗜好的官儿们聚赌、抽大烟的地

方，经常是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烟气腾腾，难得有几个清晨是安静的。

冯世光带人闯入张丁臣住的那间大房子里，只见桌面上杯盘狼藉，隔夜的酒席尚未撤去。张丁臣敞着领扣，嘴里斜叼着一支香烟，满屋子里到处坐的是人，也有斜躺在炕上抽大烟的。除了张丁臣带的卫士外，其余的就是他想煽动跟他一齐去整编的一团某些人。他们见冯世光带人进来，张丁臣的卫士们霍地站起，都想抄家伙；他们的盒子枪有的背在身上，有的挂在墙上。

冯世光大喝一声：“你们要干什么？”

张丁臣以为自己胜利在握，便伸出一只手掌向下按了按，他的卫士们又都坐下了。张丁臣不紧不慢地说：“你来得正好，你要是同意整编，跟我走准少不了你的好处……”

冯世光冷笑了一声：“你当然有好处，可没有我们一丁点儿的好处；你别在这儿封官许愿了！”说着手一抬，顶上膛的手枪子弹就飞出去，结束了张丁臣这个叛徒的可耻生命。跟着冯世光进去的人，同时用枪对着张丁臣的卫士，冯世光沉着地向其余的人宣布：“我们起义了！”

这一切情况，葛申同志通过电台报告给我，我不禁脱口而出：“这一枪打得好！”——好就好在对起义持观望和犹豫态度的人起了促进作用；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不抓紧部署力量，宁条梁离安边比定边离安边要近，二团要是抢了先，起义还有夭折的可能。于是，我们决定张文舟同志按预定方案带领七团四个连，赶快开进安边城。

参谋长张文舟同志带领四个连抵达砖井后（这儿离安边城还有三十里路），马上给冯世光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支援起义的队

伍决到城下，请作好准备。冯世光的队伍正好守在西城，张文舟队伍从西边来，当晚即开门纳入。因为动作神速，连牛化东总指挥事先都来不及通知，他听冯世光说警三旅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高兴地说：“赶快欢迎！赶快欢迎！”这时，城内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伪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并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张文舟同志带进去的四个连，分到四城和起义军共同把守。城内秩序井然，秋毫无犯。

十月二十七日在安边城内召开了起义部队和八路军的会师大会。十一旅的参谋主任王子庄代表该旅宣布武装起义，并作了攻打宁条梁二团的誓师动员。会上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同志宣读了支援起义声明。

至此，红旗插上了安边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解放了定边、靖边县城后，曾攻打过安边和宁条梁，因为该处城墙坚固，暗堡工事密布，没有拿下来。现在安边的十一旅一团起义了，只剩下一个二团在宁条梁；打下宁条梁，“三边”就一片红了！

万事俱备

张文舟同志出发前，我们曾商定，必须攻打宁条梁，把顽固、反动的二团消灭掉，十一旅起义的全部成果才能保住；否则，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变化。由于宁条梁城外地形开阔，四面多沙漠，不易接近；所以该地易守不易攻。我们进安边后，宜从速用兵，采取偷袭手段攻打宁条梁。不料此着没有成功，偷袭被敌人发觉。张文舟即拍电报给我，打与不打让我决定。我马上从定边赶到安

边。

我到安边后，决定把警三旅八团的六个连从吴旗调来，部署在宁条梁南面：七团两个连（有两个连留在安边）攻打宁条梁的西门；九团和十一旅一团的一个营从北面进攻。并决心以八团分成三个梯队从南面主攻，爆破手用炸药实施爆破，把城墙炸开后，突击队即用梯子登城，进城后向东发展。宁条梁只有两个城门（西门和东门），东门方向我没有部署部队，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有我们的一个骑兵大队；东南是陕甘宁边区，敌人若弃城而去，只能从西北逃向榆林，我们的骑兵大队就正好在半路上消灭他们。开始，军委答应给我们两门三七战防炮，准备用骡马驮载运来，后未运到。敌人的团指挥所设在宁条梁西北城角的炮楼上，打起来要费点事。

十月底的陕北，已进入隆冬天气了，我们三面进攻宁条梁的部队都住在帐篷里，周围都是沙漠，西北风一刮，飞沙走石，到处昏天暗地，黑夜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指战员们亲自动手，割来荒草，铺在帐篷里面的沙土地上，累了就躺在上面休息休息，饿了就吃点干粮。那时的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小米加步枪嘛，干部战士都一样；若是能喝上点热小米粥，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旅指挥所开设在八团的西侧和七团的南侧。从十月二十七日起义开始，到十一月三日对宁条梁实施进攻，前后共准备了一个星期。我曾亲自带人到城墙根去摸地形。城上的敌人发觉了我们的动静，有时一梭子机枪弹扫过来，有时扔下手榴弹，我们就隐蔽好，等它爆炸了再往前察看。摸清了地形情况，我思考着拿下宁条梁的各种因素：过去我们的装备比现在差，攻坚战难以奏效；就是现在装备比过去好多了，敌人也还是居高临下，很难接

近。另一方面，十一旅已经起义的人们当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跟我们党和人民一条心的，但是也有少数军官对国民党的整编抱有幻想，想升官发财，同时对人民军队严格的纪律生活不习惯；对我们不发薪金，还要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也不很理解。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起义部队。宁条梁不攻克，反动的二团不消灭，地方恶霸地主的基础也不会动摇。这样一来，不仅一团和旅部不能巩固，还会引起其他变化。这是促使我下决心非打宁条梁不可的主要原因。

我翻来复去地想着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作战方案便在头脑里逐渐形成：离城五十米，围着宁条梁挖一道堑壕，把地里挖上来的土，都朝城墙那面堆上去，给敌人造成视觉屏障；另外从斜方向挖许多条交通壕与这条主堑壕相联。这样，我们的火力组织、人员运动和转移，就不受开阔地形的限制了。指战员们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在前面放个哨兵，后面的人就排开来，每人分一段，两三个晚上，这个野外筑城就完工了。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陕甘宁地区的部队展开了一个练兵运动，我们警三旅涌现了许多特等射手，有的战士能把手榴弹扔到五、六十米甚至远达七十多米。我把他们组织起来，站在堑壕里，只要城上的敌人一露头，就开枪射击，百发百中；有的从堑壕里就能把手榴弹投进城里去，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为了在总攻前更多地给敌人施加精神压力，从部署在旅指挥所前面（主要对准宁条梁的西南角）的迫击炮阵地抽调了两门炮，在宁条梁西门外的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掏了个洞，把炮架在这里。迫击炮手在大练兵运动中，学会了红军时期赵章成同志创造的迫击炮直射法，几发炮弹就把西门楼轰开了一个大缺口。

没想到我们使用的这几招，在总攻前果真收到了镇住敌人的效果。战后我从俘虏那里得知（其中有个营长叫米级三，过去我们也认识），当敌人看见我们把堑壕挖成后，离城这么近，他们站在城墙上都傻了眼，精神防线被我们击溃了一半。米级三还对我说，因为过去他们了解警三旅没有战防炮，当西门楼被摧开一个大洞，敌人便产生一个错觉，认为我们没有平射炮的消息不确切。他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了。

总之，经过一周的战前准备，万事俱备，只待下达总攻命令了。

不过，这期间也曾发生两件事，完全可能动摇我们的进攻决心。其一，邓宝珊得知十一旅一团起义，慌忙把曹又参从榆林放回来，让他处置这件事。曹又参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的驻地，因不了解起义的全部情况，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把部队撤回定边，宁条梁的问题不用武力，让他去和平解决。当时，我没有时间去跟他讲道理了，我考虑的那些因素，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把他的来信压下，没有回他的信。其二，没料到进攻的前夜，中央军委从延安给我们拍来一份电报，大意是红军在一九三六年时打过宁条梁，该地利守不利攻，估计我们打不开，不若巩固安边以待时机。这是中央军委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打下宁条梁，安边是很难巩固的；我分析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也不是完全不让我们攻打，只是担心我们打不下来。我军的作战传统，有一条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一定的可行条件下，一个指挥员应该有机断专行的胆识和决心；问题在于，我们的把握究竟有多大？

这个电报正好在下达总攻命令前收到，已是深夜了。我把张

文舟同志请来，马上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再次检查了战前的准备工作：野外筑城，改变了不利于我的地形；在火力配系上，虽然没有攻城直射火力，这两天用八二迫击炮组织对城内敌人的密集射击，也产生了一定效果；进攻时，集中几十门掷弹筒，再组织好特等射手和机枪火力，完全可以把敌人压住；大练兵中，战士们都掌握了一套白刃格斗的硬功夫……。这一切，都坚定了我们的决心，经过讨论，第二天拂晓发起总攻不变。

下半夜了，我跟八团的团长郭宝山通了电话（八团的政委是高维嵩），我说：“你们的把握怎么样？伤亡可能大一点，要忍得住……”电话里传来郭宝山同志坚定的声音：“请旅长放心，没问题！”“那好。拂晓前准备好！”

四点差五分，我又一次跟郭宝山通了电话。他向我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问：“上不去怎么办？我把中央的电报都压下了。”郭宝山一字一字咬着说：“打不进去，我拿头来见你！”

发起总攻

四点整，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从宁条梁南边城墙处传来，这时，影影绰绰只见这里那里闪动着火光，从望远镜里看不清整个战斗进展的情况，只听见响彻晨空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只看见劲峭的西北风扬起的沙尘搅和着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一片混沌。

我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手表，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攻打西

门的七团副团长冯友才首先带人打进去了。但是那里不是主攻方向，我只放了两个连，没有后劲，突破口很难巩固住。电话向我报告，西门的敌人正在组织反扑，副团长冯友才从敌人手里夺过大刀同战士们一起砍杀敌人。我说：“一定要他们顶住！南城的情况怎么样？”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因为是外部爆破，所以爆破效果不理想，云梯已搭上城墙，我们的掷弹筒和机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住了！”我心里沉了一下，炸不塌城墙也是意料中的事，只要把敌人震慑住，能搭上梯子就行，不过，这样就会增加登城的伤亡……正当我寻思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进攻南城的第一梯队已经登城！”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了一句：“命令第二梯队赶快跟上！……”随即拿起望远镜向八团发起进攻的堞壕走去。

这时天已经放亮了，从望远镜里，模模糊糊能看见城头上厮杀的情况。我们的战士用刺刀，敌人则用大刀；这场白刃战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长！八团的第一梯队杀进去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也跟着杀进去了。登城后主要靠的是白刃战！战后，八团的同志向我反映，有个战士在肉搏中，头上被敌人砍了十一刀，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我们部队在大生产中自制的毡帽，挨了这么多刀，却只伤及皮肉，未触及骨头，所以他能坚持拼倒好几个敌人，最后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宁条梁就是靠这样的英雄战士打进去的！

八团进城后，战斗按照预定方案向东城发展。我和张文舟同志在城外沿着墙根往东走。太阳出来后，我们在东门被八团拿下的同时就进了城。通过望远镜，我发现西北角和北城的敌人还在抵抗，便一直朝敌人的团部走去。

这时，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子弹在空中飞啸，迫击炮、

掷弹筒、手榴弹在四周轰响。我们尚未到达敌人团部，在攻进城内的七、八团一部分和攻打北城的九团和一部起义军的夹击下，负隅顽抗的敌人被粉碎了。

我们加快了步伐。忽然，城上传来旅政治部的一位干事的呼声：“史钊城在顽抗中被打死了！史钊城被打死了！”

……听完九团的营教导员李国秀同志关于北城战斗经过的汇报，我和张文舟同志相视一笑，就在占领后的敌人团部里给中央军委拟定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在全体指战员作好充分准备后，经过激战，现已攻克宁条梁，特此报告。同时，我写了一封回信给曹又参旅长送去，听说他看到信时，说了一句：“他真的打进去了！”原来曹又参是不相信我们能攻下宁条梁，才想“和平”解决的！

回到延安

十一旅总计官兵三千五百人。起义的有第一团官兵一千五百人，旅部直属通信、骑兵、侦察、勤杂人员五百余人，总共二千余人，占全部人数三分之二。宁条梁战斗，除击毙二团团长史钊城以下官兵一百余人外，还俘虏米级三、幕寿山等官兵八百余人；该团周效武营官兵四百余人从堆子梁逃向榆林。

打下宁条梁后，曹又参还在白泥井，我回到安边便派人去请他。第二天曹又参回信说马上就来，我们随即派队伍出西关列队欢迎，大家高呼口号，庆祝起义成功。起义部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新十一旅，曹又参任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起义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参谋长，干部名单也都准备好了。改

编后，部队仍驻安边、宁条梁一带。

曹又参同志是陕北人，过去到北平上过大学，一直倾向革命。他当团长、代理旅长时，十分信任牛化东、李树林、冯世光等同志，重视他们的意见；每到斗争的紧急关头，都要找他们商量后才定决策。一九四三年，他曾通过苏建儒同志与西北局联系和请示工作，西北局通过苏建儒同志给了曹又参同志指示，还拨给他的部队三十万伪法币补助金。他和王子庄同志对十一旅的起义都有过重大贡献。一九四七年，曹又参同志光荣入党，成为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

十一旅起义后，我曾陪同曹又参同志到延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一路上，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不停地抽着烟，很少说话。他是在回忆自己和十一旅走过的曲折道路，还是瞻望着未来的前途，当时不得而知。不过，当毛主席在枣园小礼堂见到他，听我介绍这就是曹又参同志时，毛主席笑着握住他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特别是当他会见过续范亭同志（过去当过邓宝珊的参谋长），听续范亭同志说：“好嘛！革命就是象小河汇成大河、大海，你先走一步，邓宝珊也会来的！”曹又参觉得自己心里更坚定踏实了。

接着，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欢迎了曹又参同志；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同志还特为他组织了欢迎晚会，阎揆要致欢迎词，会上演出了平剧《逼上梁山》。

在党中央礼堂里，我碰到少奇同志。他对我说：“我们发了电报，担心你们打不下宁条梁，又得罪榆林的邓宝珊；现在打下来了，好！原来不是不让你们打啊！”

十一旅起义后，经过改编、整顿，成长很快。从该旅在起义

一周年时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以及新十一旅发表的起义周年宣言中，摘录两段，即可窥见一斑：

“去年今日敝旅响应你们争取实现全国和平民主的号召，粉碎国特兼并阴谋举起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从此部队面目一新，士气大振，改革制度，实行民主，内部益臻巩固，力量更见强大，证明你们指引方向之正确。兹值周年纪念日，敝旅官兵在热烈庆祝之际特向你们致敬，愿继续努力、永为人民尽忠，并愿以本部新生，昭告国人，劝海蒋军起义，并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共同努力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

“……去岁日寇投降，方幸国势稳定，和平有望，民主可期，无奈蒋介石仍本一贯反共反人民政策，发动内战，又策划兼并本旅为赢得内战之牺牲品，本旅迫于去年今日起义，深庆从此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共同努力。”

解放后，曹又参同志任宁夏专员，一九六二年病故。高昆山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参加组织起义的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李树林、高宜之、赵武城同志都还健在。我写这篇回忆录是受大家的嘱托，为了纪念故人，也为了说明十一旅当年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所有不愿为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当炮灰的人们的必由之路；十一旅的起义是我党长期工作的结果，是有其内因和外因条件的；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这次起义靠的是“个人关系”、“追求的是个人目的”等等，对这种违反历史的歪曲、造谣、诽谤，必须予以澄清。

当中央红军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尚未传到陕北前，陕甘宁地

区的革命虽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不过，当时进行的学运、农运、兵运工作，也曾播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十一旅起义，也是我们党的初期工作中，在兵运方面播下种子的一个收获吧！

（一九八三年二月）

帮助卫立煌部脱险

周 长 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党努力争取全国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和我党抗日政策的教育、感召下，特别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表以后，国民党中有许多将士纷纷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站到抗日救国这一方面来。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第十八二战区司令卫立煌(右)在谈判期间合影。
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卫立煌，率领其四个军十几万人的兵力，在山

西峰义县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由于指挥失误，部队遭到日军三面攻击，节节败退，一直被逼到黄河边上，丧失了八个旅的兵力，剩下的四个旅也走投无路，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卫立煌束手无策，准备孤注一掷，西渡黄河。

当时八路军在太行山和平县一带打游击。一天，我奉团长杨得志之命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到敌后兑九峪去运一部采煤机。出发前，团长对我说：“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你们不但可能被敌人袭击，而且还可能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我担心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驻在黄河边上的卫立煌。他们是友军，但又会阻拦我们越过他的驻地到敌占区。对他们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周长胜同志，记住你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面前都代表八路军。”

“是！我一定记住。”我向团长保证说。

果真，在路过卫立煌指挥部门口的时候，我们被卫立煌派来的一个参谋截住了。我只好带两个通讯员跟那参谋到了卫立煌的指挥部。

指挥部里，卫立煌正站在一张矮桌子前，凝视着十几只电话机子，看样子是一筹莫展；他的黑高个子中将参谋长也伏在一张放在炕上的地图桌上，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抓着蓬乱的头发沉思。看来都在为突围的事发愁。

卫立煌叫人把我们拦住，但对我却十分冷淡，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始问话。我知道，象我这样一个下级军官，又穿着粗布衣和草鞋，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他对我们此次东去表示十分不满，说我们寥寥几百人就想去打装备精良的日本人，真是荒唐，要我们立即停止东进，或原路返回，或留在他那里。我据理力争，但

是无济于事。当时我真想发火，但为了脱身东去完成任务，只好继续和他磨下去。

我想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以便乘机提出东进，于是我说：“请问卫司令长官，贵军下一步的行动——。”

卫立煌说：“往西，渡过河去。必要时去陕北。”

“过河去陕北？”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怎么行，这样会把日寇带过河去，危及到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卫立煌部又确实处于危急之中，要是能帮助他突出重围就好了。

我边看地图边想，问卫立煌：“卫司令长官，你们准备了多少船只？”

“船只？没有，正在找。”

“卫司令长官，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如果没有足够的船只迅速渡过河去，敌人三面进攻，再派飞机从空中追歼，你们就会全军覆没。”

“啊？！”卫立煌猛地抬起头来叫道：“那你说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

“我倒有个想法，只是不太成熟。”

“你还能有什么好办法，”他将信将疑地说：“你说说看。”

“根据你们的情况，我看是不是这样——抽少数兵力牵制敌人，增宽正面，迷惑敌人。然后主力兵分两路，一路向南，一路向北，插到敌人侧翼，以保存力量，在敌人两翼寻机再战。请司令长官考虑。”

卫立煌听了我的意见后，非常高兴，把烟往地上一摔，兴奋地说：“对！对！好计谋，好计谋。”又对我说：“稍息！稍息！”说着亲自从罐头里抽出一支烟递给我。那个高个子参谋长也一扫

忧虑，说：“总座，是好计谋，好计谋。”

接着他们便立即召开旅长会议，进行具体的安排部署。旅长们也一致赞同我的想法，说：“此乃上策，妙！”那个参谋长更是摇着头喟叹道：“八路军啊八路军，八路军有人才。”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又给他们提了几点具体意见。

当晚，卫立煌就按照我们商定的方案，组织部队向南北突围，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保存了近四个旅的兵力。

第二天，卫立煌跑到我们一一五师师部，师首长们十分惊讶，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你们的一个营长把我指挥过来的呀！”

“笑话！我们一个营长怎么能指挥动你战区司令！”代师长陈光疑惑地说。

“是的，是你们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营长周长胜给我出了个向南北突围的计策，才使我们顺利地冲破了鬼子的三面封锁。”

最后，他对师首长们说：“这次被围困在黄河边上，多亏你们八路军救了我。”

完成任务返回后，师部给予我们营以很大的鼓励、表扬，说我们挽救卫立煌，不仅保卫了党中央，保存了卫立煌的这一股抗日力量，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和我党团结全国一切力量进行抗战的真心诚意。

蒋家狱中四百天见闻

季焕麟

自从我写的《回忆在白区为中共三次筹建地下无线电台的经过》一文于一九八〇年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九辑发表后，许多同志要求我写出在狱中的种种见闻，经当年难友协助，终于写出这份初稿。错漏之处一定很多，希望有关同志予以补充和修正。

我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凌晨，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曾先后被关押在西安、南京的四个看守所，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才得出狱，历时大约四百天。

我们这个案件牵涉的范围很广；除西安地区外，还有北平、兰州、上海、沈阳、长春、承德等地区的一些地下工作者。被敌人认为重要的，用专机解到南京的就有三、四十人之多。这些人员中，除中共党员十余人外，还有国民党将、校级军官七、八人，国民党机关、机要部门及行政部门的科处级干部十多人，五、六岁以下的儿童六、七人。其他被株连的人更多，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孙连仲也为这案件丢了乌纱帽。

我在此向同案中牺牲的五位烈士谢士炎、赵良璋、丁行、朱建国、石淳以及其他无辜被杀害者表示悼念！

被 捕

一九四二年，我在西安国民党民用电信部门工作，认识了中共驻西安的地下工作人员沈秉权（姚天斌）夫妇，并自一九四三年春起，我荣幸地以党外人士资格参加地下革命活动。日寇投降后，沈经过我训练无线电报技术后，调北平国民党电信局工作，另建北平——延安间的地下电台。我改由西安地区地下党领导人赵耀斌（石坚）直接领导。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间，赵命我弄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与延安电台试通成功。地下电台设在西安大湘子庙街十八号电信局宿舍我的卧室之内。发了几次电报之后，赵告我，中央指示，我的电台作为备用电台，暂不收发电报，但须保持联络，以备不时之需。

出乎意料之事发生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底的一天，联络员程达同志送来一大包密电码，托暂时保管并告我：北平方面出了问题，赵已被暗中监视，必要时把密电码销毁。十月初，程又告我，赵已被捕，赵家已被监视。程未作其他交代，我也没有同她商讨过下一步措施，彼此就在急急忙忙中分开了。我感觉到环境有异状，便与爱人一起把密码烧了。在一次与陕北电台的联络中，我把领导人被捕和烧毁密电码事电告了对方，并表示愿独立作战。同时我把情况告知刘楷同志，并托我的胞妹季文英立即购飞机票去上海将情况告知地下工作者吕福田（吕吟声）同志，以防万一，同时我把电台器材转移了一部分，拆毁了大部分。

万万想不到，在我还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回电前，赵耀斌（石坚）叛变投敌，出卖了我！十月六日凌晨一、二点钟，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肖绍文率领一群特务，打进我的卧室，迫我交出赵耀斌

托程达交我的密电码，对我拳打脚踢。因无结果，乃将我、我的爱人章亚健和七、八岁的女儿季萝抓走。同时搜去地下电台的部分机器和器材，偷走部分衣物。

我们一家人被塞进一辆小轿车，驶往北院门。汽车一停，我即被单独推进一个房间刑讯。三次上刑后，敌人得不到结果，把我押到另一个房间内轮流劝降。我不予理睬，也不回答问题。后来，一个穿着军装的青壮年走进屋坐下来，笑嘻嘻地说：“刚才委屈了你，密电码已烧毁，查明属实。”他从上身口袋内取出工作证给我看，我只记得上面有国防部二厅少将厅长叶秀峰字样。最后他扯到本题，要我把事情说清楚。接着有人送来纸、笔、砚，催我写交待，并指明要写联络电台波长、通报时间等等；还要我写共产党员的名单。我胡乱写了一些对他们完全无用的东西。

是日晨九、十点钟，我妻女被释放。我被反绑两手押上吉普车，解到西安太阳庙门的秘密监牢中（即西北特种拘留所），被钉上脚镣，关进一个二十多人的号子（即囚室）。

在西安太阳庙门秘密监牢中

这个特种拘留所名不副实，所谓特种应是专门监押共产党人及进步分子，所谓拘留所是临时拘留犯人的。实际上，犯人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拘留几年还未定案。我住的号子有二十人左右，睡土炕，炕上铺稻草。二十多人中，政治性的犯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姓陈（忘其名）。室长是一流氓土匪分子，其他是商人和小八路（大约十岁到十四、五岁的所谓八路军小探子）以及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被关进来的青年和壮年，也有个别老年人。室长自己是犯人，由看守所指定的，用来监督和欺压其他犯人的。

我住的号子每天上、下午放两次风，每次允许到天井里活动一、二十分钟。每天开两次饭，每次四个小黑麦馍和一碗带辣椒面的无油菜帮子汤。每天给几次饮水。大小便一般在放风时进行，特殊情况，得看守允许，可临时上茅厕。

听说另有优待室，赵耀斌就住在里面。

狱中有劳动间，愿参加劳动的自愿报名，我曾报名，想借此活动活动筋骨，由于体力太差而被淘汰回号子了。

那位姓陈的曾低声自我介绍说，他是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到老河口一带搞地下工作的，通过封锁线后尚未接上关系就被敌人截获了。他当时只有二十岁左右，曾被送进敌人的青年营等接受反动教育和强迫劳动，最后被押到这儿来，已有六、七年失去自由。他的一腿打井时骨折，得不到医疗，已跛了。他现已二十七岁了，尚未定案。他强调不管敌人抓住什么把柄，要硬顶、硬翻，死不认帐。这对我在后来的敌人审讯中大有启发。狱中情况大都是他告诉我的。

一天晚上，姓王的法官提审我，在旁有军统西安地区电信检查科长丁祥娥。丁先说南京方面有电报给他，要他查明我的电台及无线电器材来源。这是我被捕后一直担心的问题，但早有思想准备。他要我书面具结，我立即毅然在纸上写着：电台是赵耀斌直接交给我的，有些无线电器材是刘庆曾（胡宗南手下的情报处长）送给我的，有些是我主办的技术人员训练班的。我把责任硬推在叛徒和敌人身上，而且态度坚决，要求与赵当面对质。丁看了我的书面具结，马上走开了。

一会儿，丁回来对我说：“赵耀斌承认了，没有错。”姓王的法官在旁一言不发。这时我才放了心，总算把为我从美军手中

弄来电台的吕吟声（吕福田），为我偷运这电台的飞行报务员吕和声和为我收存过这电台的西安航空公司电台报务员张宝善等掩护下来了。

这里犯人是与外界来往的，不准家里人送衣送食。这就使穿着成了问题，冬天被抓进来的人还好办，棉的可改为夹的，夹的可改为单的。秋夏抓进来的一到冬天就难办了，关得时间长的人就更难了。

为防止自杀，狱中不准犯人用针，若发现了针，轻的没收和训斥，重的加重处分。但也有看守眼开眼闭，省的自找麻烦，听说到了严冬季节，监狱向社会募捐衣被，免得有人冻死，捐来的大都是破烂军被和旧军装。其实募捐也是监狱当局增收外快的一个途径，犯人能得到多少实惠，天晓得。

我被关进到拘留所时，已是深秋，马上要转入冬天。衣着单薄的人有的整天躺在旧军被里，但有不少人在忙着编织衣服。睡在我身边姓陈的那一位，就有一只好勾针，有一手好技艺。他告诉我，每逢放风就要在天井里满处找寻铁丝和竹片，这些是制作勾针的好材料，还要找些小瓦片、小石块，它们是做勾针的好工具，能弄到小铁片那更好了，但这些并不是顺手可找到的。勾衣服的线是自己纺的，纺线用的棉花是从监牢冬天发给的破军被里一点儿一点儿揪出来的，可以看出有些军被被掏得一处高、一处低的。巧手换来了白色的衣、衫、裤、背心和袜子手套等等，真是无中生有！

牢中不准吸烟，火柴是绝对禁止的东西。可是犯人都想吸烟，那怕抽一口两口，原来不吸烟的人进了监牢也想抽几口，用烟来解闷消愁。放风时可以看到有些犯人东张西望，双目朝地，千方

百计找寻烟头。老天爷不负有心人，有些犯人用闪击战术从看守人员办公室里偷来了半包香烟，也有人从地上砖缝里拾到烟头。有人用茶叶、晒干的树叶等做代用品。

“火”从哪里来？我亲自看到有人从棉被里揪出一小块棉花，里面放几粒高锰酸钾（牢中允许领少量的洗发剂的伤口），找两块较完整的长砖头，把放有高锰酸钾的棉花块夹在两块砖头之间，用双手紧压上面一块砖，前后摩擦。几分钟后，取出棉花块，可见有烟冒出来，立即拚命地吹，一忽儿棉花点着了，抽烟问题便解决了。倘若住的号子地面是方砖，或者是水泥铺的，只要用一块砖头压住棉花，在地上摩擦，取火就更方便了。

牢中生火是最大的冒险，但犯人都很同情，有人望风，有人围着遮光，不让看守看见听见。

三个商人丧命

我住的号子里有两个商人，三十岁左右，身体很结实。他们被传讯了几次，有一次去时是走出去的，回来时，一个人由另一个人扶着回来，显然是被上了刑。他们对我说：“他们是商人（贩货的），又是赶车的，在陕北边区附近拉货、做买卖，他们被当做与共产党来往的通奸犯逮捕。捕前，三人约好一致的口供。可是住在另一个号子里的伙伴在法官刑讯利诱之下供认了一些。这两位认为那个已供认了，无法抵赖，也就供认了。他们痛骂另一个人，并不觉得自己也有错。

一天早晨，他们被叫出去，叫带着自己的行李，有的看守说他们自由了，释放了，有的说要他们换个地方。下午传来消息说，他们三人都被处决了。

胡宗南的“亲信”也关进来了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胡宗南手下一位三十岁出头的上校电信科长戴中溶也被关进来了。他被关在隔壁的一个号子里，穿一身草绿色呢军装。他是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电信网的创建人之一。他原籍是江苏嘉定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一出大学门就被介绍到胡宗南手下工作，深得胡宗南的信任，他还兼任胡宗南机要室副主任，无线电训练班主任。

他是赵耀斌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人员，他把中共党员王金平（田光）安置在身边，委任为中尉副官，戴到哪里工作，王亦调到哪里工作。由于赵耀斌的叛变他被牵连上了。闻胡宗南认为戴不可能是共产党方面的，同时也怕扫他的面子，并不愿意逮捕戴。但国防部二厅直接办理这个案子，叶秀峰直接指名抓戴，胡宗南也无法抗阻。戴被捕后，未被上刑审讯，也未被穷追严审，在号子里较为自由一些。放风时，他悄悄告诉我，由于他妹妹（清华大学生）在陕北边区内工作，他被牵连了。虽没有多谈，我心里明白：我也是西北电信方面的红人，能为共产党工作，他为什么不可能为革命事业冒生命危险呢？我心里笑了！蒋介石、胡宗南人心已失，富贵荣华，高官厚禄，也笼络不了身边的人。后闻他曾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但一直默默无闻，不争功，不求利。

小八路何其多

狱中有一群被称为小八路的犯人，全是男孩，一般十岁左右，个别有十四、五岁。据说他们是八路军派出来的小探子，也有人说他们是被乱抓进来的。

那时社会就是这种情况：谁都可以乱咬人，特别咬别人是“八”字头（指八路军），共产党嫌疑分子……。这是流氓、土匪、国民党特务、警察捞外快的好办法。他们专门在无权无势的小康人家子弟身上打主意，逼着家长出钱来赎孩子。这比抓真正的共产党要省事得多。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一是穷、二是硬、三是有组织的，想从他们身上捞外快是要冒风险的。

这群所谓小八路大都穿着破烂的国民党旧军装，放风时，可以看到他们挂着快拖到地面的长袖子走来走去，一个个面黄肌瘦，已是入冬季节，还穿着单衣，光着脚。

奇闻——犯人审犯人

有些案子是法官亲自审讯，也有些案子是由法官从犯人中挑出一些他认为老实的知识分子来审讯和记录的。有时听到刚刚被传讯回号子的犯人告诉别人说，哪个号子的哪个犯人审问了他。

同案人第一次见面

大约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看守们放出空气说，我们这一案件的人将被解到南京，另行安置，我们半信半疑。和我同炕的那位姓陈的已在勾织一双袜子，送给我的女儿作为临别纪念。我也整理自己的行李及食物，除必要带走的外，其余的准备送给姓陈的和其他几个难友。

一个早晨，天还没亮，我即被看守叫起，命令我立即拿着行李出去，被带到监狱的天井里集合。一群特务把我们两个两个铐在一起。

想不到我们这个案件在西安被捕的男女老少就有十几个人。

走出大门时，赵耀斌自言自语：“我领导无方，北平方面都供出了，我无办法。”谁也没有理他。

这十几个人都是赵耀斌直接领导的，平时彼此之间并不都有接触，现在才第一次见面。这些人中有：

赵耀斌，公开职业据说有几个，我只知道他是《秦风日报》（一说《新秦日报》）馆的老板。

范行先（女）和她的四个孩子，范公开身份是家庭妇女。

戴中溶。

程达，女，公开身份是电信局训练班旁听生。

李玉甫，西安另一地下电台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西安北大街一电料行的老板，闻他双十二事变后就参加地下电台工作，有十几年革命历史。

张镇邦，公开身份是《秦风日报》（一说《新秦日报》）总编辑。

王金平（田光）。

刘佩文（邱芝亭），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家庭妇女。她还带着两个三、四岁的女儿

耿效文，公开身份是一个铺子的老板。

在军统保密局看守所

我们乘飞机当天傍晚到南京。一下飞机即被押到宁海路十九号国民党军统保密局的看守所。

这看守所是二层楼，另有地下室，传说是刑讯的地方，每扇窗子外都挂上密编的竹帘，整幢房子看来象一个大公馆。

我、戴中溶、张镇邦、李玉甫和其他三个同一飞机押来的犯

人被关在有双层单身床的一间小屋里。只有一张不到半平方米的小桌子。

睡前，特务发还在西安上飞机时搜去的東西，我的两只金戒指变小了，重量不到原来的一半，上面所刻金店名称也变了。我天真地据理力争，一个军官模样的头儿大声嚷：“谁缺了东西？！我们这里既办政治案子，共产党案子，也办贪污案子，这儿是反贪污的机关，难道会贪污你们的東西？！放明白些！”虽然我一直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到这时才真正了解这个党的腐败情形。

所中规定不准交谈，房门上部有一个大约不到一尺见方的小窗口，有小门可开闭。小门中间挖一个一只眼睛大小的小洞，看守不时从小洞向内监视，可是室内人员也能看到小洞外的眼珠。我们随机应变，照样交头接耳，互相谈吐。

这所楼房没有大的天井，也没有放风的规定，大小便限时限刻，每次约三、五分钟，过时不候，只能熬到下一次开放大小便时解决。可是我有神经衰弱症，小便次数多，我又有痔疮，大便时间特别长，远远超过三、五分钟，有时达二十分钟之多。幸亏我有个圆饭盒和一个大漱口杯，大小便只好拉在饭盒里，盛不下时用漱口杯补救。准许大小便时，再跑到茅厕里倒尽洗净，拿回来还得盛饭菜、喝水、漱口。别的犯人夜间小便熬不住了，只能便在被褥上，或者尿在地板上。这就是犯人的生活，国民党的德政。

在这里遇到在其他地区被逮捕的同案人有：

丁绍文，中共党员，四十岁左右，浓重的山西口音。他曾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学习，后被派来白区，在兰州国民党部队里当上尉。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几个人。他们在兰州潜伏已有几年，工作一向顺利，没想到由于石坚的出卖，几个人被一网打尽。

朱壁谱，二十五、六岁，满口京语，全身飞行员服装，脸紫铜色，体格坚实。他曾在美国留过学，受过严格的飞行驾驶技术的训练。当时，象他那样的青年是最吃得开的人，那些倒卖黄金、托运贵重物品的达官贵人，都得找他这种人。要想升官发财，玩弄女人，他的路子太多了，可是他一心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这不是简单的事！

朱壁谱籍贯北京，一九二一年出生，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在他十七、八岁学生时代，曾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所接触。有一位地下工作同志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当时吃亏的是没有自己的空军，希望有为的志士仁人在这方面努力。朱记在心中，日夜锻炼身体，长得满身肌肉。后考入国民党空军学校，英文会话熟练，又被保荐到美国深造。回国后他在国民党空军里工作。同时，他找到了中共中央某部在白区工作的马次青，朱壁谱得了国民党空军情报，随时交给马次青。我只记得他曾告诉我：一次，国民党空军轰炸张家口，他及时告诉马，使张家口解放军方面减少了损失。

他在狱中时，同伪法庭多次辩论。每次回囚室时，他都是怒气冲天，自言自语，看样子是经过激烈争辩。敌人找不到借口，只好在处决五烈士的同时，宣判朱和其他二空军无罪释放。朱获释后仍回原部队，在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后不久，他潜逃到解放区，找到党组织。他曾以他的高超的驾驶技术获得了奖励。

一九八〇年，他只有五十多岁时，不幸患肺癌逝世。病重时他电话通知我要当面谈谈。一见面，他大哭不止，因为他一直想要为国民党空军投诚到解放区的一群义士；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义士写回忆录，这些义士情况他知道较多也较清楚。

他现在病重，不一定能实现他的设想，所以他哭了。

说也奇怪，似有一种神秘的灵感在同一案中的人中间做媒介，一见面，谈不上几句，就投机起来，一步步地接近起来。尽管讳谈案情，大家在交谈中不期然地共同关心国内战争情况，反对蒋美，咒骂社会上的种种黑暗。

汪伪国防部长——上将鲍文越

我们房间对面住着汪伪政府的国防部长——鲍文越。他长得肥头大耳，不象个犯人。据说他已被判了死刑，蒋介石想留着利用他，把他转到保密局来了。

他一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家里每天送高级饭菜，全鱼、整鸡、大段蹄膀……色香味形俱全。看守所上下全看中了这棵摇钱树，对他低头哈腰，简直成了他的侍从。

在国民党监牢里，类似的事情不少，据闻大汉奸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当时被关在苏州监牢中，居然在牢中造起佛堂，供她个人享用。陈的弟弟（忘其名）是汪伪政府的航空署署长，被关在南京水西门陆军监牢中，伙食包给附近的一家饭馆，要啥有啥。

藏族王子万里浪

同我们一起从西安用飞机解来的一个青年，大约二十五、六岁左右，有人说他是西藏的王子。我也就叫他王子。万里浪是汉名，是他被捕后在牢中学了汉文，自己起的名字。

全国解放初期，有一期《人民日报》副刊上登载过关于他的一段事情，内容我全忘了。他曾和我们一起被关在同一囚室里许

多天，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

万里浪的父亲是西藏一个地区的头人，有权有财。抗战初期，胡宗南的宣传队在那里大肆宣传，为胡宗南歌功颂德。这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着了迷，一心想找胡，在胡手下学习和工作。他征得父亲同意，召集二十多个同窗，带了许多大小金佛、金元宝和金币，骑了骏马从西藏家乡北上，经过青海直奔兰州。到了兰州，同伴们不习惯汉人生活，全部转返老家。他一个人独自带着金器，骑马直奔西安，找到西安王曲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求见胡宗南。军校招待处（也许是总务科）负责人出来接待，他献出了全部金器。闪烁的金光迷惑了招待者的心窍，他们收下这些金器，款待了这个青年一顿。然后把他关进一个窑洞，洞口砌墙堵塞，只留一个拳头大的小洞。洞内暗黑阴湿，只在地上放了些干草。就这样，他被关了起来，没有审问，也没定罪，每天上下午两次有人扔进几个吃不饱的窝窝头，给一些凉水。他只穿一身单衣，在洞里被关了一、二年（具体时间已忘）。原来他特别健壮，体重有一百几十斤，现在只有八、九十斤重（原来体重的一半）了。寒冬，他在洞内盘坐，一心诵经、做气功，非但战胜了寒冷，甚至全身发热，额角冒出汗珠。

后来，他被关进其他各式各样的秘密监牢，每一次监中呆的时间都不长，来回转移，这一次被解到南京来了，他从未被审讯过。

他在监牢中学会了汉语，能读古文，会讲一口普通话。

此人后解到南京羊皮巷军人监狱，不久就被释放了。关于他，有几种传说，传说西安七分校最初招待他的人见财起杀心，预备把他投在暗牢中折磨死，未成。他们分赃不均，产生矛盾，案情多少有些暴露在外，因此不得不把万里浪东移西移，怕人们追出根

来。万里浪的父亲久不得儿子的消息，不惜重金到处探听，托人在南京国民党军政大员中到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万里浪，国民党只好把他转解到南京释放了。

宁死不屈的新四军营长

我们邻近的一个房间关着一位被俘的新四军营长，他患了便血症。敌人多方设法要他投降，写悔过书，保证为他治好病，他没有理睬，后果不详。敌人把这事在牢里传播，借以威胁其他难友们。

在南京羊皮巷军事法庭看守所

在保密局看守所中大约呆了一个多月，我们于一九四八年正月被移解到南京羊皮巷陆军监牢里。

这个看守所看来是临时性的，由中式大厅改建成不久。囚室与囚室间用木板隔开，木板间还有缝隙，可以窥到邻室中人；也可以传递纸条、书报，彼此轻声交谈，互通消息更不成问题了。每一囚室，一面是墙，左右两边或是木板或是砖墙，有门的一面是用电线杆当作栅栏，杆与杆间距离约四~五寸，每一囚室看来好象一个大鸟笼，所以有人叫它木笼大厦。室内没有床，大家睡在地板上，一间可睡二、三十人，也可挤上三、四十人。木栅栏的前面是个大天井，放风的地方，每天上下午各放风一次。每个室内放一个半人深的木制大马桶，没有盖，每晨由犯人轮流抬到厕所清洗一次。每天开两次饭，给几次开水。饭内沙子很多，菜是烂菜帮，汤是咸水汤，放上几片薄萝卜片，大家叫它玻璃汤，谈不上什么营养。

我们被押到这里，开头几个月仍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家人送衣送食，可是难友间彼此接触方便了。

难友们被捕前分散各地，多数人彼此并不认识，现在都认识了。除前面提过的，还接触到下面一些同案难友：

邢国彦，男，四十岁左右，吉林省怀德人。公开身份曾是陕西省长安县公安局长，国民党辽北省长岭县县长，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上校督察，一九四七年十月在沈阳被捕。

王书翥，男，四十岁，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上校督察，还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社内设有地下电台与延安通报，在沈阳被捕。

李年，男，四十岁，公开身份是沈阳长官部政治部少将二组组长，在沈阳被捕。

沈秉权（兰天林），男，三十岁，公开身份是沈阳电信局无线电报务员，兼东北通讯社电台负责人，在沈阳被捕。

吕淑兰（蓝若林），女，二十七、八岁，公开身份是家庭妇女，在沈阳被捕。

姚曾依，男，三十岁，公开身份是沈阳财政厅科长，在沈阳被捕。

刘英豪，男，四十多岁，东北通讯社总编辑，在沈阳被误捕。

王兆荃（一名松樵），男，四十多岁，沈阳财政厅科长，因与姚曾依较接近，被误捕。

罗汝先，男，二十岁，东北通讯社在沈秉权被捕后临时雇用的电台报务员，被误捕。

下面是在北平被捕的一些难友：

余心清，男，五十三岁，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

令孙连仲手下的中将参议。

梁嵩然，男，三十九岁，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部少将参议。

田仲严，男，四十多岁，一中学的语文教师。

董剑平，男，四十多岁，公开身份是北平市地政局科长。

陈斌，男，二十九岁。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生，公开身份是华北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秘书。

谢士炎，男，四十多岁，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部少将作战处处长。

赵良璋，男，三十岁左右，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北平空军司令部参谋。

丁行，男，四十岁左右，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部上校军法处处长。

朱建国，男，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孙连仲部上官云相手下的中校主任参谋（一说作战参谋）。

石淳，约三十岁，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部二处军统情报参谋。

杨志诚（杨自成）——不详。

周启祥，男，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部校级干部。

李恭贻，男，北京大学学生。

朱铁华，男，三十岁左右，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冉瑞甫，男，约三十岁，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被误捕。

董明秋（肇筠），女，四十多岁，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北平一中学的教师。

王光普，男，四十多岁，公开身份是沈阳印刷厂经理，出差南京途中在北平被敌人跟踪逮捕。

顾心田，男，约三十岁，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热河省党部电台台长，在承德被捕。

耿忠信，男，十八、九岁，前面提过的耿效文的儿子，热河省党部电台公务员，在承德被误捕。

有些叛变投敌的如李政宣、石坚、孟良玉等在狱中未接触过。难友中，哪些是中共党员，哪些是革命群众，直到现在我不全清楚。难友中我能够详细记下的，将在后面专门介绍。

大约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木笼大厦床位来了个大调整，我们同案难友多数被集中在两个男室和一个女室，我终于见到了程达。

这次调整后不久，传说我们这个案子已引起国外人士的很大注意。因为此案件牵连的人员中许多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名望。闻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对此案大声呼吁。余心清的老伴刘兰华在美国闻丈夫被捕，便找美国知名人士转向蒋介石提出责难。难友们亦提出改善牢中生活的要求。在公众舆论和难友们斗争的压力下，国民党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公开审讯。我们获得了起码的生活条件，家属可以送进衣物，可以阅读获准的书籍（不准看报），也可以请律师辩护，但不叫旁听，后来难友家属可以接见谈话，双方被隔开好几丈在小窗口简单谈几句，有人监视，说话时间只准一二分钟。

自从看守所允许犯人亲友接济和探狱以后，狱中新添了精神粮食——书报。特别是一些较为进步的刊物，大家抢着看，并在几个木笼间传阅。我住的囚室里有二、三十人，为避免你抢我夺，

大家推举姚曾依为读报员，他讲一口清晰的普通话，读起报来有声有色，加上他有分析能力，难友们爱听他念，也爱听他讲。他近视，读报非有眼镜不成。可以说，他的眼镜是大家的眼睛。

不料一个早晨，在抬大粪桶时，姚的眼镜掉进大粪桶里了，大粪桶有半人高，每天积粪尿二尺深，“大家的眼睛”掉进去了，都楞住了。我脱去衬衣，左手按住鼻子，弯下身子，用右手插进大粪桶里，把眼镜取出来了。粪尿涂满了整个右手臂，连口鼻也差一些儿接触到粪尿。我笑着说，这是“大家的眼睛”。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特种刑事法庭及其看守所

一进监牢，谁都会觉得空气和阳光的可爱，自由的可爱。作为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战士更会觉得中国共产党的可爱，谁也不愿意坐而等待宰割，要斗争！遗憾的是我们案中的难友们，都是各自为战，或者自由结合，研究如何斗争，没有党的具体领导。狱中没有狱外也没有党的组织来指导如何斗争。难友中估计有一、二十位中共党员，但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这是我的感觉，亦许有严密的组织，我当时不是党员不一定知道。

在特刑庭，我用硬顶的办法否认一切不利的情节，创造有利因素，为自己也为别人开脱。我坚持否认知道赵耀斌（石坚）是共产党人，说只知他是报馆的大老板，程达中秋节送我一匣月饼，她是受人之托，我和她都不知匣子里有密电码，后来我吃月饼时才发现电码本，我不愿保管，把它烧了。我丝毫没有被赵耀斌（石坚）利用过，我是无罪的。我要求敌人审讯程达时出庭作证，为程达开脱，也办到了。

我写信给我爱人章亚健，叫她去找在国民党上海司法界有相当地位的族侄季苏营救，季同意当我的辩护律师。他同法官高硕仁熟识，曾义务为已经被判死刑的董剑平上诉，使董被减轻处理，董在和平谈判时获释。

同时，我写信给西安电信局同事和训练班学生等说明我无共党言行，请他们证明。西安方面出了十三件证明。

记不清十月还是十一月哪一天，法官高硕仁开庭，季苏律师为我辩护。他们入座后，各自整理法官和律师例行穿的衣冠，慎重其事，不许旁听。法官、律师坐定后，就叫我答辩，我如同背诵一样，滔滔地说出我早已准备好的辩护内容，把自己解脱得一干二净，绝不承认有任何共产党行为。律师亦根据我提供的资料和西安方面同事们同学们所出的证件以及他在法院方面所了解的情况，在当时的伪法律条例范围之内为我辩护。庭审没有超过半小时（淡薄的印象）就草草结束，真是一次喜剧性的开庭。

已记不清是年深秋还是初冬，我被移解到另一个囚室，原因室中所有军人被解到南京水西门军事监牢，按军法处理，另一部分非军人被转解到南京老虎桥的所谓模范监狱。我在新的囚室中得以见到了国民党中将参议余心清和少将参议梁嵩然二位。我们三人同住木板地铺。他们二位是将级军官，没有被解到水西门，却在等待特种刑事法庭的审理，这在我心中是个谜，后来知道有人暗中帮助。

水西门陆军监狱中的斗争

同案中一二十位军人被关在号码相连的三个号子里，每个号子住八人。斗争是从唱革命歌曲开始的。他们到这里不久的一天

晚上，不知谁低声哼起革命歌曲，好几个人和着唱起来。开始是一个号子里有歌声，后来三个号子都唱起来了。看守兵凶神恶煞地跑来制止：“谁再唱就要拉出去上镣。”可是大家望都不向他望一眼，继续唱歌。看守兵越暴躁，大家歌声越高，全监狱囚犯都骚动起来。看守兵慌了，赶紧请看守员来镇压。可是看守员来又有什么用处呢？大家都在唱，抓谁？他刚要开这个号子的门抓人，另外两个号子的犯人就怒吼起来。要是整个监狱哄闹起来，这是监狱中最最犯忌的事，狱方是要受处分的。他慌忙请来典狱长。典狱长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一看就知不能再压，便装出一副笑脸说：“唱歌是不允许的，但是你们确实很苦闷，轻轻地哼几声小调，也是可以的，不过不要影响别个号子的安静。”他们说：

“我们遵守狱规，但轻轻谈话，轻轻唱歌和看书下棋，只要不影响整个监狱秩序就不能来干涉，否则后果要由狱方自己承担。”狱方最怕团结起来的犯人，更害怕不要命的人。典狱长只好表示同意，他们也就不再唱歌。从此，看守兵来接班，都要到他们三个号子门口打个招呼，希望在他值班时间内不出事。说实在的，平时这三个号子是最安静的，有学习外文的，有看书的，有下棋的，有学织补的，有学打毛线的，安静得一点声息没有。自从这次风波以后，他们要洗衣服、擦澡，同看守一说，没有不允许的。他们对看守员始终板着脸孔，不加辞色，而与看守兵则愈益友好。他们询问看守兵关于外面情况，托买便纸，买盐，偶尔偷偷地托买包烟。看守兵甚至允许这三个号的难友们互相串门，不加阻难。

监牢中伙食差，菜少菜坏，米饭中沙子多，这是国民党监牢的普遍现象，是层层贪污的结果。他们早就等待着机会，准备斗争一天，国民党中央的什么大员视察牢房。当典狱长陪同那大

七

员走近他们号子时，丁绍文拿出平时从米饭中拣出来的一堆沙子给他看，大家异口同声要求改善伙食，声势很大。此后伙食确有所改善。

虎口余生

一九四八年冬，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自知无法保持其江山，对各地监狱进行了大疏散、大屠杀。南京水西门陆军监狱陆续放出一批批不戴红帽子的犯人（指非共党方面的人）。开头释放五年以下徒刑的，后来释放十年以下徒刑的；同时加速处决大批政治犯，开头每天早晨枪决一批，后来每天下午增加枪决一批。我们案中的有五位难友戴中溶、丁绍文、王金平（田光）、周启祥和沈浩民被寄押到杭州监狱中。解放军进军杭州前，大特务周岳把狱中政治犯全枪决了。因他们五位是国民党中央寄押在杭州的，不敢擅自作主，电报请示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可是还未得回电，杭州就解放了。这五位得免一死，真是千钧一发，虎口余生。

我们这个案件中的难友，除叛变投敌的石坚、李正宣等人和牺牲的烈士（包括在长春被杀的），以及寄押在杭州监牢的五人外，其余的人在一九四九年春，李宗仁派代表去北平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时，全部都取保释放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某天，对我的判决书下达，大意是，根据赵耀斌供词，构成危害民国预备犯，判处徒刑十四个月，缓刑两年。十一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一版上登载了这个消息。我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找到同乡缪隽为保人而获释。

我出狱前，余心清亲笔书赠我风筝诗一首，梁嵩然另用宣纸

抄了这首诗并以别名“若梦”落了款，送给我作为纪念，以志患难与共之意。

离开大木笼前，一看守拱着手、弯着腰对我说：“天下是你们的，我们的饭碗要靠你们了。”难友们也叮嘱我：出了牢门不要忘了他们。

五位烈士

我在狱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和人生的老师，最值得纪念和记叙的是五位烈士。他们是谢士炎、丁行、赵良璋、朱建国、石淳，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部将级、校级军官，实际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从前面关于他们公开身份的简略介绍中，就不难了解他们冒着多么大的风险，担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同解放战争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除石淳外，其他四位烈士曾同我一起关在“木笼大厦”中，相处了几个月。

谢士炎浓眉方脸，整天不吭声，闻他曾在北伐战争中立过大功。我听他说过：“我不存幻想，准备死”，“大家有什么事我敢出头同他们（指敌人）拼命。”有一次，难友们闹改善待遇，一看守人员站在木栅栏外企图把难友们声势压下去。谢正好站在栅栏里，伸出拳头，穿过栅栏打过去，那人再也不敢吭声，溜了。

他如何被捕的呢？据说，他曾向中共中央写过关于瓦解孙连仲军队的五条建议，地下电台发出去后，地下电台台长李政宣没有及时退回电报底稿，也未销毁，私藏起来。敌人逮捕李时，李把谢的亲笔手稿交给了敌人，作为投敌的资本。敌人得此手稿，如获至宝，传讯了谢士炎。谢拒不承认，敌人让他书面具结，他

信手写了，想不到敌人核对笔迹后把他逮捕了。影片《先驱者之歌》中有有关他的介绍。

丁行是国民党华北“剿匪”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掌有士兵和一般军官的生死大权。可是他是共产党员，诗人臧克家是他的好友，曾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诗，我只记得内容中有“……前门进……后门出……”意思是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丁主管的军法处的前门进去，从后门就出来了。

他睡在我邻近的地板上，朝夕相处，不几天后就互相信任。他告诉我，他的案情简单，敌人没有抓到他的证据，反正死不了，可以借此机会学好一种外文——英语。他每晨读英文，从不间断。他有法律知识，他耐心地指导我打官司的各种技巧，特别要注意不能让敌人抓到辫子，万一被抓到了，要拼命地挣扎，积极翻案，不能对敌人存有幻想。

他会唱不少进步歌曲，我特别爱听他唱闻一多写的《古怪歌》。他逐字逐句地教我唱，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几句是：“……古怪多、古怪多……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

万万想不到他被转解水西门军人监牢后不久就被处决了。七十年代初，我去南京雨花台烈士墓中找到了“丁行烈士墓碑”。墓和碑都很完整，当时倾盆大雨，我手抚着石碑大哭一场，直哭得精疲力竭。天晴时，我特地再去雨花台丁烈士墓处照了相留念。

赵良璋的公开身份是北平空军司令部参谋，他曾把国民党空军配备图交给地下电台李政宣。李用后未退回，李被捕后也把这份图纸交给敌人，于是赵被逮捕。他曾同我睡在同一囚室中，天天练拳。他善作曲，在军事监狱中，他教大家唱《兄妹开荒》等革命歌曲。影片《先驱者之歌》中有他的镜头和他谱写的歌曲。

关于朱建国、石淳，只听说他们是由陈斌介绍给徐冰参加地下工作。他们掌握国民党机要文件，缮写时一式两份，一份送中共地下组织。徐冰当时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成员。

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某一天清早，水西门陆军监狱过道忽然戒备森严，囚室铁栅栏外增添了一批荷枪实弹的士兵，还有机关枪队。例行的放风停止了。这表示要杀人了，牢里叫作“执行”。

赵良璋首先打破沉寂说：“最后考验的时刻来到，同志们，到时候口号喊响点。”朱建国说：“拳头要举高些，腰杆要挺直。”顾心田说：“咱们谁也不能跪。”谢士炎说：“我要比在武汉（指北伐时）检阅欢迎队伍的时候走得更帅、更潇洒！”他还走了几步预演一下，引得同号难友们哈哈大笑。

敌人摆好阵势后，即有人在囚室外点名，上面五位同志被点了名。他们和难友们一一握手诀别，平静地说：“同志们，永别了，要坚持斗争，迎接胜利。”他们被带到法庭，伪法官宣布了他们的死刑，他们即被解到刑场。谢士炎对在场的法官大声说：

“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你们将来必受人民的审判！”还说：“杀了我们，救不了你们！”赵良璋把一有纪念性的什么东西托人转交给他的爱人。丁行叫把他的狱中遗物分赠同室难友。朱建国托一看守送进狱中同室难友顾心田一条子，上面写着：“拿几听罐头来。我们现在心情很平静，……亦可谓从容就义，一笑。朱建国绝笔。”这张宝贵的纸条被顾心田缝在衣服夹层里，逃过敌人几次搜查，出狱后交给了组织。

行刑前，监刑官要他们跪下，背朝枪口，五位烈士齐声道：“生着不跪，立着死去！”并立即转身，面向枪口说：“打吧！”接着他们连续大声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

岁！”行刑官不许喊，他们喊得更响。在一阵枪声中，他们立着若干时间后才倒在血泊中。难友们听到枪声后全哭了。

忽然，囚室小窗口打开了，典狱长皮笑肉不笑地在窗口说：

“你们不要害怕，没你们的事。”坐在囚室内窗口的陈斌腾地站起来说：“谁害怕？你们才害怕！你们以为枪杀几个人就能把人民镇压住了，……这是妄想！”

是日下午，一位看守带着同情的口吻主动对囚室中王书翥等讲述了五位烈士就义前态度自若，吃喝照常，谈笑风生的现场情况，最后叹口气，说：“好人死了，他们都是好人！”

在宣判五位烈士死刑的同时，军事法庭宣判国民党空军朱璧谱、朱铁华、冉瑞甫三人无罪释放。朱璧谱、朱铁华和五烈士之一赵良璋的生前友好偷偷地把五位烈士遗体安葬在水西门外的乱葬岗，由于棺材质量差，有板缝，抬走棺材时，一路之上滴滴鲜血不断。一九五〇年组织上派陈斌同志将五位烈士遗体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墓处。

余心清和梁蔼然

在南京宁海路保密局看守所中就听说有二位孙连仲部的中、少将也被关了进来，一位是余心清，一位是梁蔼然。国民党的将官愿跟共产党走不是简单的事，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他们。大约在一九四八年秋天，囚室调整时，没想到我被关到余心清的囚室中，而且同睡在一块地板上。他留着胡须，有半尺长，看去象屈原的模样。他五十三岁，但象六十开外的老人。他平时言语不多，沉着、举止安详，但一开口总是乐呵呵的。他曾留学美国，美帝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牧师，可是他背叛了他们。他是一个

热爱祖国的志士，一贯反对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他参加了以李济深为首的联共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他去北平同中共取得秘密联系，准备争取孙连仲联共反蒋。一九四七年秋，由于中共北平地下电台被破坏，台长李政宣投敌叛变，余老的电稿被抄去。这样，他被捕了。敌人一直对他疲劳审讯，得不到结果。敌人要他填写悔过书，表示反共拥蒋，他拒绝了。他对我说，反正一条命，随时准备上断头台，不幻想蒋介石的宽恕。他绝对不会在这张纸上签名的。

有一次他对我说着话，突然发出了笑声，说他原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争取孙连仲，想不到一进牢门，竟遇到这么多熟人（指谢士炎、丁行等一批革命烈士）都在做同样的工作。

余老有过升大官、发大财的机会，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一辈子两袖清风。现在，探狱送食物的是他的亲兄弟余文瑞，弟弟没有沾他的光，还是一个自力谋生的普通木匠。他的独生女余华心寄养在朋友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快出狱时，余老托我去找他的爱人刘兰华。当时她为营救丈夫，已从美国回到南京。余老让我告诉她关于他的案情和牢中生活概况。他并亲自用钢笔写下了“风筝”诗赠我作为纪念。

我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狱，二天后找到余老的爱人。她住在南京石鼓路二百号余文瑞家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她轻轻地告诉我，社会上同情余老的人很多，伪立法委员许宝驹、谭惕吾等均出了大力，把余老的名字和梁蕩然的名字从军官名册中销去了，所以他们二人没有被解到军事法庭审理。这是一个生死关。

余老在李宗仁派代表去北平和谈时获释，立即飞香港，写了

《在蒋牢中》一书。后来，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他如何写出这本书的。

梁嵩然亦是国民党少将，但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原来与丁行同一个党小组。一次余心清老先生轻轻地对我说：“我们二人（指他和梁）朝夕相处，想不到他比我更加进步。”言外之意可知，我同梁没有深谈过，但知道他在文艺上有修养，写一笔好字，善国画，善唱昆曲；他非常镇静，从未看到他有焦虑情绪。梁与余同时获释，立即赴沪，搭轮赴香港，回北平。

共产党员邢国彦

邢国彦曾同我一起在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的一个号子里关了几个月。尽管他隐蔽得很好，最后无罪释放。但他对难友们还是大力帮助，他曾同姚曾依一起帮助我研究案情。

邢出生于东北吉林省怀德县大黑林子，父亲是小贩，从小吃不饱，穿不暖。九·一八事变后，他在辽宁国民党地区进过警官学校，当过巡官，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善于洞察社会现象，灵活应付。巡官在当时是一个肥缺，可是他放弃了，在抗战初期去陕北中共地区柞邑学习，后又到西安参加中共中央某部的情报工作。一九四五年冬，西安地下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做接收大员。他随国民党军队去东北，不久去长岭县当了国民党县长兼地方自卫队大队长，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国民党军队的罪恶行动，地主恶霸反攻倒算，他全记在心头。

当地大恶霸地主随九子十分猖狂，邢利用国民党的法制把他关了起来。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抓了二十四个人（其中有革命工作人员），打算当场杀几个。邢以法律程序为借口，把这二十四

人转押到县监牢中保护起来。一九四七年三月解放军攻占该县城时，他们得以释放。解放军进城前，他把国民党主要文件档案和反革命分子名单锁在一间牢固的屋子里，等待解放军来接收。他自己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沈阳，又以东北保安司令部上校督察名义与中共西安地下组织派来的情报人员同王书翥、李年等人共同组织沈阳的情报工作，继续为党工作。

邢国彦在沈阳是怎么被捕的呢？他在沈阳原同地下工作者王书翥、王光普住在一个院子里。王光普原在西安任陕西民政厅长王德普的监印官，与西安八路军七贤庄办事处陈德钧（待证实）有秘密来往。情况紧急时，八路军办事处曾将重要文件存放在王光普的文件箱内。后王调沈阳，公开身份为一印刷厂经理，仍为党工作。有一天敌人去王光普处逮捕王，高声叫王的名字。王正在南京出差。邢国彦正在家，一望对方是个认识的特务叫张树勋（东北行辕二处副处长），立即奔到王书翥家通风报信。不料王已被捕，邢正巧送上虎口，也被捕了。

他被捕后，敌人审讯多次，还上了刑。但他镇静自若，善辩论，否认敌人所得的线索，使得敌人不敢用重刑。在牢中他仍以国民党县长身份出现，以相面专家自居，帮助难友分析某些案情和对策，有说有笑，敌人奈何他不得。他于一九四八年十月被判无罪释放。

共产党员王书翥

王书翥是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沈阳警备司令部上校督察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通讯社社长。通讯社内设有与延安联络的地下电台，通讯社实际是中共设在沈阳的一个据点，姚曾依和爱人潘

儒珍以及姚天斌（沈秉权）等参加了这里的秘密工作。一九四七年十月某日，敌人发现了一些线索，把王逮捕了。王经过重重险滩，奋力闯过好几个难关，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于南京水西门法庭被宣告罪证不足，得以获释。

他经过的几个难关是：

一封绝密信——他被捕时，大衣内有一绝密信件。他托词天冷，回房取出大衣穿在身上，在吉普车上，他避开敌人视线，用手把衣袋中的那封绝密信件撕得粉碎，扔出车外。

刑讯关。他受刑比我们案中其他任何人都多，而且是酷刑。老虎凳、凉水灌鼻子（嘴被堵塞），甚至电刑他都经历过，可说是体无完肤，至今身上还有斑斑伤痕。他怕敌人追根刨底，了解他的社会关系牵连到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如陈忠经等），便用二寸多长的铁钉子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猛撞墙壁自尽，不料钉子进了太阳穴，但未伤及脑中致命部分。敌人把他送进医院拔出钉子。从此敌人审讯更严，钉子成了他“畏罪自杀”的罪证。人被解到哪里，钉子跟到哪里，一直跟到南京军事法庭。这个消息当时曾登在美国报纸上。他在法庭上一直否认敌人获得的线索，同时沈阳同案中人亦为他开脱，证明他无罪。他终于争得了自由。

王书翥大力帮助难友。他的二位部下刘英豪和罗如先是无辜被捕的，但既已抓了进来，出去就不容易。王书翥到特种刑事法庭作证，为刘、罗二位开脱，使他们二人终于被判无罪释放。

东北长春的六位无辜牺牲者

为了掩护东北通讯社，王书翥设法在长春设了东北通讯社分社，社内也设了电台，与沈阳电台联络通报，完全采用公开方式。

他聘请富春雨为该分社的主任，另招聘报务员刘克镇及其他工作人员。王书翥被捕后，长春分社六个工作人员全部被捕。这些人实际上并非地下工作人员，也没有人供出他们，他们也根本不知道王书翥等人的革命活动，但被国民党当局当成共产党，施以种种酷刑，并于长春解放前夕全部被枪毙了。

羊皮巷其他见闻点滴

当时羊皮巷监狱包括两部分，一为军事监狱，一为特种刑事法庭监狱，这两个地方我都住过。除了革命营垒的难友外，其他零星见闻也记叙如下。虽然有些是片言只语，有些仅仅是一个线索，但还是耐人深思寻味的。

“不成功，便成仁”之一例

在山东战场上，有一些被新四军俘获后释放回白区的军官，向原单位报到后，反而被国民党自己关进了羊皮巷监狱。他们满腹牢骚，有时透露出一些内部消息，其中有一人向我讲起一段“不成功，便成仁”的故事。

山东蒙阴和沂水之间有一凤凰山，一九四八年解放军攻克凤凰山，山中有一国民党军队的据点已被包围。据点长官召集手下若干军官谈话，坐定后，他宣布：“今天要实现蒋委员长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教诲，由我亲自执行。”他说完后，立即拔起手枪将周围的几个军官打死，而自己却化装逃走了。

陈布雷的女儿及女婿被捕和陈布雷之死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最大的“笔杆”，蒋介石发表的重要文章

大都由陈起草。可是他女儿陈琏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大学毕业后去北平当中学教员，并于一九四七年秋与地下党员袁永熙结婚。当时北平市长何思源还亲自为他俩证了婚。他俩的秘密工作本不和我们同一系统。不料他们结婚不久，我们案件无意中牵连到他们，他们也被捕了。我们同案中的田仲岩和陈琏在同一个中学教书。陈、袁结婚后，田去他们家中贺喜并和袁交换了一张名片。田仲岩被捕时，敌人在他口袋里发现了袁永熙的名片，便追到袁家搜查。正巧那时有另外一个系统的地下组织认为有陈布雷作泰山，敌人不会怀疑袁的，将一些秘密文件和学生运动的宣传品存放在袁家。敌人搜查袁家时发现了这些文件。袁永熙和爱人陈琏被一起解到南京。陈琏曾与我们同案中的刘佩文（邱芝亭）住一个牢房，袁永熙曾同梁蔼然、陈斌、顾心田等关在一起。

据说蒋介石知道后，照顾陈布雷，释放了陈琏和袁永熙小夫妇，只是要求陈布雷严加管教，陈一口允诺。但这对小夫妇出狱不久，再一次跑出家庭，找到中共地下组织，继续地下工作。闻陈布雷另有几个儿女也要求进步，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白区革命工作。蒋介石知道上情后，怒不可遏，大斥陈布雷。不知陈在家中自杀是否与此有关。

具体情节我所知不多。陈琏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袁永熙仍健在（前闻在国务院工作，近闻调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陈琏的大哥陈过为全国政协委员，可请他们亲自撰文，后代人一定感谢不尽。

狱 中 定 情

我们同案中的朱铁华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被解到南京监狱

后，他的女友非但不疏远他，反而远离家园来到南京，不时送日用品，送食物，决心等待他。可说是“狱中定情”！朱出狱后，他俩终成眷属。朱后来潜入解放区工作。

陈斌的被捕

关于陈斌，余心清老先生所写《在蒋牢中》一书中有所介绍，我已想不起书中内容。现就我所知道的，特别就他的被捕作一介绍。

本来，陈是无党派青年学生，在学校时，通过挚友刘诚介绍和中共重庆办事处刘光发生联系。他在刘光领导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在同学中揭发国民党贪污案件，揭穿国民党在学生中招青年军远征军的骗局，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四五年，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作助教。同年日本投降，刘光指示他到国民党军队中搞情报工作。于是他参加了国民党接收华北的前线指挥所，任秘书。他到北平后与中共党员徐冰取得联系。徐冰常到陈家中取得军事情报，对陈深为赞赏，有一次华北“剿总”召开团级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由李宗仁主持，陈任秘书，掌握全部会议文件及兵力部署、军事配备等资料全套交给徐冰。他还介绍朱建国、石淳二人（见前面五烈士的介绍）给徐冰，徐从此取得更多的情报。

一九四七年，石淳在北平被捕，敌人搜到陈斌给他的信，把陈斌夫妇（陈爱人叫郝亦非）及其父兄全逮捕了。父兄和爱人经特务审讯，与本案无关，先后获释。他则被转解南京军统保密局看守所，不久又解到羊皮巷和水西门等牢狱。他在沈阳保密局狱中受过种种酷刑，同室难友郭耕坡（沈阳第八区地委书记）给他很多鼓励，他在狱中情况，郭了解最多。

法官的儿子成了小八路

有一天，囚室中有人发出一阵笑声，一打听，原来社会上传来了下面的故事：

国民党对特务的工作有一定指标，正如早先上海租界捕房规定的一样，每一巡捕每月必须破几个案子，否则要受处分，甚至革职。因此有些特务狗急跳墙乱抓人，经过刑迫而构成案件上报，所以狱中到处有小八路，羊皮巷狱中的小八路亦不少。

有一特务在大街上抓了一个看来象流浪孩子模样的男孩子，带到家里，经过饥饿和打骂，并编造一个小八路的口供，叫小孩背熟供认，然后上报。不料这小孩的父亲是某个法院的法官，正为走失了孩子而纳闷，在审理案件时才发现他的儿子成了小八路。

忠义救国军头目丁锡山

归顺中共、奋战牺牲

苏南人民一定还记得抗战初期，由蒋介石军统控制的一支联日反共的游击队——忠义救国军。这是一支祸国殃民的部队。但其中也有例外。

大约一九四八年初夏，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关进了一批由上海地区抓来的政治犯。在我住过的大木笼中，也有三、四位，现只记得一位叫孙皎，一位姓袁，其他人名已忘却了。他们的案情我还有一些浅淡的印象，值得记下来。

他们的领导人叫丁锡山，是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头头。在汪、日统治时期，不知为什么，丁被抓去关在镇江的一个监牢中。丁的部下参加帮会的较多，讲侠义，汪、日匪特关不住他们的心，也关不住他们的人。他们经过精心策划之后，在一个晚上把丁锡

山从监狱中劫了出来，护送丁安全渡江，进入江北新四军辖区。

丁锡山一批人受到新四军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他们在解放区参观访问，增进了不少革命知识。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他们决心改变原来的立场，表示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丁锡山一再请求回上海附近三角地区打游击，牵制江南的一部分蒋军并为解放江南作准备。丁对这地区人地两熟悉，满想可以成事。

一九四八年春，中国共产党华中分局批准拨给丁锡山部分军队，由苏北乘船出发，在南汇登陆，不料，事被敌人发觉（一说丁的亲戚投敌告密）。由于寡不敌众，丁力战身亡；其他人，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俘后处决，有的被关进监狱。当时上海各报登载过这一消息。回忆我出狱后，似在什么报刊上看到毛主席悼念丁锡山的电报，慰问他的家属。

热心助人的孙皎

在这里还得提一下孙皎。他对我同案难友特别关怀。我的辩诉书，对法庭起诉书等有关文件的摘录等，都是他主动为我抄录，狱中释放人员时，要有保人，有时被释放人员无法解决，他虽身在囹圄，却能通知狱外商铺出面保释。李宗仁与北平和平谈判释放政治犯时，我们案中有些难友是由他设法协助找到保人出狱的。

上海的大扒手成了政治犯

在我住过的一大木笼中，关进了三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壮年，忘其名。其中二人是上海大扒手，另一个是与扒手来往较密的侦缉队员，三人构成一案被关进来了。那时，贩烟土的与禁烟的勾结，流氓扒手与警察、侦缉队员勾结的事多得很，不足为奇。其

中有一人，脸长得圆圆的，是上海有名的派克钢笔大扒手，四川口音，绰号“金娃娃”。他有种绝技，能把人们插在外衣口袋里的钢笔扒走。派克笔是美国名牌笔，即或旧笔亦有人抢着买。他专门扒这种笔。传说，上海警方治不了他，把他和其他二人一起作为政治犯关进来了。

金娃娃衣着漂亮，与社会上有联系，常有人来狱中探视，送物送食。他整日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他不讳言他是派克笔扒手，但绝不谈如何扒的技术。我曾把我的爱佛牌钢笔插在上衣左上角口袋里，笔套露出一些儿在外边，叫他试验。我虽则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笔，可钢笔还是落到他手中了。这个人在囚室调整以后未再见到。

（一九八一十一月年）

八路军山东纵队组建前后

王 彬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抗战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将日本帝国主义驱出中国。同年十月，日军侵入山东。山东人民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相继掀起了抗战的热潮，一支支抗日人民武装象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便发生了鲁中徂徕山起义、胶东天福山起义、长山县黑铁山起义、鲁西泰（山）西起义以及鲁东工委领导的昌邑、潍县、寿光县等地的抗日武装起义。

各地武装起义后，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急需派干部，加强党对山东武装斗争的领导。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不少同志说他是来延安“搬兵”的。不久，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指出：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山东民枪极多，发展扩大游击战争，主要是派干部去，派一两个营去做基干更好。随后，我们在延安的一批干部奔赴山东敌后战场。

战斗中，山东武装部队逐渐壮大，并于一九三八年底组建了

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领导山东各支队的武装斗争。当时，我担任山东纵队参谋长，现凭回忆所及，写出这一段战斗生活片断。

从延安到山东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正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十三班学习，并兼任党校军事教研室教员和十三班队长。一天我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做好出发准备，去山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准备去山东的干部七十多人，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抗大的学员，二是党校的学员，三是陕甘宁边区的干部。从中央机关抽调的极少。这批干部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同志带队，军事领导干部开始说派罗炳辉同志去，后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决定派张经武同志去。

接到通知后，我们立即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不知为什么又拖下来了。接着当时的党校校长康生来给我们讲话，说什么现在“统一战线形势很好”，“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等。康生说这是中央通过的路线。由于我们这批干部要派往山东，中央领导同志不断有人来讲话。王明也讲过一次，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内容还是他那一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主席也来讲过一次话。他说我们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要用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的战术。还讲要牵制住敌人，持久作战，促使其内部分化。临别之前，郭洪涛和我们少数几个同志还分别去毛主席、张闻天同志住的窑洞里告别过。毛主席在地图上划了一下，对我们说：你们到山东不要只管山东，而要统一领导苏鲁豫皖边区的抗日战争。

一九三八年四月，我们从延安出发。

到了西安后，林伯渠同志在八路军办事处给我们作报告，介绍外边的情况，并嘱咐我们说，院外特务很多，一个人不要随便逛大街。

大约是五月初，我们一行乘火车从西安出发，向山东前进。按中央的指示，本来要我们乘火车过徐州去山东，然后过津浦路到泰安一带去联系省委，并到徂徕山起义的地方联系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但是，由于台儿庄会战，铁路不通了，我们只好在归德（商丘）下车。下车后，我们徒步行军到曹县。当时，那里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所在地。

就在我们驻曹县期间，台儿庄会战胜利结束。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把去徐州的日军全部歼灭。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驻军要在曹县召开庆祝台儿庄会战胜利大会，并邀请路过曹县的八路军参加，还安排我们领导人讲话。那天上午，我们七十多人排成整齐的队列，打着庆祝台儿庄会战胜利的横幅标语，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战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庆祝大会的会场。大会开始后，先是国民党的战区副司令讲话，接着就是郭洪涛同志代表八路军讲话。他讲到一定火候，我们就带领全场高呼革命口号，大唱抗日歌曲。当唱起《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的时候，青年学生和老百姓会唱的跟着唱，不会唱的也跟着哼，整个会场群情激昂。

没想到，这下子可捅出了乱子。国民党当局不干了，说我们“喊口号太多”，“进行煽动宣传”。我们回答说，喊一些抗日口号有什么错呀？我们不是还喊了“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吗？这一问他们又哑口无言了。接着又指责我们唱歌太多，总之他们

是非常恼火。当天下午，我们得到一个情报：国民党特务要下毒手，把我们七十多人“就地解决”。这个重要的情报是郭维城同志告诉我们的，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他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进步青年军官。那时他在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的部队栖身，来曹县是为范筑先押汽车运东西的。郭维城催我们快走，不然来不及了。怎么走呢？他又为我们搞来两台运送货物的卡车。我们急急忙忙收拾东西，拆掉电台，连夜乘汽车离开曹县，来到一百多里外的菏泽。多亏了郭维城用汽车送我们，不然就要出大乱子了。

我们从菏泽徒步经过鄆城，又从鄆城走到东平县。这时，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终于和我们接上头了。他派一个团掩护我们顺利通过了津浦路，在莱芜以南地区和四支队胜利会师。大家高兴得欢腾跳跃，真有一种“终于到家了”的感觉。

五月二十一日，郭洪涛同志在泰安东南的南尚庄村向山东省委作《为创造山东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从延安来山东的这批干部立即被派往各地担任各级的领导职务。

郭洪涛同志开始把我留在他身边工作。他打算请示中央后成立省委军事部，组建一支相当于一个师的主力部队。但是，当时山东的许多起义的抗日武装中，共产党的组织并没有公开，甚至并没有公开宣布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省委决定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公开化。在徂徕起义的四支队公开宣布了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共产党员们可高兴了，党组织公开了，党的政治工作加强了。但是，也有些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影响太深，跑掉了。四支队就跑掉了

一个参谋长。

不久，四支队司令员洪涛同志因肺病去世，政委林浩、副司令员赵杰同志忙不过来，郭洪涛同志便调我到四支队以参谋长的名义去工作，目的是协助赵杰同志整顿和改编这支起义队伍。

护送省委下鲁南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后，同年六月制订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中心是要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审阅了这个计划，并电示：“战略计划尚妥，照此做去。”

六月上旬，我鲁南起义武装遭到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司令申从周的围攻，我义勇队第一总队政委何一萍同志光荣牺牲。这时，在那里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的特委书记是郭子化。他虽然与党失掉关系多年，但一直坚持在徐州北部一带开展革命活动，自称苏鲁豫皖特委，不受原山东省委领导。郭子化同志还以看病行医为业，开药铺掩护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成立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郭子化派王见新同志来省委取得联系。王见新同志讲鲁南的群众基础很好，地形对开展游击战争十分有利，并动员省委搬到鲁南去。省委听信了他的意见，决定：书记郭洪涛率省委机关去鲁南创建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我率四支队两个团，掩护省委一起去，林浩同志率四支队一团留在鲁中沂蒙山区创建根据地并扩大抗日武装部队。到鲁南后，我们首先和郭子化同志会师。他那里有三个大队的抗日武装，实际上是三个营。这支队伍的司令员是张广忠，政委是李乐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王见新。

会师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即决定严惩申从周。申从周的游击第七纵队是费县、滕县一带地主武装的主力，有二千多人，不打日寇，专和八路军作对。徐州失守后，郭子化同志领导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把抗日武装拉到了抱犊崮山区。申从周向我们挑衅，特别是将两批投奔革命队伍的进步学生劫走了。多次交涉，他都以势压人，不肯交出来。申从周实际上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一带的代表人物。

省委作出打申从周的决定后，我带两个团来到费县抱犊崮山区。申从周的司令部设在费县的冯卯，这是个大村子。为了出其不意消灭敌人，我命三团一个营直插冯卯敌军司令部，二团直接进攻外围敌军主力，留张广忠总队作预备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消灭了申从周地主武装一千多人，只有少数人逃走了。我带领总队追击逃跑的敌人时，一直追到滕县东北三十华里的一个村子。没想到，申从周正好逃跑到这里休息。他见我们追来，一头钻进了高粱地逃命了。

冯卯攻下之后，周围几个村子的地主武装大部分投降了，但是，还剩下冯卯东边东江村一个名叫刘广田的大地主负隅顽抗。他家业很大，是申从周反动武装的死硬分子，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炮楼和我们对抗。记得当时我和郭洪涛同志住在山崮村，与东江村只隔一条小河，有三、四里路。他和我们对抗，对部队威胁很大。由于没有攻坚武器，我们很难拿下他的炮楼。怎么办呢？我们去找开明地主李维续，他是桑村有名的地主，当时桑村已是敌占区。他带一支武装支持八路军抗日。从他那里，我们得到二十发八二迫击炮炮弹。有了这二十发炮弹，威力大多了。我们舍不得全用上，仅用十发炮弹一打，这个地主便吃不消了。炮楼上

的敌人全跑掉，刘广田也跑了。我们把这个恶霸地主的财产没收后分给了穷苦农民，同时给军队增添了一部分给养。

我们打国民党顽固派申从周这一仗，震动了鲁南广大地区。原来的顽固派，不敢再顽固了。原来不开围子专与八路军作对的地主，现在也开围子了，不供八路军给养的大地主现在也主动地供给养了。但是，就在我们军事上打了胜仗的时候，由于思想上不谨慎，政策观念不强，政治上开始犯了错误。

打完了申从周等顽固派，鲁南的一些中小地主武装纷纷表示向八路军开围子，供给养，但不愿交出武装。在抗日统一战线还在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孤立国民党顽固派。但是，当时的省委领导同志没能这样做。相反地却宣布说，开围子不行，供给养也不行，非缴械投降不可。结果，我们扩大了打击面。当年的鲁南，统统是一个村子一个庄园，有一个地主当司令，佃农就是他的兵，在村子周围筑起围墙，算做一个土围子。你要进这个村子，非得经过地主武装的许可不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时刻提心吊胆，四周都是地主武装的土围子。那些地主表面上应付我们，但内心里非常恨我们。连老百姓我们也很难接近。真正支持八路军开展抗日工作的只是少数村子，多数对我们有成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打了胜仗，但兵员难以补充，给养无法保证，根据地也难创建起来。最后，为了集中兵力，我把二团、三团合在一起编成一个团，由钱钧任团长，汪洋任政委，根据省委的意见，我们冒着三十里路的大雨行军进驻益县的西集。

西集在那一带就是一个大村镇了。这里有一个世袭的地主司令。当我们雨后突然进了他的村镇时，他正抱着几个婆娘抽鸦片

烟。听说八路军来了，他吓得浑身筛糠。这一次我们没有缴他的枪，而是把他所有枪支封起来。由我们看管。后来，我们向他宣传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个地主思想上有了转变。我们在西集住了一个星期，给养完全是这个地主供给的。他还提出要请我们作客，邀我们到他的司令部去赴宴。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些枪支没有封存，赴宴真有点“鸿门宴”的味道。为预防中计，我们架上了机枪，剑拔弩张。但是，结果还顺利，看来主要是怕我们缴他的械。

但是，就在西集驻扎期间，我军不断受到周围几个村子地主武装的威胁，空气非常紧张。钱钧几次向我报告说，赶快打吧，不然我们就被人家包围了。西集，当时是抱犊崮山区大地主们的中心和门户。现在看来，占领西集而又不注意做统一战线的工作，结果加剧了周围各县大地主对我们的联合包围。邹县大地主刘昭汉、褚汉峰，平邑县的大地主李鹤龄，费县的大地主李衣锦，滕县的大地主张连俊，实际上都串通起来，对付我们。他们企图联合起来与我们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打电话告诉汪洋同志：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变的准备，但是绝不能打第一枪。钱钧同志后来说，敌人离我们二百米了。我说：离一百米，他们不打我们，我们也不开枪。在西集，我们做了这个世袭司令的工作，把枪还给了他。使我们得以安全地撤离了西集，避免了一场大的军事冲突。

离开西集，我们来到郭子化同志领导的根据地。我与郭子化同志交换了意见。正是烈日当头的三伏天，他还请我吃了西瓜。我走出村子去赶部队，突然听到远处有枪声。回村问郭子化：东方为何响枪？他说，不知道。我根据枪响的方向，派侦察部队去

了解情况。原来郭子化同志还在那里搞“左”的政策。人家主动提出要开围子，欢迎八路军，但他仍命令他的部队非要缴人家的枪不可，结果闹翻了打了起来。当时在那里打仗的是郭子化同志的特委第一大队，大队长叫愚公，实际上这个同志姓袁，说是袁世凯的孙子，当时别人开玩笑叫他“小皇帝”。这个同志打仗很勇敢，也有计谋，是个“南开”的大学生。但是他也同样执行了“左”的政策。虽然人家是地主武装，但现在已经宣布抗日了，为什么一定要缴人家的枪呢？结果打起来了，双方伤亡很大，大队几乎覆没。我派部队去支援他们，才把愚公等同志接应回来。

后来，形势发展证明，在鲁南创建大片根据地是很困难的。省委领导决定返回鲁中沂蒙山区创建根据地。那里除了秦启荣等少数国民党顽固派之外，国民党官员、将领于学忠、石友三、高树勋与我们还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当地的群众基础也比较好，特别是党的组织和人民武装发展比较快。

王庄时代

一九三八年九月，郭洪涛同志率领南下的省委机关来到沂蒙山区沂水县西北部的王庄。后来这里成为中共苏鲁豫皖省委和山东分局的所在地。这在山东省的革命斗争史上称为“王庄时代”。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开始（同年十二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夏季日本鬼子扫荡中王庄失陷为止，约一年的时间，山东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一直设在王庄。

当时，郭洪涛同志和我到王庄之后，边区省委机关就设在一个大教堂里。这个村子不大，但却有个很大的教堂，教堂内还有外

国的神父，经过交涉，省委机关就搬了进去。省委干校设在孟良崮北部的岸堤村。省委到王庄之后，开头一个主要任务是整顿机关，建立和健全领导机构，加强省委的领导。当时省委还确定省领导机关要在沂蒙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省委召开了苏鲁豫皖边区的县委书记会议，会上郭洪涛同志代表省委作了《目前抗战形势及我们在苏鲁豫皖边区当前任务》的报告。会后，省委对各地的工作加强了领导。

不久，郭洪涛同志要我去把跟随省委南下的部队交还四支队，然后再返回省委机关筹建军事部，当时四支队还有两个团在支队政委林浩同志率领下在这一带坚持斗争。我把四支队的队伍带到莱芜，交给了四支队的领导同志。这时廖荣标同志调到四支队任司令员了。钱钧同志已调离四支队工作。在我返回王庄途经莱芜县东部的悦庄时，恰巧碰上了张经武和黎玉同志。他们带领的一个营（津浦支队）和部分干部刚刚来到鲁中。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中央通知：派张经武同志来山东工作。张经武同志问我到哪里去，我当即将回王庄建立中共山东分局军事部的情况向他和黎玉同志作了汇报。张经武同志说：“你就先别回去了，我们带来的这个营和一批干部先交给你管。我们去王庄找郭洪涛同志商量，以后的工作研究了再通知你。”

一九三八年，我山东各抗日游击队，在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英勇开展对敌斗争，取得了辉煌战果。根据七个抗日支队的统计，到一九三八年底共击毙敌松井大将、山村中将等以下敌伪军三千三百余人，俘虏敌伪军一百八十余人，击落敌机两架，击毁敌汽车六十八辆，火车头十七个；并一度攻入济南，四次攻入烟台，两次攻入威海，收复县城十余座，并在胶东的蓬莱、黄县、

掖县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我党领导下的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华北局山东分局，领导成员暂时不变。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领导和指挥山东各支队的武装斗争，并任命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九年秋，王建安同志来当副指挥。山东纵队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部长马馥堂）、卫生部（部长白备伍），并辖第二、三、四、五、六、八（七、八支队合并而成，后改为一支队）、十二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两个特务团、临郯独立团等单位。每个支队相当于一个师的主力部队。

山东纵队刚成立时，名义上辖这么多的部队，但这些部队散布在山东各地，领导机关要人缺人，要兵少兵，办公地点更不用说了。指挥部还是设在王庄的教堂里，和山东分局靠在一起。黎玉同志和我住楼下的两个房间，张经武同志住炮楼上，小屋只能放下一张床，再放一个小桌子就放不下手脚了。司令部分科，政治部分部。作战科设在楼上大一点的一间房子里。我把鲁南特区的一大队队长愚公同志调来当一科科长。二科长是郭志远，三科长叫闻述尧，四科长为丁如。

山东纵队成立后，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一月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编成十个支队（一、二、三、四、五、六、九、十二、挺进、陇海南进支队）、三个团（特务一团、特务二团、临郯独立团），约两万

五千人。地方独立营团约一千六百人。同年三月三十日，遵照十八集团军颁布的整军计划，我山东纵队进行第一期整军。整军后的建制调整如下：

七支队、八支队合编为一支队，马保三任司令员、钱钧任副司令员，约两千多人，原来的三个团现正式编为三个营，作为纵队的机动武装，活动在鲁中地区：

刘海涛为二支队司令员；

第五支队的六十一团与十二支队合并，成为新的十二支队，活动在临沂、费县边区：

黑铁山起义组建起来的三支队，任命马耀南为司令员、杨国夫为副司令员，建制不变，人数众多，仍活动在胶济线两侧的长山、周村、桓台一带：

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起义组建起来的四支队洪涛为司令员，不久洪涛同志因病去世，又调三支队司令员廖荣标同志为四支队司令员，林浩同志为政治委员。编为三个团，活动在泰安、莱芜一带地区。

由文登天福山起义组建起来的五支队，高锦纯为司令员，宋澄为政治委员。调走六十一团后，仍编三个团，巩固胶东蓬、黄、掖根据地：

由张伯华领导的起义部队组建的六支队，张伯华为司令员，段君毅为政治委员，副司令员为何光宇，仍活动在泰安、津浦铁路以西、鲁西一带。此外，鲁南、鲁东南仍有一些部队坚持当地的斗争。

总之，各地区游击队都在发展并一天天壮大起来。

山东纵队成立后不久，山东分局决定从渤海地区调四百名干部来鲁中受训，然后转送到延安去学习。当时，三支队通信营护

送这批干部南下。三月二十九日，当走到博山、益都之间的太河镇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国民党山东省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第三纵队司令）的第四梯队的袭击。当时由于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在受顽固派袭击之后不敢果断地还击，害怕破坏统一战线，而无原则地忍让，结果使一百多名干部惨遭杀害，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牺牲。这件事的教训很深刻。党中央对太河惨案非常重视，不久便电示山东分局：山东统战工作过去退让过多，今后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以严肃态度对待，坚决进行反击，对形同汉奸的分子（如秦启荣之流）必须坚决打击之。姚仲明同志为这件事还专门写了一个剧本在解放区上演，名字叫《同志，你走错了路》。

四月上旬，罗荣桓同志也来到山东分局，向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这时我们才知道，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结束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担负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并提出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强调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并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号召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学习，我们才逐步认识到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出现的偏差，并注意从中吸取教训。

一纵来鲁与山纵合并

一九三九年是山东党和军队领导机构变化比较大的一年。不

少同志搞不清楚一纵、山纵、一一五师、山东分局、苏鲁豫皖分局的相互关系，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领导机关和名称不断变化，让人难以分清楚。

张经武和黎玉同志从延安出发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真正到达山东的鲁中是十一月份。山东纵队从十一月开始组建，十二月中央军委才下达命令成立。就在这期间，中央对一一五师入鲁的问题进行了几次电示。开始说让张经武同志把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带来，后来又说不带了。一九三八年九月，肖华同志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机关百余人抵冀鲁边区。到一九三九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才率三四三旅六八四团到达鲁西。一一五师的司令部入鲁的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当时，我带八支队到石莱、仿城一带去接应他们过津浦铁路。

在石莱、仿城地区，我们和一一五师司政机关和一个团会师了。当时带领一一五师司令部的领导人是参谋处长王秉璋，随同他们来的有教导大队和第七团。七团团长是彭雄。

一一五师入鲁后，接连打了一些胜仗。特别是八月二日梁山战斗（鲁西南），一一五师歼灭日伪军六百余人，俘二十余人，缴获炮三门、轻重机枪十余挺。这一仗，坚定了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信心，鼓舞了山东人民抗日热情，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一一五师入鲁之后，山东境内便出现了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支八路军队伍。早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央已决定：将山东分局扩大为苏鲁豫皖分局，郭洪涛为书记。这就是说，山东的党政是统一的。为了统一指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武装斗争，中共中央派徐向前、朱瑞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六月来到鲁中。八月十

日，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正式任命徐向前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纵队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和苏北的所有八路军部队。与此同时（八月九日），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为书记，其他成员有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张经武等同志，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民的工作。

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后，除司令员、政治委员外，其他并没有什么机关，随同徐向前同志来山东的只有王建安、罗舜初、谢有法等几十个干部，领导机构也难以组织起来。后来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又不满意一纵指挥。这时，徐向前和朱瑞同志与我们山东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商量说：你们山纵和一纵的领导机关合并了吧？后来经过协商和报请中央同意，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就算合并了（一一五师在山东独立活动）。合并后，一纵和山纵两个番号同时并存，向山纵发布文件时仍用山东纵队印章，但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合而为一了。这时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黎玉为副政委、我还任参谋长、江华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张经武、郭洪涛等同志便相继代表山东党去延安开七大去了。

当时，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在王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东里店。两个地方相距三十华里，当地老百姓经过比较之后曾有这样两句评价性的话：“王庄的歌声，东里店的勺声。”这是说王庄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歌声唱得很嘹亮，而东里店的国民党官员，花天酒地，勺碰炒锅叮当响。在一九三九年夏季的敌人扫荡中，东里店失守，被日伪军占领。

当时，我正在石莱、仿城接应一一五师过津浦铁路。等我带

领一支队返回山东纵队驻地时，日本鬼子已经在东里店安上了据点。这时，徐向前同志刚刚担任一纵司令员不久，他对我和张经武同志说：国民党把东里店丢掉了，还让敌人安了据点，如果我们把它拿下来，意义将会很大。于是，决定打东里店。

我们把主攻东里店的任务交给了一支队。他们用一个营主攻东里店据点，另外用一个营阻击沂水可能增援的敌人。主攻东里店的部队打得很顽强，已经打进东里店里面，记得是李福泽当营长组织进攻的。但是，阻击方面却没有打好，结果从沂水来增援的敌人一下子冲了过来。我主攻东里店的部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无可奈何地撤出了战斗。这样东里店便没有攻下来。

那一次徐向前同志可火了，他站在院子里狠狠地批评负责阻击的那个营长，甚至说到：这是给八路军丢脸。朱瑞、黎玉同志等徐向前同志火气消了，才去为那位营长说情。记得后来整风时期在延安扯起这件事来，徐向前同志对我说：现在看来，这个仗也是我决定的不太妥当。我把你们都当成了能打仗的老部队，没想到你们是那么新的部队，再加上那个营长指挥上的错误，结果没打下来，还有些伤亡。从这件事，我们也看到了徐向前同志严格要求自己 and 主动为下级承担责任的精神。

一九三九年秋天，一纵和山纵合并不久，敌人扫荡过了，东里店又没有打下来，地里的高粱砍了，青纱帐没有了，群众的情绪也不怎么好，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还经常对我们进行骚扰和攻击。秦启荣的活动范围在莱芜以北胶济铁路以南，主力在淄河流域与泰山之间。为了鼓励山东人民的抗战热情，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徐向前司令员决定要打秦启荣。八月下旬，胶济铁路以北的三支队也调到了铁路以南，与一支队、四支队一起参

加打秦启荣的战役。这实际上是集中了山东纵队的主力。作战方针是徐向前同志决定的。到前线指挥是张经武同志和我去的。这一仗的主要作战地点在胶济线以南的淄河流域的福山、八陡一带。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将秦启荣的主力击溃，缴枪两千多支。打完这一仗之后，我军的部署是：三支队留在淄河流域打扫战场，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四支队调回莱芜地区整训；一支队面向临朐敌伪军担任警戒任务。

打完秦启荣，我们估计日伪军可能出来骚扰，令一支队驻守在临朐县西南山区。当时纵队给他们的任务是：保卫沂山、鲁山根据地；面向胶济线，保持鲁中与胶东、清河根据地的联系，同时靠近山东纵队指挥部，随时又可以作为纵队身边的机动武装力量。

当时，五井镇驻守一支队的一营，支队司令部设在八里路外的茹家庄。五井镇在临朐县城西南三十余里的山区，镇四周围有五六米高的石砌围墙，四周各有一门，象个小城堡。十月二十四日下半夜，驻益都、临朐城的一批日伪军突然来袭击五井镇。当时在镇上的有一支队的副司令员钱钧和一营营长李福泽。敌人首先偷袭并占领了五井东面三百米处的莲花山，然后向五井镇发起进攻。天亮之后，钱钧和李福泽同志侦察了敌人的兵力情况，机智果敢地组织反击，中午便夺回了莲花山。当时，我和张经武同志在纵队指挥部及时了解了作战情况，命令他们咬住敌人，力争全歼。最后把一百多名日伪军控制在五井东面一个坟地里。经过激烈战斗，敌军被全部歼灭。

这一仗，全歼日本鬼子一个中队。仅坟地里就有敌人六十多具尸体，其中日军大约四十名。日军中队长木莫、小队长岩井和

石臼在这次战斗中毙命，伪鲁南警备副司令王德平被击伤。我山东纵队成立之后，第一次打这样好的歼灭战，第一次缴获敌人的九二重机枪。其它缴获还有迫击炮、掷弹筒、歪把轻机枪和步枪。当年的《大众日报》曾发表题为《庆祝临朐大胜利》的社论，称赞五井歼灭战为“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在打扫战场时，我八路军战士发现全部日军在衣服里都写有“符”。“符”的内容多是日本用武士道精神麻痹士兵的精神鸦片，大意是上帝保佑你勇往直前，为天皇尽忠能上天堂之类的话。由于日本士兵受精神毒害太深，战斗中几乎没有人投降，甚至打扫战场时垂死挣扎的日军伤员还用脚蹬我们的战士。这一仗也使我们的部队亲身体会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残忍。

后来，我们向徐向前司令员汇报了打败秦启荣顽军及五井歼灭战的情况，他对我们打秦启荣没有全部歼灭敌人不甚满意，但对五井歼灭战评价很高，并嘉奖了一支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我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军区（胶东军区）司令员。当时，山东共划分为三个军区，鲁中南为第一军区，鲁西为第二军区，胶东为第三军区。我告别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到胶东上任去了。

回忆第六十七军参加会攻太原

韩 伟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华北我军第十八、十九、二十等三个兵团及西北、东北我军各一部和晋中军区部队，共二十五万余人，在太原前线总前委指挥



一九四九年，韩伟同志在围北平时摄于安家营村。

下 在第十八兵团等部前期对太原守敌长围久困的基础上，发起会攻太原之战，全歼守敌，结束了反动军阀阎锡山长达三十八年的统治。

(一)

我十八兵团及西北我军一部和晋中军区部队，在晋中战役歼灭阎锡山主力五个军部、九个整师后，乘胜逼近太原，将敌残部第六十六、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暂

编第四十五、第四十九师和第八纵队等六个师压缩于太原城及其周围南北宽四十里，东西长三十五里的“盆形”狭小地区

太原是山西省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位于晋中盆地北部，东依罕山，西靠汾河，南为平川，北面山岳起伏。整个地势利守不利攻。

阎锡山利用太原城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北起周家山、黄寨，南达武宿、小店，西起石千峰，东至罕山的广大地域，增修了五千多个“梅花碉”、“方圆碉”、“火炮碉”、“人字碉”、“百川碉”，还有什么“好汉碉”、“老虎碉”等等各式各样的钢骨水泥碉堡；构筑了“莫奈何”、“侧防倒打”、“无敌”、“三不怕”（不怕枪、不怕炮、不怕炸药包）等各种形状、甚至藏于地下的坚固工事一百多座；还有无数纵横交错的明壕暗道。整个防御体系形成了全面地、纵深地、鳞次地密集火网。阎锡山以为有了这样的工事，加上日本的战术（阎留用了许多日本战犯），美国的援助，就可以守住太原了。

晋中战役后，蒋介石亲抵太原布防，指挥阎锡山将扩编充实的两个兵团、六个军部、十五个步兵师、三个特种兵师，组成了“四道阵地”（外围山地主阵地、第二线村落预备阵地、护城警戒阵地、城垣核心阵地）、“五大要塞”（城东北卧虎山，城东南双塔寺，城西北聂家山、白家庄，城东剪子湾）、“六个防区”（城北、城南、城东、城东南、城西北、城西南），阎锡山自诩他的防线是“华北第一”、“足抵精兵五十万”。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也称之为“反共模范堡垒”。阎锡山曾得意忘形地比方说：“太原防御体系，好象人的形状。东山为头，汾西是脚，石嘴子和风阁梁如同两只眼，城内是五脏，武宿、新城两

个机场分居南北，宛如两手。整个防御结为一体，互相策应，严密坚固。”

为保住这个“反共模范堡垒” 蒋介石先后从西安、榆林空运第三十军等部一万多人增援太原。阎锡山更是疯狂抓兵，从十几岁的小孩到五十多岁的老人都抓来，编成什么所谓“铁血师”、“神勇师”、“坚贞师”。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内就抓兵八千。为了减少粮耗，阎锡山无辜残杀居民，逐老弱病残于城外，太原城变成了饥饿城、死亡城、人间地狱。广大士兵和人民群众更加渴望我军早日解放他们。

当华北我军第十九、二十兵团奉命开赴太原前线，会同第十八兵团等部把太原围得水泄不通时，我们遵照毛主席指示，仍以极大耐心迭次正告阎锡山：“速即归降”。但是，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封建军阀阎锡山置我军正告于不顾，在一次美国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装腔作势地在桌子上放着许多毒药水，门外摆着一口棺材，声称：“我阎锡山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我就和我的军官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阎锡山此举是为了给部下，更是为了给他自己壮胆。其实，他比谁都恐惧 以至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商讨“和谈”大事为名跑到南京，再不敢回来了。临逃前，还再三指使战犯孙楚、王靖国、梁化之等人，一定要依靠坚固设防和十万兵马及九百余门火炮，与共军决一死战。然而 他的黄粱美梦，象肥皂泡一样很快破灭了。

(二)

早在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十八兵团及友军即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发起了太原战役前期作战，经近两个月的战斗，共歼敌五

万余人，给阎锡山严重打击。

十一月初，东北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后，随即挥师入关。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惊恐万状。为稳住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将其歼灭在华北境内，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着眼全局，于十一月中旬致电徐向前、周士第，命令所部缓攻太原，指出：“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为不让敌人逃窜，毛主席还命令我军对张家口、新保安等地之敌“围而不打”，对塘沽沿海一带之敌“隔而不围”。）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十八兵团等部对太原守敌实行了长期围困。守敌如瓮中之鳖，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寒交迫，守突两难，生活仅赖于美蒋用飞机供应。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守敌先后计有两万多人向我投诚。

平津张战役后，被敌人吹为“华北第一”、“足抵精兵五十万”、“反共模范堡垒”的太原城，便成了一座失去依托的孤城。敌人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我军士气高昂，而且可以集中绝对优势于敌的兵力，夺取太原的条件更加成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以十八、十九、二十等三个兵团及西北、东北我军各一部和晋中军区部队，发起太原战役后期总攻作战。

三月十二日，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军等部，在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天焕率领下，奉命从北平郊区出发，向太原开进。部队在“扛起枪，走得棒，赶到太原打个歼灭战”，“消灭阎锡山，解放全华北”口号的鼓舞下，昼夜兼程，翻山越岭，连续急进，于月底到达太原前线，与十八、十九兵团等部会

师。

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罗瑞卿任副政治委员。同时决定，成立太原前线总前委，成员是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徐向前任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任副书记。

鉴于太原守敌被我军长围久困，军心动摇，许多官兵盼望解放，毛主席还多次强调指出：太原作战，应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以利进一步分化瓦解守敌，促成早日攻克该城。

总前委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与重要指示，召开了师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会攻太原作战问题。会上，罗瑞卿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全国及华北的军事、政治形势。周士第、陈漫远分别讲了军事和战术问题。彭德怀从中央返回西北途中，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指示。他说：太原虽是全国第一流的要塞城市，但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英勇顽强地作战，就一定能攻克它。阎锡山把太原防御比作一个人体。那么，我们就要砍掉它的“头”，挖去它的“眼”，截下它的“手”和“脚”，让它“身”、“首”异处。他的话把与会同志都说笑了。

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以分割包围的战术，首先将敌主力歼灭于城垣之外，尔后从三个方面攻城，全歼守敌，解放太原。

按照总前委确定的作战方针，前线司令部对会攻太原作了具体部署。我们六十七军由城东北突破丈子头，尔后迅速西进，占

领新城以南之北飞机场；六十八军附第七军一个师，由兰村沿汾河西岸向南攻击，直插北机场以西之汾河铁桥，会同我们军切断北机场以北之敌而歼灭之。鉴于卧虎山、双塔寺为外围防御最坚固的阵地，“前司”还决定：在会攻太原第一阶段，只对卧虎山、双塔寺实施包围压缩，在第二阶段克城后再攻这两地，或在攻城的同时，伺机攻夺之。

与此同时，总前委和“前司”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要以释放俘虏、夜间喊话、投送食物、散发传单、宣传我军俘虏政策等形式，对守敌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这些指示，对争取守敌投诚，瓦解敌军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使会攻太原得以迅速胜利结束，我军只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就突破了敌人设在太原城外三十至四十里的外围坚固纵深防御，打到了城垣；攻城战斗仅仅用了三个多小时，就解决了问题。

（三）

会攻太原的战斗命令下达后，经过十多天战前准备，指战员热血沸腾，信心百倍，大家说：敌人的“三靠”（飞机、大炮、工事）不可怕，我们的“三靠”（勇敢、技术、智慧）敌人怕。

四月六至七日，我和政委旷伏兆、副军长刘儒林、参谋长赵冠英率第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政委李布德，第二〇〇师师长盛治华、政委钟华农及军司令部有关人员，用整整两天时间到现场反复侦察地形，深入研究敌情，寻找守敌薄弱点，选择突破方向和突破口，并区分了具体任务。

四月二十一日六时，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静谧的天空，会攻太原外围歼灭战打响了。霎时，太原四周万炮齐鸣，天崩地裂，完全被隐没在浓密的硝烟之中。广大指战员在强烈炮火掩护下，按预定部署向守敌长驱直入，猛插分割，使敌防线迅速土崩瓦解。

六十七军各部队根据自己任务，以神速勇猛的动作，向敌多路突击，连续进攻。战至八时半，第二〇〇师歼敌第六十八师大部，占领了太原东北要点高家场。至十一时，又乘势夺占了通往卧虎山的咽喉丈子头，为第一九九师的穿插打开了大门。八时半，第一九九师迅即由第二〇〇师打开的突破口猛插敌人腹部，十三时占领南凹，十六时攻占柏杨村、七府坟和飞机场。这时，二十兵团三个军会合于北机场、光社地区。至此，北区守敌四个师为我全歼。在这前后，从东、西、南三面进攻的我军，犹如三把锋利的钢刀插进敌人腹地，在一昼夜间，除卧虎山、双塔寺两个坚固“要塞”仍为敌残部据守外，整个太原外围防线全被我军打乱和粉碎了。

二十一日二十四时，兵团指示六十七军抽一个师参加攻城。我们反复研究，决定全军对卧虎山包围压缩，以保障攻城部队侧翼，并力争在攻城的同时夺取该地。这一建议报告“前司”和兵团首长后，当即得到了同意。

卧虎山位于太原城东北三里处，被敌人称为“五大要塞”之首。该山的得失，是太原城能否固守的关键之一。阎锡山利用这一屏障，修筑了连如网状的各种碉堡一百六十多个。碉堡之间有暗道相通，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并辅以野战工事、外壕、铁丝网、鹿砦、峭壁和广泛的布雷区，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

防守这里的是敌东北区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率领的第十九军军部、铁血师全部、暂编第四十师大部和暂编第六十八师一部，共五千人。曹国忠曾向阎锡山拍着胸脯说：“我既然奉命守在这里，就是骑在老虎身上。我要让共产党在这里寸步难行！”

二十二日晚，第一九九师一个连在深入“虎尾”（西区）敌人阵地侦察的时候，发现守敌都躲在碉堡内不敢露头，即灵活地搭起人梯爬上峭壁，秘密地插到敌人的“人”字碉堡的死角下，对着敌人碉堡喊话：“阎军兄弟们，全国都快解放了！太原也被包围了，投降吧！解放军宽待你们！”敌人火力不好发扬，又摸不清我军底细，便乖乖地向我投降了。接着，另一个连也以夜摸和强袭的办法拿下了两座平台的第十四号碉堡，突破了卧虎山区防守要点，创造了向纵深进攻的良好战机。

为抓住战机，趁热打铁，迅速拿下卧虎山，军司令部当机立断作出决定：以第一九九师攻击“虎尾”、“虎身”（中区），以第二〇〇师拿下“虎头”（东区）。

敌人工事虽强，但士气瓦解。我军各部队以高度孤胆作战的精神，发扬近战夜战的长处，勇猛地分向敌纵深楔入、穿插，把各个碉堡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用火力压制、爆破和喊话相结合的方法，逐个地夺取了“虎尾”、“虎身”、“虎头”阵地。第五九五团巧妙地绕过敌第十五、第十六号碉堡，一直插到敌人的心脏。顿时，敌人慌乱起来，兵败如山倒，东北区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以下四千余人被生俘。阎锡山吹嘘所谓“共军三个军一个月也攻不下的五大要塞之首”，我们实际上只用了五个营的兵力不到十个小时就攻克了。太原总前委表彰我部：“战术指挥上可说是主动、积极、机动、灵活，抓紧战机不失时宜之范

例”。打下卧虎山，为攻城部队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随即，我军奉命急进大同协助冀晋部队受降。

在我围攻卧虎山的同时，攻击双塔寺的部队也迅速拿下了这个“要塞”阵地，歼敌四千余人，活捉东南区总指挥兼第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四月二十四日，我军发起了总攻城垣战斗，一千三百多门火炮同时怒吼，千万条火蛇直奔太原城。顷刻间，巨雷滚转，地动山摇。我兵团第六十六军将第一面红旗插上太原城。在我军强大攻势下，阎锡山封建统治三十八年之久的“反共模范堡垒”，仅仅三个多小时就归于毁灭。古城太原获得了新生！成千上万居民涌向街头，欢庆胜利！

会攻太原作战，我军共歼敌一个绥靖公署，一个省保安司令部，两个兵团部，六个军部，十五个步兵师，三个特种兵师，连同前期歼敌在内，共十三万余人，生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以及日本战犯今村中将、岩田少将等，缴获甚多。

三·一八惨案和 中共北方区委

冉 廷 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发生的惨案，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充当临时执政的执政府临终前对爱国群众的一次大屠杀。回想当年喋血街头，敌人那样的凶恶残暴，中国共产党人承受着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巨大压力，奋斗牺牲，积年累月取得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北方的革命运动

谈三·一八惨案，要追溯到中国革命的起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北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李大钊同志由日本回来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主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中央责成他负责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从此，北方的革命爱国斗争进一步发展。

一九二二年九月，苏联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建交，北京区委组织民众团体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十一月又组织北京和各地学生、工人热烈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一九二三年九月，苏联第二次

派代表来华，要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党组织各地的人民表示了更热烈的欢迎。但执政府故意刁难苏联代表，使谈判几乎破裂。我党组织各地群众纷纷指斥北京政府，同时还组织北京学生直接向执政府请愿示威，促使执政府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与苏联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飞行员还欢迎群众坐上飞机环绕北京两圈。但每次对苏联友好的群众运动，都使得执政府更加害怕“赤化”。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后，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北京翠花胡同八号帮助国民党左派成立了市党部，并指导其工作。九月间冯玉祥发动政变，成立“国民军”，同国民党合作，这时的革命工作就更加复杂和紧张了，北方区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党小组指导国民党左派市党部的工作。这个党小组由陈毅同志负责。

接着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三人合作。孙中山北上，号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这时党又组织各地人民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开会，到会代表大都是我党、团员及进步群众，如董庸生，邓颖超就是四川和天津的代表。这一会议，同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针锋相对，给军阀分赃会议当头一击。

不幸，孙中山于三月十二日在铁狮子胡同逝世。我党在全国和北京动员广大的民众悼念孙中山，继承他的遗志，使国共合作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加强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也壮大了我们党、团和革命阵营。北洋军阀政府更形狼狽，对我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更加怀恨。

三·一八前北京的革命形势

孙中山逝世后，接着发生了“五卅”惨案和广东省港大罢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抵制英、日货，要求用国民外交的方式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直接打击，其中尤以要求对“五卅”、“沙基”、“长沙”、“南京”、“万县”、“重庆”等惨案进行国民外交为烈。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和四川国民外交代表团首先到北京。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团长林森，由于参加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广东国民政府便改派徐谦接任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团长。徐谦与我党合作的时间较长，直到三·一八惨案后，被段祺瑞下令通缉，他才离京南下到武汉。

北京的群众运动，当时已经成了有组织的洪流，党的直接领导人是李大钊，团的领导人是肖子暉（肖三），他们是党、团北方区委的负责同志。其他群众团体的领导人是：学生代表姚彦，工会代表刘宁一，妇女代表刘清扬，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安体诚，国民党市党部代表陈毅，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代表王一飞，四川国民外交代表团代表冉廷栋，文学艺术界代表孙席珍，新闻界代表陈某。每天上午在沙滩北京大学一院举行党内工作小组会，由陈毅同志主持，布置当天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和举行天安门群众大会的办法以及接待进步团体和进步分子等工作，如接待东北学生留日归国团，国民党中央代表黄昌教等，都安排好程序和主持人。我党、团的干部由北方区委和北京市委领导，直接参加或领导群众的爱国运动。如北方区委党的李大钊、团的肖子暉，北京市党的刘伯庄、团的唐从周都要在每次运动的现场出现，即时襄办并

指导工作。先后举行的“讨张反日大会”（讨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郭松龄追悼会”（纪念张作霖所部将领起义失利）等三十多个群众大会，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在几十次群众运动中，有一次群众把反动的《晨报》馆砸了，还给它一把火，使得北洋军阀政府更加恐惧群众运动的扩大和我党势力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我们的敌人不特有军阀和帝国主义，还有反动政治和文化集团，斗争是多方面的。当时国民党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我党组织的一切公开的群众活动，都是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进行的。日本出兵南满后，我们提出“讨张（张作霖）反日”的口号，除了多次举行群众性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演讲宣传外，还发动抵制日货。留日归国团，各民众团体，各校学生会，也都一起投入斗争，每天分批到前门外总商会集合检查日货。大家工作认真，斗志昂扬。党里面的如安体诚、陈毅、刘清扬等领导同志都直接参加这些活动。抵制日货工作，是由留法勤工俭学回来的孙卓章同志负责的，他组织了一些四川学生一道工作。随他工作的，记得有法大学生孙福东、吕寒潭等。孙卓章所领导的抵制日货工作，是很出色的。

这时，苏联宣称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紧接日本之后出兵北满，以抵制日本的势力。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政学系，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等都趁机反对我们。国家主义派还到天安门开群众大会，但只有几百人参加。我们组织了一些同志破坏他们的集会。同志们分散在群众中间，几个同志攀上主席台去，宣布这是一批卖国分子在这里蒙蔽群众开卖国会，他们投降日本，给日本作应声虫，是出卖祖国的汉奸，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走

狗，替日本讲话，要群众不要受骗。于是台上台下一片喊打声，我们的同志在各个角落里喊打，群众也跟着喊打，那些国家主义派骇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而去。我们和群众又转来利用他们搭好的台子开会。

反动派攻讦苏联，说苏联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北满。各国的新闻记者也很注意我们同反动派的斗争。翠花胡同国民党左派党部召开会议，由徐谦主持。苏联大使馆中文参赞伊奉峨前来说明：苏联不需要侵占中国的领土，进兵北满，主要是为抵制日本侵吞整个满洲，苏联为了国防安全和国际正义才出此一举。我们当然相信这一声明，但怎样应付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从下午一直讨论到深夜才决定了“联合苏联，进一步反日”的对策。各国新闻记者等急了，这时才赶忙如获至宝地把对策抄去发电讯。

三·一八惨案的经过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我们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时，把孙中山的像立在逊清王朝太和殿的皇帝陛座上面，北京民众从未进过皇宫，这次参加纪念孙中山的群众达二十余万人，可说是一次空前的悼念。我们借此宣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使广大的北京民众，受到一次革命的教育。如果不革命连向皇帝磕头的资格都没有，哪里能到皇宫来。

接着奉军再度进攻国民军。奉军利用日本兵船，挂上日本旗帜，伪装成日军，通过大沽口，辛丑条约规定，大沽口不许我国设炮台。国民军为了阻止奉军的进犯，便暗中在大沽口设了炮

台，并给运载奉军的日舰以炮火阻击。日本帝国主义受到损失，便援引辛丑条约、约齐七国共同提出最后通牒（本来是八国，由于苏联放弃了帝俄对中国的平等条约，所以只有七国），要北洋政府撤去大沽口炮台，并道歉赔款，不然就进军北京，来一个八国联军二次占领北京。消息由苏联大使馆传到我们这里，我党立即通知各民众团体和各校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北京群众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多次群众运动中，进一步了解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本质和帝国主义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加以对八国联军进北京的记忆犹新，害怕第二次遭到帝国主义兽军的残杀，于是群情激昂，摩拳擦掌，高呼打倒卖国军阀和帝国主义。

执政府接到七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通电，吓得手足无措，准备屈服。三月十七日上午，徐谦代表国民党到段祺瑞执政府，要求会见总理贾德耀；贾不在，徐氏给他留一字条，要他接受人民的请求，坚决拒绝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执政府倒打一耙，说徐谦是给他们下命令，不予理睬。于是我党发动各人民团体，向执政府请愿。队伍分批出发，一批去段祺瑞吉兆胡同的家里，段拒不见面。第二批去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执政府。结果，四川国民外交代表团代表杨伯伦被卫队刺伤，中俄大学女生黄湘的披巾被抢去。我党便利用执政府的暴行，将杨伯伦受伤的照片送各报馆刊登。因杨受伤后昏迷，照片象死人的形象，《京报》馆便刊出大标题“杨伯伦烈士为国捐躯”，这更激起群众对卖国政府的愤怒。第三批请愿队伍到国务总理贾德耀家里，受到很好的招待。大家集聚在他的大客厅里，被招待吃了许多西式点心和其他美味食物，夜里就用二十多张虎皮垫在沙发椅或地毯上睡觉过夜。贾德耀再三再四地威胁利诱，要学生代表回学校去埋头读书，国事

由政府来管理，但无论怎么说，学生代表总是不同意。结果，第二日清晨，贾又以中、西点心送客。

我党各级负责同志通夜未眠，由苏联大使馆得到消息说，各个帝国主义的意见并不一样。

这次日本和英帝国主义态度比较强硬，其他国家态度一般，有的甚至不愿卷入。因此，我们决定三月十八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请愿大会，用人民的力量迫使执政府不敢屈膝求和，击破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以最后取得胜利。但是北洋军阀对帝国主义非常惧怕，段祺瑞政府决心讨好它们，镇压民众的爱国运动。

三月十八日清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反对第二次八国联军的示威游行大会，到会的群众特别多，因为这是关系到北京全体市民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大家都义愤填膺地前来参加大会，有的小学校也率队前来参加，一下就汇合了两万多人。我们把杨伯伦的血衣昭示群众，群众即要求贾德耀出来亲自向人民道歉，并惩办凶手。当时大会便推举代表前去通知贾德耀，但直到大会将终，贾才派了一个人来，结结巴巴地说贾因病不能前来，由他代表贾总理向群众当面道歉，并愿查明凶手，加以惩办。群众大喊：“滚回去！叫贾德耀亲自前来道歉。”于是这位贾总理的代表便被赶下台去了。

这天的大会开得很好。主席团五人：徐谦、刘清扬、于右任、吴稚晖、安体诚。主席团讲完话后，就由总指挥和各分指挥率领群众，浩浩荡荡向铁狮子胡同进发，向段祺瑞的执政府请愿，反对他们向帝国主义屈膝求和。游行队伍经过东长安街、东单牌楼、东四牌楼，直到十二条胡同对面的铁狮子胡同里面的执政府前。沿途红旗招展，棍棒整齐（北京大学和中俄大学两校特别去西山

砍回来短柏树棍儿，准备和军警厮打），纸旗传单遍地飞舞，口号声和歌声不绝。当时唱的歌简单易学，寓意深刻。如“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去奋斗！去奋斗！”一路上此唱彼和，不大一会儿群众都学会了，大伙便一同唱起来，好不威风！

请愿队伍刚刚到执政府的大门口，特务便要关上东边的大门，群众见势不对，有一部分就冲出大门去，不许特务关闭大门。这时执政府门前横排着卫队，机关枪也架好了，西边铁狮子胡同口也有卫兵把守。我们把小学生和春明中学等校的女学生，排列在最前面，觉得卫队不至于对儿童和妇女开枪。黄湘同志告诉我说卫兵还是昨天那些人，带队的也是昨天那人，并没有撤换。我就去告诉安体诚同志，正碰上李大钊同志也在那里。我吓了一跳：他的处境太危险了！

正在这个时候，进入执政府的几个代表出来说：贾总理不在，要我们改天来。李芸园拿着话筒站在石台高处，询问大家：“我们还是改天来请愿呢，还是坚决不走，等着答复？”群众大呼：“我们坚决不走，等着答复！”台下一个学校的学生敢死队举手高呼：“我们冲进去！”还未行动，我就听到口笛响了一声，卫队开始脱手套。我正要约同各个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李芸园同志被打倒了。接着，机关枪就哒哒地响了起来。安体诚、王一飞和我连忙大声呼喊：“卧下！卧下！”但人群一闻枪声，便向东、西飞跑，许多人冲向东边大门，门小人多，拥挤不畅，许多人便从人身上跑过，翻墙外出。许多人被压倒在地上，有的人被杀伤，血流如注。从西边小河冲出去的人很少活着，因为铁狮子胡同海军部门口有一队卫兵阻击。

我们的同志在这紧急关头，还是首先照顾群众的安全，谭祖尧同志急中生智，抛掷一把银元和铜子引诱卫队士兵去拣，趁空带领一批群众从西门安全地冲了出去。东边的大门口和围墙上也有我们的同志在救护群众。如春明中学的女学生张锡珍(张晓梅)，就是工业大学的张一凡同志救护出来的。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铁狮子胡同有一条横道，通外面的大街，那里站着—个勇敢的同志，我也是随着谭祖尧掷铜元时跑出去的，因穿着皮鞋，踩在铜元上滑了一跤，一个卫兵正在躬腰拣钱，便顺手拿着学生遗下的柏树棍给我当头—棍，把我打晕过去了。醒来后，我立即翻身奔出，侧边胡同口站立的那位同志便喊着：“往这边来！往这边来！”我脱险后，也站在那里高呼：“往这边来！”许多群众跑到这边来安全脱险了。要是直奔向前，便会被海军部门前卧着的卫队阻击。我们在那里救了许多人出来。才被海军部伏卧的卫兵发现，端枪就向我们打来，一颗枪弹几乎打中我的头部，我们才撤走。

出到街上来，看见许多参加游行请愿的群众，有的在骂，有的在向群众讲演，有的血流满面，有的坐在黄包车上呻吟，有的身上血迹斑斑还在扶着同志走。许多群众的围巾和大衣被卫兵抢去了，有的身上带的钱被卫兵搜去了，这些卫兵真是土匪不如。

群众散后，遗尸二十七具。卫兵还对未死的人补枪，广东外交代表团的代表陈桂荪同志比较胖，没跑出来，只好倒地装死，就是被敌人卫队补枪打死的。已死的不许抬走，燕京大学的女学生魏士怡被打死了，该校约—外国教师以外国人身份才得进现场去查看。女师大学生刘和珍胸部中排枪七颗，显见是机枪扫射的。受伤的由同志们抬送医院，重伤的又死去二十四人，共计这次惨案死亡五十一人，伤二百余人。这是北洋军阀政权的垂死挣

扎和对善良的爱国人民一次大屠杀。这次的示威请愿，我们党和团的同志是全体参加的，群众伤亡多，我们的同志也牺牲不少。

惨案发生在上午十时，下午二时断绝交通，下午四时才准许少数人进去翻尸，但不许认领，还要示众。下午二时段祺瑞家里的卫队还抽调了六卡车士兵来到出事地点，加强警卫。敌人对于我们还是很害怕的。

惨案发生后，当天下午，我党北方区委和北京地下市委、团都召开紧急会，一面派同志去各医院慰问受伤群众，每人赠送慰劳金十元；一面调查我们的同志死亡和受伤的人数，这个情况当天夜晚就搞清楚了。此后许多年，国民党一直未对“三一八”惨案举行过纪念会，因他们认为这一次反帝爱国群众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第二天，《京报》发表社论，邵飘萍的文章很有力量，说段祺瑞丑脸粉墨登场，一般政客闻腥而来，我记得其中说段的司法部长章士钊的一句是：“丫环秋桐之辈，气喘而来归……”。（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上用秋桐别名写过文章，《红楼梦》上也有一个秋桐丫环）。许多报纸都替人民说话，我们自己的《国民新报》，我们帮助的《世界日报》、《京报》和林白水办的报纸替人民大打抱不平。其他，如《晨报》等反动报纸则为反动政府的残暴屠杀辩护。报纸副刊上，只有鲁迅先生为刘和珍写了悼念文章。

国民党左派翠花胡同党部和《国民新报》、中俄大学被查封，并通缉五十个人：徐谦、李大钊、李石曾、于右任、吴稚晖、刘清扬、安体诚……陈毅同志是第十四名，我第十五名。我在复旦通讯社得到通缉的名单后，立即报告党里，通知我们的同志和

国民党左派人员急速离京。同志们有的南下到广东，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搞革命。如徐谦、王一飞、邓季时、孙席珍等去广东。陈毅回四川，于右任回陕西，李大钊和我们转入地下。有的人改换名字，继续在北京搞革命工作。

保护中俄大学的斗争

第三天，天气阴沉，我们以各界追悼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为名，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会，《京报》邵飘萍作了沉痛的讲演，参加追悼会的人不多，大多是我党和团的同志。同志们倍感悲愤，心心相印。我看见陈启修（陈豹隐）夫妇，他俩告诉我中俄大学已经被查封了。

我急急忙忙跑回东总布胡同，和刘豫、杨鹤云等发动大家将学校文件印信、用具什物一夜之间搬出来，使学校成了一个空屋架子。我们准备自己另外再继续成立一个私立的中俄大学。

说到中俄大学，敌人是视为眼中钉的。中俄大学是原外交部俄文专门学校改建的。外交部俄专，是北洋政府用来培养中俄边界上的领事、县长以及对苏联外交人员的。这个学校，也和北京的其他几个专门学校（税专、盐专、交通大学）一样，要有大衙门持有大官僚的介绍信才能入学，有本事也考不取。改为中俄大学后，学校的性质变了，成为沟通中苏关系、培养革命青年的桥梁学校。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计划将俄国在北京的“北馆”（俄国侨民居住区）作为校址，把中国对帝俄的全部“庚子赔款”作为办校经费。庚子赔款中，帝俄分到的最多，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中俄大学的经费就会比美帝以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多十

倍，占地面积也宽八倍。中俄大学的毕业学生全部送到苏联留学，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这当然是一所很理想的干部学校。但是，敌人也会恨之入骨，该校成立还不到半年，便被查封而夭折了。我们继续奋斗，向执政府请愿，并发表告北京国立九大学学生书及告全市教育界和学生书，动员他们起来替中俄大学说话。各校在我们校内党团同志的影响下，纷纷发表宣言，支援我校。结果，政府被迫于国立法政大学分设一个俄文法政学系，把全部同学转入该校，并以参议院全部和众议院、进士馆的一部分为校址。由于达到了保存中俄大学这支革命队伍的目的，我们就没有另行成立私立中俄大学。不过这里应该说明：原俄专的学生中与大官僚有瓜葛的较多，愿意革命的多是新生。旧生有一部分不愿并入法大，就同外长王正廷勾结，恢复了原“俄专”的名称。

中俄大学是当时革命力量很整齐的一个学校，校长徐谦，教务长陈启修，训导长柏文蔚，总务长蔡和森。里面虽然有国民党左派人士，但学校的行政大权和学生会完全掌握在我党、团手里。并校后，我们争取把进步的教师也争取到法大俄文系来。后因我们发动择师运动，驱逐过八个教员，敌人发脾气，说我们是害群之马。党组织看原来计划不能完全实现，就把中俄大学的进步教师调到别的工作岗位。至此，北京地下党为中俄大学的护校斗争所做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俄使馆事件

这次惨案，正值北伐前夕，北方群众经此革命流血斗争的洗礼，都感到不尊命无以求生存，斗志更加昂扬，党、团组织吸收

的新同志特别多，要求南下参加国民革命的进步群众也很多。北方区委所领导的七省革命组织发展很快，尤以北京地下市委为最活跃。当时南方需要干部，北方区委输送了不少同志到南方去工作，北京地下市委还专门为南方革命队伍训练干部，有中国革命党校之称。北方的革命形势在客观上由于敌人的大屠杀而变得更为有利，这样就更需考虑北方区委的安全。当时决定把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市党部一齐移到东交民巷苏联驻华大使馆内。因为苏联大使馆有国际法和辛丑条约的保障，估计敌人不敢进扰外国使馆，要安全一些。所以李大钊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都迁入苏联大使馆内，对外就靠几个特别交通和工作同志直接进出来联系。

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打进了北京城，成立大元帅府接替了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执政府政权，把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到南口以外，阎锡山的地方军也由于傅作义失守涿州而退回山西老巢。张作霖来后，对革命势力更加凶残，立意想把我党的力量铲除干净，就和帝国主义暗中勾结，派军警进入苏联大使馆，捉拿我革命领袖和工作同志，这就是俄使馆事件。

俄使馆事件，我们事前是知道的，曾建议李大钊同志撤出，但他不同意。他分析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敢在外交上惹动苏联，在俄使馆内不但安全，而且有利于工作。因为当时我们除了做党和团的工作外，还要为帮助国民党左派、为北伐创造条件，对外联系可以利用俄使馆的电讯设备，比较方便。比如冯玉祥退到五原找不到去绥远的路，打电报来要地图，北京没有，我们又打电报到广东去，从孙中山家里所藏的地图中取得该地图，专人送到北京，又由北京派专人送给冯玉祥，他才得由绥远转道陕西进军河南，回到中州，帮助北伐。为了工作方便，李大钊同志坚决不撤离俄使

馆。后来情况紧急了，他叫其他同志撤出（如曾品良、史文书都是在事前翻越围墙出来的），自己仍带领十一个同志坚守岗位。

我是东交民巷各使馆的特别交通。因几天来敌人活动猖狂，暂停工作，我就回到法政大学李阔老胡同进士馆三院宿舍睡觉。四月八日大约上午九时光景，校工说有两个人找我，我急忙起床一看是北京党的地下市委书记刘伯庄和团的地下市委书记唐从周两个领导同志，我大吃一惊，忙问有啥重要事？他俩说叫我去俄使馆取出北方区委七省党员和团员的名册。又说一定要我去，因我当时虽是地下团委委员，但年纪却很小，容易混过敌人的耳目。我说李先生（我们对李大钊同志的尊称）已经下了命令，不准我们再进去了。他俩说：关系七省同志的生命，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如果不去拿出来，万一出了问题，非但党的北方组织要受损失，而且会影响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于是我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下午三时我仍然改装成西服童装打扮，洋服西裤，花帽花袜，倜傥跳跃，跑进俄使馆去。李大钊同志一看见我就很生气地说：“你来干什么？你来等死吗？”我说：“我来有事嘛！”李先生说：“什么事？”我说：“来拿名册。”李先生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了，象他平时最爱我一样，拉着我的手，紧迫地说：“哎呀！名册，快些拿走。”他叫人把北方七省的党、团员名册两本给我，我放在大衣左右两个口袋里，仍然跳跃而出。

我一出俄使馆大门，就看见穿灰布大褂的特务化装成黄包车夫守在门口，另外几个便衣特务，远远盯着俄使馆出入的人，见我出来，特务们就拉着空车来兜揽：“先生！坐车！”想拉我入圈套。我才不坐车，装着毫不在意地随跳随踢，象淘气的小孩子一样跑走了。便衣特务见了，就赶快前来追我。我从王府井大街

对过的一条马路出来，遇上国民党左派市党部妇女部长张挹兰（她不是我们的同志），她披着一块大红围巾，用缠过又放了的小脚一颠一颠地慢慢地走着。我靠近她说：“小心啊！”她回击我一句说：“怕什么？”我看后面的特务追来了，就匆匆走到往西开的电车站站着作候车的模样，特务跑得气喘吁吁，见我在电车站候车，想趁电车还没有开来喘一口气，便放慢了脚步，那知我见对面来了往东开的电车，就几步跳上东开的电车。我左手抓住攀杆，右手用大拇指和小指架在鼻梁上向那特务比划着，那特务气坏了，但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越街跳上电车跑脱了。为防特务打电话拦我，车到了东单牌楼，我就下车改坐人力车到东四牌楼。到了东四牌楼，我又进到四条胡同，另坐人力车到十二条胡同。到了十二条胡同，才步行到门楼胡同十二号一个同乡开的公寓里，我就在那里过夜，隐伏不出。

第二天一清早看报，得知军警进入俄使馆，李大钊、谭祖尧、张伯华（工人部长）、杨景山（国民党市委秘书、我们的同志）、路友于、姚彦、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李银连、谢承常等十一个同志被捕。另一条消息说，张挹兰也在家里被捕。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同志壮烈牺牲。

北伐开始后我党北方区委的工作

虽然我党北方的领导人李大钊等同志牺牲了，但是由于党和团事先有详密的规划，而且北方区委七省的党、团员名册未落入敌人手中，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同志们都在继续工作，不断扩大党、团的组织。由于三·一八和俄使馆事件两次惨痛的教训，同

志们化悲痛为力量，暗中进行宣传活动，参加革命的新同志特别多。我们源源不绝地向南方革命阵营里输送干部。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开始，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北伐军节节胜利。我们为了迎接大革命的到来，加紧革命新生力量的培养工作。这时党的北方区委由蔡和森同志领导，从工人、农民、学生三个方面发展，尤其重视北方各大矿场、铁路和广大的农村，直接发动工人、农民起来革命。

在学生运动方面，敌人见南方的革命起来，愈加心惊胆战，严加防范学生活动。我们则千方百计暗中坚持活动。由于李葆华同志和地安门交道口福音堂一个牧师熟识，该教堂有一个青年俱乐部，李葆华同志去参加活动很有成效。于是团的地下市委书记唐从周便利用这一灰色的教会组织展开青年活动，从中吸收进步青年。适因李大钊同志牺牲，李葆华同志随其母回乡，团委就派我去领导这个俱乐部。这里分话剧、音乐、魔术、跳舞、图书、医药等组。党组织调艺专的音乐、戏剧系的同志和女师大、女大以及其他学校的同志前来参加活动。俱乐部发展很快，从福音堂脱胎出来，成为北京青年学生的中心活动组织，活动范围扩展到二十七所大、专学校和七十多所中学。俱乐部每半月举行一次游艺会，除了演节目之外，还宣讲形势，北伐的消息，也常在游艺会中公布。各校举行纪念会等，俱乐部也都派会员前去表演。这样，俱乐部逐渐博得全市青年的热烈拥护。于是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就交给团组织了。青年俱乐部出版《中国青年》周刊，由北方区委编辑，发行最高额达两万份，为当时全国刊物销行之冠，对北方青年的革命思想起着鼓舞和教育作用。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农村、各厂矿和交通运

输部门都有了我党的组织，而且都在迅速扩展。妇女运动方面，由法国回来的郭大姐参加领导，她和石道礮、石道×等同志一起组织了“妇女之友社”。该社与青年俱乐部为姊妹团体，时常携手活动，进行各项革命工作。

党对于新闻工作抓得很紧。当时北京的《世界日报》是我党津贴的，每月的津贴费由我从北方区委杨善南或李炎瑞（李紫翔）处领来交该报总编辑张友鸾。该报不但发布我们青年俱乐部的消息和妇女之友社的消息，还特别在副刊上给我们留出地方，让我们出《绿叶》等专栏。至于北伐消息，更是特别宣传，为南方革命大壮声威。另外，复旦通讯社原来的后台是军阀方本仁。因为社长陈某是石道礮的爱人，被我们拉过来了。我记得在一次周末的决策会议中，对方本仁投南的事发不发消息发生了争论，一派主张暂不发表这一消息，以图继续领取北洋政府的津贴，我们主张立刻公布方本仁投南，以宣扬革命的声势。由于两派的意见不合，争论激烈，终于举起茶碗相打，不想就此把个复旦通讯社送終了。

党对于教育界也很重视，经常发动择师运动，以保护进步教师的饭碗。除了领导各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外，还另成立了法大附属中学、法语专门学校、适存学校、今是学校（反基督教的学校）等学校，由我党、团直接领导，发展和扩大革命的领域。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我们进行秘密革命活动，还是比较安全有利的。军警特务，我们根本不怕，为了开展军事活动，我们反而在军队中发展了党的组织。最可恶最难应付的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新右派。因他们一直伪装革命，在北方与我党合作，知道我们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他们叛变后从青

年俱乐部中分化出去，时常和我们面对面地捣乱。一次，在法大众议院议场举行的定期晚会上，他们纠集一些打手来捣乱，幸亏我们发觉很早，并及时调集党、团同志前来助威，把他们压服了，而且当场驱逐出去。其他如国家主义派也在学生中活动，一次，我们从印刷工人同志手中获得该派的反动名单，就在各校进行个别打击，阻止他们的发展和捣乱。这一来，法政大学的学生国家主义派领导人之一陈文中竟在学校的壁报上点名说我是共产党，并向附近的宪兵告密。于是我不得不离开法政大学三院的宿舍而去沙滩北大的宿舍里寄住。由于叛徒告密和捣乱，青年俱乐部停止了活动。

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形势，本来发展得很顺利，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武汉武装工人纠察队和湖北、江西、湖南武装农民造成很大损失，同志们大不谓然。同情陈独秀主张的北京地下市委书记刘伯庄等离开后，蔡和森同志作了新的安排，各级党委都进行了改组。刘豫同志接替刘伯庄任地下市委书记，杨鹤云任组织部长，陈章林任农民部长，我也调到市委工作，党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眼见南方各地的革命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有了新的发展，南昌起义，秋收暴动，湘南暴动……好不令人兴奋！于是北方革命也跃跃欲动，学校、农村和工厂、矿山、交通业的同志们都积极准备着。但组织武装暴动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枪支。于是，我们先做文字鼓动工作，在各街道、车站、厂矿、学校、军营贴标语、散传单。同志们半夜在街道贴标语，前面的人刷浆糊，后面的人贴标语。我们还经常在电影院楼下散一批一批的传单，也有时利用邮政寄传单。我记得，市委决定把传单投到张作霖的大元帅府里。我和施名溢接受了这一任务。施名溢到张作霖

的大元帅府后门和黄包车夫吵架；把卫兵引开，我趁势把一卷传单扔到后门内。第二天各报都刊出“大元帅府发现共党传单”的消息。北京民众见着，就象传神话一般传述着我党革命的英勇和前仆后继。

传单标语在北京城中如雨后春笋，随处都可发现。军警找不到线索，无可奈何。我们有时反倒利用军警替我们工作。如武汉国共分裂后，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的夫人经过北京，被张作霖扣押，我们就利用军警里面的同志买通关系，她被放走回国去了。

李勃海叛变 北方区党组织被彻底破坏

反动军阀对我们的活动始终是如芒在背，尤其是张作霖、吴佩孚合作后均在南方失利，对我党搜捕更加严紧。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反俄反共，千方百计地想发现我们的踪影，破坏我们的组织。户口清查特别严格，机关开会很困难，我们只能利用中央公园的咖啡座或北海公园的游船来开会。背静胡同的假家庭住不下去了，我们分散搬到各个大饭店去住下，又隐蔽了一个时期。但敌人终于找到了漏洞，张宗昌利用山东同乡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叛徒——李勃海。这个叛徒被张作霖许了高官，在大元帅府当起顾问来，出卖了我党的组织，抓到我党同志后，他在壁后指认，使许多本来可以解脱的同志暴露了身份。

由于李勃海的叛变，我党北方区的组织整个被破坏了。除已离开的同志外，许多负责同志和一般同志都被捕了，几乎无一幸免。共计被捕了三大批，后来又零星捕去些人，我是第三批被捕的。有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临刑前高呼：“共产主义万岁！”“无产阶级

级革命万岁！”慷慨就义，英勇无比。

尽管刑毒，同志们都能经得起考验，只有极个别的向敌人投降了。团的北京地下市委组织部长余永藻嘴里叫着：“要杀就杀，怕死就不是共产党员。”但他还是把团市委埋文件和名册的地点通盘告诉了敌人，以致全部团组织都遭到破坏。我们被捕就是由于他的出卖使然的。不过，余永藻也未得到好报，最后还是被敌人枪毙了。

对敌人的破坏，我党斗争得异常顽强。敌人破坏一次，我们就整顿一次组织；连续三次破坏，我们每次都及时恢复了组织，愈被破坏，组织愈坚强。其时组织上为了整顿各地被破坏的组织，一面为同志们找住所，一面把一些在北京不能隐蔽的同志调到北方区委各省去恢复和整顿组织。我被捕前曾调到唐山去当地委书记，不到一月又调回北京，住在俄国大楼饭店，团地下市委书记蒋秀昆住在比邻的长安饭店。一天，北方区委的秘书施名溢失踪了。他失踪的第二天，党通知我代行北方区委书记职务。我将各地来信，一一回了。来信大都是说组织被破坏，急需要钱做路费。看信后，了解到整个北方区被敌破坏的情况，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第三天我从法大回来，看见饭店门口有一个穿灰布衣的特务往后一隐缩。我感到有些不妙，当即上楼整理文件，不必要的毁了，需要的捆成一小包，待晚上交给北京地委书记蒋秀昆同志；秘密通讯用的药水也毁了；各种痕迹全部消灭了，然后制造一些疑点，迷惑敌人。我本名冉廷栋，被段祺瑞通缉后改名冉猷，转入地下工作。这时我把冉廷栋的信件包成一包，上写“廷栋大哥的信件”，放在箱子里；另外写了封假信贴上邮票，告诉廷栋大哥，说家里快汇钱来了，不要在南方革命，我们一道出国到法国

去读书。信写好后，我又重复检查一遍看看有无漏洞。我决定，万一被捕，就说冉廷栋是我大哥，他的事我全然不知，自己则冒充一个尚不识时务的青年学生，我当时只有十八岁，可以混得过去。供词编好之后，又查看了一下近来的假日记。我从前是天天写日记的，本文所写的，当时都有日记，而且年、月天数不缺。我的真日记和当时一些党内文件等，在时局紧张时寄放在北京东城十二条胡同门楼胡同十二号谭国良同志处。由于我被捕，谭将我的几本日记和文件等藏在屋顶或墙上某处，要是该房尚存可能还寻觅出来。自从得知李勃海叛变后，我每天所写的都是逛八大胡同，和妓女歌女相往来等等，纯粹是一个浪漫的公子哥儿的生活记录。再看一次，是很有用处的。正在写假日记的时候，蒋秀昆同志来了，我告诉他，施名溢已经失踪了四天，这里也被便衣警察监视，住不下去了，得马上转移。我将文件包交他，等新住地决定后再联系。蒋立即走了。

我回到房内，就考虑到哪里去住。偌大一个北京城，几乎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我党的组织已经分散得不能再小了，只能一个人或一对假夫妇或一对真夫妇带着孩子住，全靠交通联系。我想来想去，依然找不到安全的住所，同志们住的地方不能去，因名册已经被敌人拿去，到同志家里不特会牵连同志，而且会给组织带来危险。最好能到灰色的人家去住，把那里作为联络点，可能安全些。想来想去，总是睡不着。

到十一时，门上的电铃声怪响了一下，显然是不会按电铃的人急于开门。我急忙起来走到房外走廊上。饭店老板多卜克维特的女儿玛丽亚去开门，光头的便衣特务和军警蜂拥而入，玛丽亚吓得“妈”地叫了一声退奔回来。

我几番设法未能走脱，终于被捕，约午夜两点钟到第三侦缉队，立刻审讯，用五种刑法逼供，刑讯约三小时，又这样那样地拷问了一些时间，直至次晨七时才罢手。问来问去，我还是说冉廷栋大哥的事与我无干。及到拘留室，见到二十多个一起工作的同志，蒋秀昆、施名溢也在那里，才知蒋秀昆还先我被捉，施名溢倒是带着军警来捉我的（这是后来知道的）。为了不暴露身份，不牵连人，我不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大骂特务无故将我关起来，真是岂有此理！

后来用手铐把我们铐起来，送到警察厅，在这里由于饭食不好，我们开展绝食运动，敌人只好把普通的囚犯吃的玉米面窝头改为大米饭和有两薄片肉的汤菜。后来我们又因为“放风”、“放茅”作过一次绝食斗争，取得胜利。不久，我又过了一次堂，是军法处长审讯的，我的罪名是法大青年俱乐部长。

经过八十一天牢狱生活，教育总长刘哲把我、周远鹤（他是反对女子大学占我们法大参议院校址被捉去的）、蒋秀昆、施名溢等四人保出，交给法政学长林修竹领回（当时国立八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但学校早已把我的学籍开除了，我在北京不能再以学生身份隐蔽，只能以失学青年的身份继续干革命工作，因此，住所和隐蔽都成问题，我住在一个同乡同志开的公寓里，设法同组织联系。

这期间，听说刚从苏联回来的东北人马同志和赵莲芳、韩桂琴（韩幽桐）三人被捕。

这次“党案”，仅北京市就逮捕了我们二百多个同志，牺牲了二十多人。北京市委书记刘豫、组织部长杨鹤云、农民部长陈章林等，都牺牲了。其余的领导同志大都关在北新桥陆军监狱

里，给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未被捕的同志很多都离开了北京。有的回家乡干革命，有的转移了地方。张锡珍（张晓梅）、孙希荣（孙铁夫）、周远鹤（周骄子）到上海。张友渔、徐伯图到日本。张一凡转到宜昌工作后牺牲了。徐崇林、甘在仁、代仕琨等回四川。能够见到的，都大多是被捕后释放出来的人，大家都在找组织，彼此相约，谁联系上谁就通知大家，但依然未联系上。

于是我就和王君素商议，到监狱去向领导同志请示。就传闻所知，团地下市委书记唐从周，团北方区委书记李炎瑞（李紫翔）和秦文魁、唐在刚、雷定坤、周成才等关在陆军监狱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次“党案”的最后一个牺牲者，他是公开“行刑”的。过去牺牲的同志，都是敌人深夜“处决”的，而他却被从北新桥监狱里提出来（“从北新桥监狱提出”是推测的），经过东四牌楼、东单牌楼，出崇文门到天桥才被枪杀。他坐在一辆四轮木板双马车上，敌人大约有一个排的军警分开警卫者，加上观看的人很多，就象过去皇丧出殡时那样壮观。我那时找不到组织，无所依归，就天天到北海图书馆去看书。这天吃了早饭一出门，就碰上这位遭难的同志。当时他的姓名和“罪状”我记下来了。但年月太久，抄录遗失，只记得他姓王，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党派他来北方做军事工作。他在街头讲演的形象我至今还记得。他昂然站在囚车上，向四周的群众讲演，讲毕一段，又高呼：“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敌人备有酒饭，他被绑着。军警给他喂饭，他一摆头，将碗撞破。给他酒，他喝几口又接着讲演。马车前进得很缓慢，军警任他讲演，也未制止。可能他这临死前公开说话的权利是经过一番斗争才得来的。他讲一阵，又喊拿酒，敌人便

给他送到口边。看着自己的同志将被敌人杀害，而自己手无寸铁，无以为力，我心里难过万分，不住地掉下泪来！我一直送他到崇文门，才默默而别，不忍见他最后被敌人一击。我当时想：南方的同志已经创立了工农红军，北方要是也有一支工农红军，那该多好啊！我们自己手里有了枪，就能以牙还牙，和敌人厮杀了。我和王君素一道去北新桥陆军监狱看唐从周同志，原想多给同志们弄点钱去，但我们生活也很困难，我和王君素两人凑了十五元钱交给唐从周，要从周同志转给被关着的同志们。同时向他汇报了我们的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以及近来马同志和赵莲芳、韩桂琴被捕的事，又报告他最近有一个做军事工作的同志牺牲。他要我们设法调查一下还有人被捕没有，同时要我们买鸦片烟和衣料去贿赂看守所长，好给我们的同志一些方便。恰好我家里汇来了款，就托余开弟同志买了八两鸦片烟、两件衣料，同时还给同志们买了一些肥皂、手巾、衬裤之类。我们带着一大包东西第二次去探监，看守所长一见送给他的东西，就准许唐从周同志出来到他的会客室来见我们，又当面下令把同志们的脚镣手铐取下，表示没白受我们的礼。唐从周同志给我们的任务是设法保护被监禁的同志，还要我们再设法买通看守所长，能组织一次越狱更好。我和王君素接受了这一任务。

大约是一九二八年三月份，在我到北海图书馆的途中又被捕了。这次被捉去，仍然是关在第三侦缉队。只有施名溢先我被捉，关在里面，其他囚室都是空空的。他们说我常去北新桥陆军监狱，还在干共党工作。我坚决否认，说我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哪会给共产党工作？我天天到北海图书馆看书，不信到图书馆去调查。我在里面关了一个多月，只见鲁迅领导的“未名社”青年台静农

张友松等四人被捕，未见我们的同志被捕。在释放我时，侦缉队长叫我去说：“你对我们态度不好，施名溢对我们还有点用处。”我想这可能是敌人的反间计，根本就不相信。直到一次在路上碰着施名溢，我问他敌人的话是什么意思，他才说他由于生活没有办法，每月接受侦缉队十元钱。我当时气得脑胀头痛，真不敢相信合作了几年的战友是一个可鄙的叛徒！我狠狠地骂了他，没有饭钱，哪里不可以挣钱！拉黄包车也可以，怎么去出卖灵魂？！他只埋着头，说以后不干就是了。这事对我是一次很大的震动，我这时才觉出自己处在多么危险的环境中。我把这事告诉余开弟、谭同良、秦君平等同志，他们都同意我立刻离开北京，因为继续住下去，可能遭到更大的危险。于是秦君平送我一件作化学试验穿的破长袍，我化装成卖糖葫芦的。同志们买好车票送我到车站月台上，我乘着车开动的时候接过被卷就跳上车去了。搭车到塘沽的意国码头后，我又乘船去上海找党中央。党中央派我同李华海、彭兴道一路回四川，此后，我就搞三路红军的工作。

在北京北新桥陆军监狱里关着的同志们，被关了数月，到山西军阀阎锡山打到北京时全部被释放了。唐在刚同志到江西苏区和方志敏同志一道工作，后当红军师长。唐从周到陕北榆林中学教书，周成才到武汉，李炎瑞等回南方，雷定坤回四川，秦文魁等在北京复学。大部分同志都继续革命，但也有的人走上堕落叛变的道路。

回忆李汉俊老师

夏之栩

我第一次见到李汉俊老师是在一九二二年，那时我正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我是一九一八年考入湖北女师的。这个学校非常封建，校长王式玉是个旧派人物。当时湖北的一些老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派是两湖派，一派是经心派。王式玉大概属于经心派，他虽对办校十分认真负责，可是非常守旧，总想用封建的办法把我们培养成贤妻良母。学校一直把我们女学生管得紧紧的，不让我们到社会上去。当时自己的想法也很简单，只盼成绩好一点，能留在附小教书养活母亲就满足了。



一九三七年夏之栩同志摄于从国民党监狱出狱之后。

一九二一年，刘子通、陈潭秋先后来女师当教员，刘子通教国文，陈潭秋教英文。这两个老师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女学生的思想才冲破了禁锢，开始起了变化。刘子通在上国

文课时，经常讲苏联的十月革命和苏联妇女是怎样得到解放的，以及她们的现状。那时还没有跟我们直接谈到马克思主义。他讲的这些东西使我们感到非常新鲜。我们听到苏联的妇女解放了，婚姻自主了，就有一部分同学回家去要求解除婚约，反对家庭包办婚姻。这么一闹，许多学生的家长火了，要求王式玉惩办学生。王式玉认为出现这样的事，是刘子通宣传“赤化”的结果，于是打算把他解聘。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抓住这个机会发起罢课，坚持要挽留刘老师，不许校方解聘。同时，我们觉得总关在学校里不行，应该跟社会上有所接触，就在一九二二年春开始闹学潮。

那时，我们没经验，罢课没有组织好。开始是全班罢课，后来在一些老师和家长的压力下，一些同学复课了，只有十二个人坚持罢课。过了半年，只剩下五个人了。社会上的旧势力很大，一定要学校把我们这五个带头罢课的学生开除。这样，在暑假中，徐全直、杨子烈、陈比南、庄有义和我五人就被王式玉开除了。但在下半学期开学时，我们在同学的帮助下，又进了学校，不承认被开除，结果使我们这一班不能开课。

当时在武汉有很多学校闹学潮，外国语学校等校也都举行了罢课。因闹学潮，我们和武汉学生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学生联合会就号召其他学校来援助我们。李汉俊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我们学校的学潮，可他经常和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一起商量应该怎样领导学生运动。女师的学潮后来有些不好下台了，因为僵持下去，就会搞得我们既不能读书又不能毕业，斗争就有可能完全失败。他们认为解决这次女师学潮的办法就是调停。于是请了李汉俊、李廉方、陈时等五人来调停。调停的结果是王式玉去职，我们也

离校，但文凭照发，算我们毕业。

在罢课期间，我和一些同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可是当时我们连什么叫社会主义都不太懂。陈潭秋、刘子通等老师就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学点东西，老是瞎嚷嚷不行。于是就成立了一个以女师学生为主的约有二十来个学生参加的“妇女读书会”，请李汉俊老师给我们讲课，黄负生、陈潭秋也来讲过课。读书会的学习地点很不固定，有时在李汉俊家，有时在刘昌群家。我们阅读的书籍除了从利群书社借来的之外，有不少是李汉俊等人捐给我们的。李汉俊讲课的内容主要是社会科学的一般常识。李汉俊在武昌高师就是讲社会学的，他讲的社会学包括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象《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样的著作我们看不懂，就请李汉俊给我们讲解。听了他的讲课，使我们处于启蒙阶段的思想，逐步向社会主义前进了。李汉俊特别关心妇女解放问题，他告诉我们：反对校长王式玉的斗争，仅仅是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一部分。女学生光在学校里斗争不行，要争取学联的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支持，还应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没有社会革命，妇女就不能彻底解放。李汉俊和其他老师的教导使我们眼界更开阔了，为走上革命的道路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一九二二年夏，我们五人被开除后，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给我们找了房子，请了教员，安排我们补习功课。董必武教国文，李汉俊讲社会学，陈潭秋还是教英文，另外一些人教物理、化学等课。李汉俊早在上海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到湖北在大学里任教，利用各种机会给学生们讲马克思主义。他和董老等人都是第一批在湖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我们的老师、前辈。我认为

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比较高的。

那时，我有点小孩脾气。大约一九二三年初，李汉俊结婚，找了个家庭妇女。我们几个女同学跑去反对，说：“你结婚总应找个有点水平能跟你一块儿工作的人呀！”李汉俊讲：“这种时候就是得要这样一个人，她什么也不懂，什么都不问，不是可以省些麻烦么？”他又问：“现在哪里可以找到能帮助我工作的呢？”我们说：“我们没本事帮你找。”当时象他那一辈的女同志不多，我们也只好承认他做得对。

那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开展起来了，人力车夫及纱厂、烟厂的罢工此起彼伏，京汉铁路的工人也组织起来了，他们成立了工会。李汉俊在武汉参加了组织工会的工作，虽然他是个大学教授，不能象陈潭秋等同志那样化了装就跑下去，但是他对这工作很热心。我记得他说他一定要到郑州去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久他真的去了。他回来后就给我们讲工人的情绪如何高涨，他们如何英勇地冲破军警的包围，宣布成立总工会。不久，由于吴佩孚军队的镇压，总工会移到江岸来了。以后他就不便去江岸了，因为社会上都知道他是大学教授，一去就会暴露身份。

二·七罢工以后，经过残酷的大屠杀，许多同志如施洋等都牺牲了。党团员也被人注意，工作难以开展，便逐渐转入地下。这时，李汉俊由于被敌人注意，去北京躲避。不久，我们几个人也到北京去考学校。学校没考取，我们就通过正在北京治病的刘子通找到李汉俊。我把想回湖北的打算同他讲了，他说：“那就跟我一块回去吧！”就这样，我们跟李汉俊一同回到了武汉。

回到武汉以后，我们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都是学师范的，只能教书，可别人又不敢要我们教书。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

都是靠一些同志的工资作经费，不能养活我们。李汉俊看到我处境困难，就对我说：“你到我那儿去吧，帮助我抄写讲义，就住在我家。”他知道我的家已变成了党接头的地方，而且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人，没有生活费，很困难，于是他就每月给我二十块钱，要我拿回家去交给我母亲，维持党的机关。陈潭秋、黄负生、包惠僧、刘子通（后来包、刘离开了武汉）等人常来我家，他们也给过资助，以维持这个机关。李汉俊有时也到我家里来，我母亲同他关系很好。李汉俊对其他同志也很热情。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我一直在李汉俊家里帮助他抄讲义。我一面抄，一面自己也顺便学点东西。记得讲义上有讲历史上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的，提到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的各种社会主义，然后就分析哪一种是科学的。可惜那时我对这些都不大了解，记得的不多。

这个时期，给李汉俊的来信都是先寄到我家，由我转交给他的。李汉俊和上海党中央的通信也由我家转，我经常看到有许多从上海给他的信。李汉俊的回信很厚，他曾对我说：“我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意见不一致，通过通信来辩论。”至于究竟是争论什么问题，跟谁争，我没有去问，李汉俊也没有说过。我只是知道他与中央一些同志大概有些不同的意见。

大约过了一九二四年的阴历年，我就离开李汉俊家了。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开始改组，准备在汉口成立市党部，党派我到市党部工作。我开始时很不愿意去，经领导动员才去了。武汉市的国民党组织刚建立不久就遭到了一次大破坏，许白昊等都暴露了。市党部垮台后，我没事可干，在武汉不能继续活动了。李汉俊也受到这次组织破坏的牵连，被学校解聘并遭到通缉，在武

汉呆不住了。这时李汉俊问我：“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说：“这样吧，我还是去北京，那里的事情多，你愿不愿意跟我走？”我说：“我同你一道去北京工作吧。”于是在武昌区执委的同意下，我同李汉俊一起到北京去了。

一九二四年春，我们到了北京。李汉俊把我交给了北京区执委，我们就分开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李汉俊是什么时候脱党的，是为什么脱党的，我始终不清楚。我没有听说过他发表过脱党声明。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李汉俊由于意见不一致，不再担任党的工作了。但他还是一直搞革命工作，按他自己的主张在党外活动。有人讲他与北洋军阀有关系，可能是指他与他哥哥李书城的关系，别的关系我不知道。

以后，我听说李汉俊又回到武汉，并参加了北伐，最后听说他被军阀杀害了。他被害后，大家觉得十分可惜。我一直是很怀念他的。抗战时我见到李声簧，曾问起他父亲的事，由于李汉俊牺牲时他还很小，有许多事他也说不清楚。

有人说，李汉俊“右倾”，我想他那个“右倾”大概是对着张国焘的“左倾”来的。张国焘忽“左”忽右，一会儿“左”得不得了，一会儿又右得不得了。张国焘“左”，他反对，张国焘就说他右倾。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如在工人运动方面，他有一些主张同张国焘不一样。但李汉俊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是很热心的。以后他不在了，许多事情更搞不清楚，“右倾”这个印象就留下来了。到底他真是右倾呢？还是有人“左”倾，这个结论有待党史工作者去做。

建党的初期，我们这些后辈在思想上也没有个系统的东西，大家只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要革命，要推翻现状，中国要象苏

联那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很难分辨谁的思想是属于什么倾向的。不过，我认为象李汉俊、陈独秀这些人是应该区别于周佛海那些人的，应当算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一九八〇年 丹一整理）

湖北省委讨论过

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

袁 溥 之

我认识李汉俊老师是在一九二二年春夏之间。那时我和十几位武昌女子师范的同学到他家参加“妇女读书会”。女师的老师董必武、刘子通、陈潭秋向我们介绍说，汉俊老师是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很有研究。以前我曾读到过《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现在知道他就是此书的译者，自然是十分敬佩的。



李汉俊遗像

汉俊老师温文尔雅，博学多识，不苟言笑，亦不爱高谈阔论。他十分关心青年的思想进步，热情解答各种问题，说理通俗明达，很受学生欢迎。他把自家的客厅供我们读书会学习讨论之用，四壁书橱装着我们凑钱买的书和他赠送的书。赠书有关于社会学的、由日文翻译过来的书，还有

小说、戏剧等文艺书籍。汉俊老师曾给我们讲过《工钱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原著，他不是照本宣科地讲，而是用他自己的话把马克思的理论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都对劳动人民累死不得温饱，而老板不干活却享尽荣华的社会现象极为气愤不平，但不明究竟。听汉俊老师讲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才知道工人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剥削去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我们又在胭脂山启黄中学办了暑期妇女补习学校。刘子通教国文，陈潭秋教英文，还请邓中夏教职工运动。汉俊老师讲的是《共产党宣言》，也不是照书本讲的，他讲的革命真理给人印象很深。

一九二三年，我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湖北女师开除，转学去了安庆。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汉俊老师。

大革命时期，我在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当时叫湖北区委）的妇委书记。一九二六年十月或十一月，北伐军刚打下武汉不久，湖北省委曾开会讨论过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听潭秋说，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意见不合而脱离了党，他提出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组织部长陈潭秋，军委书记吴德峰、蔡以忱，工委书记许白昊，青委书记李求实，宣传部长宛希严和我。中央新派来的省委书记张国焘主持会议。可惜现在除我以外，其他人都不在了。省委根据李汉俊同志的表现，一致同意恢复他的党籍。那次还有周佛海申请恢复党籍，省委就没有通过，说他还须考验。讨论李汉俊的党籍时，我特别注意张国焘的态度，潭秋和我们大家都一致同意恢复汉俊同志的党籍，张国焘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省委的决议须报中央批准。我于十二月赴苏联学习，不知道以后中央是否批准了省委决议。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在武汉背叛了革命。不久，我在莫斯科听说汉俊同志被残害，感到十分痛惜。

汉俊同志对青年所作的启蒙教育，在革命事业中先驱者的作用，及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应当载入党史史册。他正直谦虚的美德值得后人学习，我们这些直接受过他教诲的人更是深深地怀念他。

（丹一根据袁溥之同志一九八一年七月至一九八三年六月的四封信整理）

怀念拔哥

黄美伦

韦拔群同志是我爱人的哥哥，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与世长辞已经整整五十一年了，然而，他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想起往日他对我的亲切教诲和关怀，更激起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敬爱。

（一）

韦拔群同志开始在广西东兰县从事革命活动时，就与我三哥黄书祥很要好，经常来到我家找书祥哥商量革命事宜。他一来不是整天，就是半日。他们蹲在火炉边，好象有谈不完的话。那阵子，我的思想还很封建，不敢与客人说话和一起吃饭，他们密谈什么事，我也不敢去打听。有时，三哥让我坐在门口帮看风，我便一边打鞋底，一边注意来往路人，若有生人，我拿起小棍子假装赶鸡，连喊三声。

拔群同志身材魁梧，姿态英俊，两道浓浓的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喜欢打赤脚或穿勾勾头草鞋，对人热情、和蔼。他到我家次数多了，我便跟村里群众对他的称呼一样，叫他“拔哥”，

他亲昵地叫我的小名“的伦”（我到农讲所学习时，他给我改名为“美伦”）。他对我的思想进步很关心，循循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记得一九二二年旧历正月的一天早上，我正在河边地里淋菜，拔哥走过来问道：“的伦，我经常来到你家，不见你同我一起吃饭，是不是害怕我？”我害羞地小声回答：“我不懂。”他听后笑着说：“我是问你怕不怕我？”原来，我想用含糊的话应付过去，但看他这么认真问，我只好如实说出自己的害怕心理。他听后和蔼地说：“我也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怕。我到你家来，是同你三哥商量穷人出头的大事，你听后也会高兴的！”接着，他便低声给我讲述穷人团结闹革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边谈边问我家里有多少人，多少地，一年收入粮食够吃几个月，为什么穷人终年累死累活连玉米粥也吃不饱，为什么劳动妇女受苦最深重等等。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是我过去连想也没有想过的，经过他的耐心启发，我才明白穷人之所以穷、妇女之所以受苦特别深重，并不是命运注定，而是地主老财、吃人豺狼压迫剥削的结果。

拔哥见我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很是高兴，立即要求我去向村里的妇女进行宣传。我听后觉得好为难，回答他说：“我今年虽然已二十一岁了，但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怎么能去宣传？”他鼓励我说：“能！你把我们今天谈的道理向她们讲就行了。”他还耐心地教我该怎么做法，要我在宣传前先调查村里妇女受苦情况，然后用这些事例去教育她们。这样，我便按照拔哥的吩咐，在白天看牛时，主动接近在地里劳动或放牛的妇女，问他们有什么苦，为什么挨打挨骂。女伴们一谈起自己的苦难生活，不是叹命苦，就是恨公婆，或怪自己投错胎，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

来世上。这与我原来的认识差不多，我便把自己从拔哥那里学来的道理讲给她们听，她们听后也很高兴，盼望有一天能真的熬出头来。

我把调查、宣传的情况向拔哥汇报，他认真地听着，记着，说我的胆子大起来了，并要我进一步用山歌到村内外或圩上进行宣传、发动。山歌词由拔哥亲自编，主要是宣传妇女平权、自由和解放。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我们邻近几个村子的妇女逐渐组织起来，能有力地配合拔哥领导的打土豪劣绅的革命斗争了。一九二三年拔哥带领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时，我们妇女就在后方积极筹粮、做饭，有的帮贴标语和散发传单。在实际工作中，我也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

一九二五年，拔哥按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在东兰县武篆区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没有招收妇女学员。

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拔哥高兴地告诉我：“现在开始筹办第二期农讲所，这一期有你们妇女的份了！”我听到这一好消息，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为了发动妇女参加学习，拔哥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和妹妹报名参加学习，我和潘小梅、黄金球等同志也协助拔哥到各地串联、发动。

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筹备，这一期农讲所终于在同年十月于武篆育才小学开学了，拔哥仍担任农讲所主任。学员来自右江地区各县，共二百多人，其中男学员一百八十多人，女学员五十三人，分男、女两班。我们女学员学习的内容与男学员相同外，还增加识字课和有关妇女解放的课程。拔哥亲自给我们讲课，他讲

得通俗、生动、没有一个人打瞌睡。我听起来样样都感到新鲜，尤其是拔哥讲的妇女参加革命的十大好处，我今天仍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学习上碰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文化，不会写字。拔哥对我的学习很关心，耐心地把着我的手，一笔一笔教我写，那一划先写，那一划后写，他讲得很仔细。我的名字就是拔哥教会写的。

农讲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边学习，一边下乡宣传和组织农会、农军。每次下乡或到圩上宣传之前，拔哥和其他教员都事先拟定好题目和内容，教我们懂了以后，便让我们每人挑选一条，根据拔哥和教员讲的内容，编成山歌，编好后再拿给拔哥和教员修改，然后才向群众宣传。当时，我们编的山歌很多，其中有这样两首：

大家自觉来革命，
争取平等和自由，
为着妇女得解放，
自觉革命要带头。

受苦受难不是命，
起来斗争见光明，
劳苦大众团结紧，
跟着拔哥闹革命。

为了适应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和宣传的需要，拔哥还在农讲所组织女学员练拳术。他特地从隆山（现马山县）请来了拳师黄鹤龄，每晚教我们练拳（男学员也练）。开始，有些女学员认为舞枪弄棒不是妇家之事，怕被别人耻笑，或怕被丈夫指责。拔哥

知道后便教育、鼓励大家破除封建思想，下决心学好拳术。他还经常抽空亲临指导，直到深夜才离去。我初学拳术，也感到手脚不听使唤，笨手笨脚，常引起男同志捧腹大笑。但我不灰心，我想起拔哥的话：练拳是为了健身、学本领，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因此，我下决心刻苦练习，常常练到鸡啼二遍才休息。在拔哥的鼓励和拳师的指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的练习，我终于初步掌握了一些拳术的套路和刀法，现在还能背诵如下套路：“双手平胸，放下内八字，收回牛角，左脚拔柱……”这对我后来从事艰苦革命工作有很大帮助。

我在这一届农讲所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妇联会做妇女工作。拔哥对妇女工作很重视，经常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使全县妇女运动蓬勃开展。

（三）

一九二七年十月，广西军阀派龚寿仪、朱为珍匪部进驻东兰镇压农民革命运动。我和拔哥的家都被敌人烧毁，拔哥率领农民自卫军退入地势险要、峰峦重叠的西山，坚持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我也转入地下，到西山等地隐蔽。拔哥对我很关心，曾托人送六块光洋给我作生活费，我知道拔哥也很困难，就没有收下。他又要我去跟他母亲住在一起。当时我已与拔哥的弟弟韦菁（后牺牲）订了婚，还没有过门。正好韦菁到香港找上级党委汇报工作未回，我就不肯去住，拔哥还批评我是老封建哩。

一九二九年农历五月，拔哥在西山弄京举办武装骨干训练班，召集留在东兰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参加学习。我也被他派人找回参加学习，主要是协助搞后勤工作。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开始

好转，拔哥在训练班中，主要是讲整顿农军组织，恢复、发展农民武装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同年八月，拔哥从南宁参加省农代会和领取枪支回来。我正患病在西山，他与韦菁到西山看望我，并告诉我这样一个好消息：在南宁通过党组织的活动，从省政府那里领到三百多枝真家伙（枪支），现在正着手准备攻打东兰县城。我听后无比高兴，觉得自己的病也好了很多。

过了几天，我的病刚好，拔哥要我同他到武篆魁星楼附近了解土豪劣绅地里的稻子是否已成熟，以便筹备攻打县城的粮食。我一口答应，立即动身。我们到了武篆，正与我大哥、陈伯民同志的父亲等四人在地里看稻子时，一百多民团偷偷把我们包围了。情况很危急，拔哥拿着短枪，带领我们往外冲，我因病刚好，跑不动，脚也被敌人打伤。幸得牙苏民同志及时从巴学带领农民武装赶来救援，打退了敌人。

经过短时间准备，同年十月下旬，拔哥以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名义，向全县农军发布“解放东兰”的命令，设军事行营于巴拉。在拔哥指挥下，用真家伙装备起来的农军，向守城敌人猛攻侧击，胜利攻克了县城，为百色起义扫除了一个障碍。

邓小平、张云逸和韦拔群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后，拔哥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其司令部就设在我家附近的育才小学。拔哥经常到我家黄书祥哥的小房子里看书。因当时我哥到果德县（今平果县）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去了，空着的房子比较安静，故他喜欢在这房子学习、写东西。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间，邓小平同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从上海回到右江时，拔哥就在我家里会见了邓小平同志。从此，拔哥就与邓小平同志一起领

导东兰县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曾佩戴红领带出席东里屯共耕社成立大会，我与爱人韦菁陪同他们一起前往。

当时，红七军在武篆善学乡设立了一个后方野战医院，有伤病员二百多人。拔哥不仅经常到医院看望、慰问他们，还叫我从武篆区妇女赤卫队中挑选二十一名队员组成妇女义务护理组，到医院给伤病员端水送饭、洗补衣服、换洗被子、倒便桶、找草药等。有时，我们为了搞清洁卫生或找草药，顾不得吃饭和休息，使伤病员深受感动。拔哥对我们妇女护理组的工作也表示满意和赞扬。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拔哥和陈洪涛等同志被留在右江坚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因桂系军阀进行大规模的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斗争环境非常艰苦。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一天，拔哥派我从西山秘密到弄凤乡领取一笔党的活动经费，回来路上，遇到十几个匪军，当敌人追到身边时，我咬牙闭眼，纵身跳下悬崖，幸亏山崖下的荆棘和杂草丛生，我没有摔死，也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和推下的石头击中，只掉了五颗门齿，摔折了手腕骨，摸摸绑在身上两腋下的二百块东毫还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忘记疼痛和饥饿，终于在第二天早上摸回到拔哥的驻地。拔哥见我用雨帽带挂住受伤的手，用泥巴敷着发肿的嘴巴，很是难过。我把带回来的经费完整地交给他，他说：“只要你能安全回来就行了！”说完，立即叫他妹妹带我到一个瑶族家里治疗。

情况越来越严重。敌军长廖磊亲自坐镇东兰指挥、策划，采取了“缩网收鱼”的狠毒策略，步步缩小对拔哥所在的西山根据地的包围圈。旧历九月十八日中午，我给躲在西山山洞里的拔哥

妈妈送饭去，走到弄吹屯，看见拔哥手里拿着棍子迎面走来，他脸比过去消瘦，但眼睛仍炯炯有神，显得沉着、刚毅。他小声告诉我：“过几天，我与陈老师（指陈洪涛同志）要到外面找上级党委请示汇报工作，你留在西山，处境很险恶，要想办法坚持下去，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我回答说：“你放心去，路上要小心！”他笑着说：“不怕！”说完，他便往弄东屯方向走去。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两天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旧历九月二十日），拔哥牺牲了，他才三十八岁。当我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时，犹如晴天霹雳，心里悲恸欲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拔哥会真的离开我们。根据地的各族人民，闻噩耗后，也无不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沉浸在无比悲痛和怀念之中，就是西山的石头，听了也要心酸！

五十年过去了，拔哥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今天，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正在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拔哥九泉有知，定会感到欣慰！

（陈欣德整理）

韦拔群同志被害经过

陈 欣 德

壮族人民的儿子韦拔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他于一八九四年二月六日（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正月初一）诞生在广西东兰县。历任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东兰县农民协会军事部长、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副主任、广西农民协会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中共右江特委委员、红七军二十一师（后改为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等职。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不幸被叛徒杀害。其牺牲经过情形如下：

一九三〇年十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韦拔群被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他深知红七军主力离开广西后，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将会更加艰巨，但为了充实主力部队，他以大局为重，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原率领的第三纵队一千多名战士（除留下七、八十名体弱有病者外），全部拨给主力部队。而自己则与陈洪涛（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等同志，重新在右江地区扩建部

队，决心率领根据地军民以战斗保卫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初，桂系军阀为了扑灭右江革命烈火，乘虚派遣第十九师师长廖磊（后为第七军军长）指挥近一万匪兵，纠合贵州黄海平匪部，分三路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围剿”。韦拔群和陈洪涛等同志，率领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二十一师，后改为右江独立师），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避开敌人的锋芒，退入地势险要的山，据险伏击敌人，一直坚持至一九三二年。这时，由于蒋桂军阀矛盾暂处缓和，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其心腹之患，对东兰、凤山两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更加残酷的反革命大“围剿”。白崇禧亲赴东兰指挥，采取了层层进逼的所谓“剥笋战”的战术，实行杀光、烧光、抢光、铲光的“血洗政策”，叫嚣什么“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妄图彻底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七日，广西省反动政府还发布悬赏缉拿韦拔群、陈洪涛的布告：“悬赏一万元购缉韦拔群；悬赏五千元购缉陈洪涛。”（见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广西公报》第三十二期）。后来，悬赏购缉韦拔群的重金增加到一万四千元。这是敌人施展金钱魔力收买叛徒的阴险、卑劣手段。

敌我力量悬殊，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越来越艰苦。敌人断定韦拔群没有离开西山，便采取“缩网收鱼”策略，增派大量匪军分七路向西山大小弄京围攻，“几乎靡穴不穿，无孔不索”。为了隔断群众对韦拔群和红军的支援，敌人把西山周围的群众赶到一个峒场里集中管制，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想饿死、冻死、困死韦拔群和红军战士。

由于处境日益险恶，韦拔群认为固守一隅，终非长策，便于

同年十月中旬，从西山弄朗突围，路经弄催、弄京、长垌、弄莱、弄狠、巴好等地。十月十七日下午四、五时左右，韦拔群带着一位年轻的警卫员罗日块，秘密来到武篆区东里屯对面山上双茶洞韦昂的临时住处，拟与附近的陈洪涛同志取得联系，以便研究转移工作。

韦昂，原名韦日恩，是韦拔群的族侄。他参加革命队伍后，担任过红军地雷队队长、韦拔群同志的警卫员。此人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不大好，为了对他进行教育、帮助，曾让他回家参加生产劳动一段时间。他回队后，表现还不错，曾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智取敌人“花红”的行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①。后红军队伍实行缩编，他便回到东里屯，与其母亲、妻子、妹妹躲避在双茶洞里。当时，韦昂有两个老婆，小老婆陈的姆（后改名为陈满妹）家里较富有。武篆区伪民团局长梁仕能先做陈的姆父母的策反工作，再通过陈的姆的父母做陈的姆的工作。最后，通过陈的姆做韦昂的工作。韦昂经不起艰苦革命斗争环境的考验，在敌人的引诱下，暗中叛变投敌。他见韦拔群来到双茶洞，假装殷勤、热情，一口一声“拔叔”。韦拔群未觉有异。

当天晚上，韦拔群与罗日块同睡在韦昂让出来靠近洞口的床上，两人共盖一条毛毡。第二天，便在洞里与陈洪涛等同志会见，分析当时斗争的严重形势，决定暂时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陈洪涛来后不久，韦昂提出要到东里找一点米、盐来吃。韦拔群不大

注①：一九三二年五月，韦拔群和陈洪涛同志得到敌人要悬赏花红购缉他们二人的消息时，便将计就计，派警卫队战士韦华、韦昂二人去见武篆民团局长，诈称卫士队谋反，捉住了韦拔群。民团局长派陈守先（叛徒）等人去察看，回报是真，便约定交钱交人地点。韦拔群事先做好准备，当敌人挑钱来到时，伏兵四起，不仅夺了两千元，而且处决了叛徒和民团局长的两个弟弟。

同意地说：“有什么吃什么，不必去了！”韦昂叫罗日块一起去。他们两人出去至下午四时才回来，带回了三十斤大米、十斤盐和一些未成熟的黄豆。这时，陈洪涛等同志已不在洞里。当晚，韦拔群和罗日块与韦昂全家吃一餐便饭。晚饭后，韦拔群身感劳累不适，便先与罗日块睡在韦昂的木板床上，韦拔群把驳壳枪放在枕头底下，韦昂故作探听外面动静，时出时入，闻村鸡已啼唱多遍，见洞外微泛白光，韦昂便乘韦拔群昏睡之机，以左手垫韦拔群脖子，右手抽出韦拔群枕头下的驳壳枪，对准韦拔群头部左侧连击两枪，杀害了韦拔群同志，时为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左右。罗日块被枪声惊醒后，见韦拔群同志已被韦昂杀害，仓皇往洞外跑，刚跑到洞口石阶，即被韦昂抓住。韦昂便以枪迫着罗日块，背负装有韦拔群烈士头颅的背箩，投武篆区中和乡匪军团部。他们到达中和时，天已大明，约上午七时左右。

丧心病狂的叛徒韦昂杀害了韦拔群以后，廖磊只给他二、三千元赏金。他领到这笔钱后，带着小老婆到柳州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不久，钱花光，便带其小老婆到南宁找桂系军阀头子白崇禧，指控廖磊饱吞其赏金。他回到柳州后，即被廖磊关押了四个月。后到河池金洞居住，从事抢劫害民勾当。我地下党同志获悉后，于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将韦昂诱骗至金洞背后之弄兴山处死。这个杀害韦拔群的叛徒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

几番蹉跎志愈坚

——回忆许权中烈士生平

李 果

许权中（1895—1943），我党早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军大学，参与组织了渭华起义和筹建抗日同盟军，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场上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才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被国民党暗杀，终年四十八岁。他的亲密战友刘志丹同志生前曾用“赤胆忠心，坚贞不渝”这样的话来评价他。解放后，毛泽东同志也在颁发给许权中同志家属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纪念证》上题词：“许权中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我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参加我党领导的国民联军政治保卫队后认识权中同志的。自渭华起义，直到民众抗日同盟军及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期间，我都在他身边工作，是他介绍我转党的。在他的关怀和指引下，我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不仅经受了炮火的考验，还经受了王明“左”倾路线折磨的考验。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我经常想起他的谆谆教诲，使我坚信党，坚信

共产主义，这些都是非临其境的人难以体会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把有关许权中同志生平的回忆整理出来，既是为了鼓励自己教育后人，同时也表达我对这位可敬的先烈深深地怀念。

许权中祖籍山东临淄县许家终村，后定居陕西临潼县交口镇辛理村。自幼家境贫寒，遇灾荒全家逃至陕西临潼县交口镇辛理村。悲惨的身世使他憎恶旧世道，当辛亥革命爆发时，便满怀壮志投身到当地同盟会员曹印候组织的敢死军中，杀了知县，光复了临潼县城。不久，敢死军失败，曹印候被杀，但许权中没有灰心。一九一八年一月，陕军营长张义安树旗反对陕西督军陈树藩，成立了靖国军。许权中又参加了这支军队。二月，孙中山命于右任回陕，大家推于为靖国军总司令。许权中在靖国军中，历任班长、中队长、总司令部副官、三等参谋和绘图科长等职。一九二〇年冬，于右任选派他到广东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炮科学习。一九二一年冬毕业回陕，在靖国军第三路军中任中尉排长。由于训练部队成绩卓著，他很快升任连长。

一九二二年，靖国军被吴佩孚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直奉战争爆发，原属直系的冯玉祥将军倒戈反直。是年冬，在北平成立了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胡景翼、孙岳任副总司令，三人分别兼任一、二、三军军长。国民军拥护国共合作，并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家大事。许权中英勇善战，很受胡景翼器重，在国民军二军第二师很快升任团长，在豫西一带活动。

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使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许权中得以秘密阅读党的纲领、报刊，认

定唯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他积极寻找党，决心参加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许权中特地到北京见到我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十分关心我党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在他的关怀和帮助下，许权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春，党组织派许权中所在旅旅长史可轩同志到莫斯科学习。史委托陈冠三代管部队为代旅长。临行前史秘密告诉许权中，陈冠三这个人靠不住，不论谁给金钱、地位，他马上就会倒过去。许权中当即表示：“有我在，就有部队在，决不辜负党的希望。”

果如史可轩所料，陈冠三暗中接受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改编，被任命为三十九旅旅长。

一九二六年五月 部队开到北平附近的涿州、良乡、上苇店和门头沟一带驻防。一天，李大钊同志要求许部策应即将举行的北伐革命战争。许权中表示坚决执行党的指示。这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张宗昌等密谋攻打多伦和南口，企图消灭国民军，情况十分紧急。为了保存部队，许权中先后派人到北京和张家口，向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军总部报告情况和起义计划。北方区委和国民军总部立即同意了许权中的起义计划，国民军代总司令兼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并派许骧云率部前来接应起义。不料，这些活动被陈冠三发觉，立即策划镇压起义。许权中等不得许骧云前来接应，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包围旅部，击毙了陈的几个亲信，迫陈只身逃跑。许权中率部在门头沟宣布起义。同时，许权中说服了其他两个团长贾玉斋、马子和（克哉）一起

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共二千余人。

门头沟起义使吴佩孚非常恐慌，立即下令通缉许权中，扣押了在北平的四百多名陕西人做人质，同时派田维勤率领一个师进攻许权中部。许权中沉着地率领部队边战边退，在妙峰山亲率一个营和敌人激战。经过三个昼夜的战斗，歼敌千余人，而许部仅伤亡三十余人。田维勤率部狼狈溃逃。

京津两地报纸迅速以特大字号刊登此事。评论称：“许权中妙峰山之战，使吴佩孚不能及时南下布置督战于汀泗桥，北伐军战事得以顺利进行”。这场战斗打乱了吴佩孚的阵脚，南北呼应，有力地支援了北伐革命军。

起义部队经过整编，许权中先后被任命为团长、旅长、代师长等职。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际，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被军阀刘镇华部围困在西安城内八个月之久，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万分危急。六月，李大钊请于右任先生去莫斯科敦促在苏联参观学习的冯玉祥将军回国参加北伐。冯回国后，李大钊同他达成了“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协议。

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史可轩等同志抵达绥远省五原县，与国民军将领会商成立国民联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于右任为副总司令。冯玉祥于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南下陕、甘、宁，讨伐刘镇华。

许权中被任命为援陕第三路军司令。他率部昼夜兼程，疾速南下，打败了围攻三原之敌，解了西安以北重镇——三原县城之围，配合了国民联军解西安之围的行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国民联军进入西安，许权中被任命为渭北清乡司令。

刘镇华被赶出陕西之后，我党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组织了临时军政府。一九二七年一月，成立了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共产党员魏野畴任政治部副主任，史可轩任政治部保卫部长兼国民联军驻陕独立一师（又称政治保卫队）师长，许权中任政治保卫部委员兼警卫师旅长（政治保卫队队长），我党还有许多领导同志和共产党员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驻陕总部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政权，宗旨是打倒军阀，驱逐列强，扫除封建势力，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陕西各界人民群众纷纷召开庆祝大会，热烈拥护和支持驻陕总部的成立，并组织了各种革命团体，积极配合军政府开展革命斗争。

进入一九二七年之后，北伐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党需要大量的军政干部从事革命武装斗争。中共陕西省党组织在创办了中山学院后，又着手创办中山军事学校。一九二七年二月，军事学校成立，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小平）任校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高文敏（克林）任校政治部组织科长兼党总支书记，刘志丹任政治教官。校址设在西安北院门。

许权中任军校总队长，负责讲授军事理论和战术训练工作。他要求学员不仅要掌握军事理论，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调查研究，掌握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亲自做示范，带学员一起训练，深受学员爱戴。在党的领导下，中山军事学校办得非常出色，时称“西北黄埔”，为我党培养了许多军政干部。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蒋、冯合作前夕，冯玉祥想拉许权中跟他走，离开陕西出潼关的前一天，特地设宴招待许权中，表示要与许合作共事。宴后，冯玉祥

又单独把许权中拉到自己的卧室，悄悄地讲：“我要率部东征了，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带部队随我一起东征。我要去闯更大的事业了。”许权中当然很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又不能当面闹翻，便托言母亲病重，要求回家看看。冯玉祥未生疑心，答应了他的请求。许权中回来之后，立即向党组织和史可轩同志汇报了此情况。可轩同志认为此举来意不善，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不测，不久即带领部队脱离了公开反共的冯玉祥。

“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陕西省党部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均被解散，各个群众团体被迫停止活动，苏联顾问也被迫离开了陕西。在西安成立了以石敬亭、井岳秀为头子的陕西省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全省开始清党。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以后，公开发表了反共三原则，要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同时不许担任军职。冯玉祥过去同情革命，了解国民军和中山军事学校的情况，因此令各部队的政治部主任离开部队，命令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离开西安，火速开赴河南前线，想扼杀革命力量。

七月下旬，史可轩、许权中率部经西安以北十五公里草滩渡口乘船东下。部队到临潼县交口镇的第二天，陕西省委派崔孟博同志送来指示：把部队拉到陕北去独立发展，或想办法在渭河以北扎下根，“找主求生”，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但史可轩同志在争取国民一军的旅长田生春时惨遭杀害，使保存这支部队更加困难。高克林和任耕三（二营营长）派人找回许权中，推举他任总指挥。许权中召集了干部会议，他说：“要坚决保住部队，为老师长报仇。目前情况下，再去黄龙山已不可能了，要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保住部队。”会后，部队向南行进到康桥。军阀冯子明

想乘机改编许旅，扩大自己的势力。派人到许部来联系收编事情。许权中经与高克林、杨晓初磋商，决定将计就计，暂时归附冯子明。但提出三个条件：一、给部队番号，部队归许直接指挥；二、为史师长报仇事不得干涉；三、部驻防关山镇。冯子明对这支部队早已垂涎三尺，急于收编，立即答应了许权中的三个条件。许部被编为补充旅，许权中任旅长，部队进驻了军事要地——关山镇。

到达关山镇后，高克林同志去西安向省委组织部长代书记李子洲同志请示工作，省委决定许旅在行政领导和党的组织关系上直属省委，并在部队建立秘密党委，高克林任党委书记，委员有许权中、高克林、杨晓初、张汉俊、高志凯(后叛变)。

党委成立后，紧接着整编部队。全旅编为两个步兵营，一个机炮营，一个手枪队，原中山军事学校学员编为教导营(营长高志凯，副营长张汉俊，高克林兼教导员)。经地方党介绍，部队吸收了一部分当时在地方难以立足的党员，因而党的力量也加强了。另外还收编了蒲城原上下来的近两百人的“土匪”部队，充实到各营。部队不仅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力量还有扩大。

收编这股土匪时，许权中表现出惊人的胆略。我当时在手枪队，跟随他一起去收编。他仅带了一名警卫员到约定地点去等候他们。这些人虽久慕许权中之名，同意谈判，但戒心很大，怕搞掉他们，来的十几个人个个都是刀出鞘弹上膛，张开机头的驳壳枪提在手里，稍不慎，许权中的生命就很难保证。但他泰然自若地说：“欢迎各位到来”，挥手请坐。来人将周围仔细观察一番，见并无伏兵之状，才坐下来谈判。许权中象拉家常一样问他们的身世、遭遇，今后作何打算？还向他们指出前途和方向，然

后说：“你们愿合作革命则留，我们共同杀出一个新社会来。不愿合作则去，我不强求。但是你们不要上当受骗，跟着军阀不会有什么前途的。”这些“土匪”首领被许权中一席深明大义的谈话深深感动了。当即命令随行人员收起武器，退了出去；表示愿意听从许旅长的命令，服从改编，参加革命部队。这些人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和少量进步青年，生活无路，结伙为“匪”，劫富济贫。其中杨锡民，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当了连长。

冯子明收编许旅，主要看到许部有较好的武器，英勇善战，想为己所用，当他逐渐看清许的面目，便四次密谋暗杀许权中，但都被高度警惕、机智果敢的权中老同志识破粉碎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冯玉祥、宋哲元为把驻在陕西的国民联军原国民二军和所有驻陕杂牌军赶出去，委任岳西峰为总司令率领杂牌军到襄、樊一带整训。当许部经高陵时，许权中的老朋友、体弱多病的惠先锋旅长送给许权中两个营的部队，地方党组织在三原县渭北中学和其他中学动员了一批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军入许旅。对许旅的进一步扩大，冯子明深感不安。他派特务监视许权中的行动，并命令赵杰三秘密干掉许权中。赵杰三是个十分讲义气的旧军人，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吴佩孚的军队包围，幸经许权中率部救援才得以脱险。赵杰三不愿恩将仇报。一天夜里，赵杰三支走侍卫人员，对许权中、杨晓初等同志说：“冯子明要我暗地里收拾你们。”并把冯子明的密谋透露给许权中，要他一走了事。许权中十分感谢赵杰三，连夜带领部队渡过渭河开往兰田方向。冯子明的阴谋没有得逞。其实许权中平时对冯一直是很警惕的。为了防备暗算，从手枪队抽调了十五名战士加强保卫工作，我也是被调到他身边的警卫战士之一。

当我们行至兰田县徐家庙时，冯子明又暗中勾结许旅的参谋主任惠介如（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参谋长韩威西煽动兵变，利诱连长杨锡民、徐裴威暗杀许权中。共产党员杨锡民立即报告了许权中。许逮捕了惠介如，搜出蒋介石给他的“西北宣慰使”委任状，并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了惠介如破坏这支革命武装的罪行，枪毙了惠介如，解除了韩威西的武装，撤了他参谋长的职务。

当冯子明得到韩威西的报告后，恼羞成怒，发誓要武力消灭许旅；却被许权中巧施计谋，袭击了前卫司令部。冯军丢盔卸甲，在一片慌乱之中后退十八里。

与冯子明决裂后，许权中提出利用冯子明、李虎臣的矛盾，暂时归属李虎臣。经许权中的老上级、李虎臣部第三师师长刘文伯介绍，许旅编为李部新编第三旅，驻扎在洛南县三要司（黄村镇）。

三要司地处豫、陕边界，东临河南山区，北靠秦岭；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便于我军休整和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许旅进驻三要司之后，立即整军反霸，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一九二八年春，陕西省委先后派许多同志到许旅工作，其中唐澍任参谋长，廉益民（芦少亭）任旅政治部主任，刘志丹任许旅参谋主任，谢子长（浩如）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周益三任营特派员兼连长。唐、刘、廉、谢等参加了旅党委领导。新党委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扩编，再次动员渭华一带进步青年参军，撤换了一些不可靠的军官。部队到豫、陕边界剿匪，为民除害扩大政治影响。同时，还为陕东特委训练了一批军政骨干，拨出枪支扩大与加强陕东特委领导的地方武装。

三要司地区的农民异常穷困，即是丰年也缺衣少食。李虎臣

下令许旅就地征粮，旅党委决定派出干部协助地方党恢复农民协会，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韩老虎、黑蝎子、何豹子等人。这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农民群众纷纷起来，刨挖地主豪绅窖藏的粮食。许旅将这些粮食除供应部队外，救济揭不开锅的农民度荒。

地主豪绅向来是骑在农民头上的，许旅的行动，在他们看来简直翻了天。地主豪绅去许旅告状不成，就到李虎臣那里告状说：“许旅闹共产。”于是，李虎臣要召见许权中。旅党委鉴于史可轩的教训，不同意许权中去。杨晓初也自告奋勇要替许权中去应付一下。许权中考虑再三说：“还是我自己去为好，我不去，李虎臣会疑上加疑，这反而会坏事，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党。”他仔细分析了李虎臣这个人的特点，相信自己能对付得了。旅党委为了许权中的安全，特意带一批粮食给李虎臣，并在各营抽调营连干部着便服潜同前往打听消息，在防地作了周密的布置，以防万一。

李虎臣一见许权中就大发雷霆，许权中十分镇定地解释：“我们国民革命军闹的是工农革命，怎么是闹共产呢？他们纯粹瞎说。军队要吃粮，民众没有，不找地主豪绅，叫谁给粮食吃？”李虎臣部队也严重缺粮，他见许权中带去许多粮食，就说：“闹工农革命你闹去，可不要闹共产。”从李虎臣那里回来，许权中就枪毙了告状的地主豪绅，更加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我党八七会议决定用革命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相继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共陕西省委继领导“清涧起义”失败后，又决定发动以渭南、华县为中心的“渭华起义”。

一九二八年三月，省委指示许旅准备起义。四月底，冯玉祥和李虎臣开战。旅党委大多数人同意省委指示——不参与冯、李混战，同时决定利用机会越秦岭举行起义。许权中同志不同意省委和旅党委的意见，他认为起义条件还不成熟。冯玉祥已公开追随蒋介石，应该先参加讨冯战争，乘机扩大地盘，壮大力量。然后，联合与我军关系密切的部队进军陕北，开展革命斗争。陕北地势复杂，敌人力量薄弱，我军容易站稳脚跟。而渭华地处西安、潼关一带，在敌人重要补给线上，驻有重兵，我军无回旋余地，很难成功。杨晓初赞成许权中的意见。高克林认为许的分析有道理，但必须服从省委的决定。许权中出于对党和部队的责任感，坚持自己的意见，特地派雷天祥带一个连先去高塘塬，找陕东特委汇报他的意见，等待省委的最后决定。

省委决定按原计划起义，命令部队迅速开赴高塘塬。许权中和杨晓初、张汉泉到前沿阵地勘察地形未归，刘志丹、唐澍、高克林就带领部队向华县瓜坡集中。许等从前沿回来，发现部队已经走了。他立即带领身边人员追赶部队。当我们赶到高塘塬之后，便参加部队的起义。

许权中因持不同意见，部队党委要开除他的党籍，高克林、杨晓初同志也受了党纪处分。所幸后来省委并未同意。

五月十四日，党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革命军的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委员有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王太吉、廉益民、高克林、谢子长、杨晓初、吴浩然、许尚志等同志。唐澍任总指挥，刘继曾以陕东特委书记兼任党代表，许权中任军事总顾问，王太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高克林任参谋主任，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军党委委员有：刘志丹、唐

澍，王太吉、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等。熟悉部队情况的原旅党委成员高克林、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均未能参加军党委领导。总司令部下设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和一个骑兵分队，许权中兼骑兵分队长。

许权中、高克林、杨晓初因为对起义有不同意见几乎受到处分。然而，他们都有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荡的胸怀，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决定，满怀热情投入渭华起义。

许权中在崇凝、塔山一带指挥着四大队、骑兵分队和陕东赤卫队，配合农民协会，建立了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渭华起义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李虎臣和冯玉祥的混战一结束，他们就急忙联合起来围剿我工农革命军，企图消灭这支革命武装。

六月上旬，革命军接连两次打退敌人围攻，但我军依然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刘志丹同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认真考虑了权中同志起义前的意见，决定转移到陕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行动中，许权中指挥四大队和陕东赤卫队。

六月十九日，宋哲元以三个师的兵力，分东、中、西三路疯狂向我扑来，原计划撤向陕北的道路被切断，军委决定立即转入南山商洛一带。部队刚刚开始行动，就和敌军遭遇。激战竟日，起义部队伤亡惨重，刘志丹率余部奋力突出重围。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在反革命的重重围剿下淹没在血泊之中，西北的革命形势一时转入低潮。

起义失败后，部队开到张家坪集中。这时才知道唐澍、廉益民、吴浩然、李大德、薛自爽等同志都壮烈牺牲了。部队也只剩下三百多人。陕西省委决定暂时收起红旗，待机再干。身份公开

的党员同志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余下的部队由许权中、刘继曾指挥，要求他们通过个人关系，开展统一战线，设法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处此危难之际，许权中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他通过李虎臣部第三师师长刘文伯的关系，编为刘部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刘继曾同志仍任（秘密）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许旅随刘文伯进入河南邓县，不幸遭到邓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暗算，全师被迫缴械。渭华起义失败后，辛辛苦苦保存下来的一点力量失散了，许权中痛心疾首。战斗中许权中颈部负伤，在同志们掩护下到朋友许子修家养伤。

一九二八年秋，权中同志接到党中央的通知，经武汉到上海详细汇报了渭华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原因。党中央派他到苏联去学习。他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后转入红军大学。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努力钻研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联系自己的经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结识了叶剑英、张仲实、方仲儒等同志，常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与苏军伏龙芝元帅交往也甚厚。

一九三〇年夏，许权中回到祖国。党派他到北方军委工作，化名徐广斌，由于顺直省委遭破坏和叛徒出卖，他刚刚到天津不久，就被捕入狱。许权中在狱中被敌人打得血肉模糊，但从不吭声，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经党组织营救，加上友人刘文伯、米哲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在经济上的援助，一九三二年获得释放。许权中出狱之后就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

一九三三年春，党派柯庆施、胡子康、吉鸿昌、许权中、宣侠父、吴化之诸同志前往察哈尔，与冯玉祥、方振武将军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双方同意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五月二十六日，同盟

军成立,冯玉祥、方振武分别任正副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我党组建了前敌委员会,许权中为常委、并任副军长兼十八师师长。他通过王炳南同志的关系,得到杨虎城将军的帮助,很快组成一个团。阎红彦、刘镇远等同志也从孙殿英部拉出一部分人编成十八师第二团。

部队在向绥远、商都转移途中,十八师扩编为第七军。刘镇远为军长,许权中任副军长兼十八师师长。刘镇远在任职资历、作战经验、个人威信等方面都不如许权中,但是许以抗日大局为重,处处尊重刘镇远同志,主动辅佐他,使七军、十八师上下团结得很好,成了抗日同盟军的一支劲旅。

同盟军对日宣战以后,许权中协助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拟定了对日作战方案。一举把日寇赶出察哈尔省全境,同盟军声威大振。

正当同盟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时候,蒋介石背后插一刀,勾结日寇,破坏同盟军抗日,冯玉祥被迫下野。

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我随许权中同志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许权中和吉鸿昌一起联系国民党原军长任应岐秘密组织抗日武装。一九三四年夏,通过任的关系,我随许权中到河南漯河收编部队,组建抗日武装。因事未竟,返回天津。不久,吉鸿昌同志和任应岐先生在天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许权中和我都先后离开了天津。许权中化名杨鉴到陕西韩城农村以小学教员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我到陕北苏区工作,没想到这次分离,竟成了我与他的永别。

一九三六年,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抗日运动蓬勃兴起,西北军和东北军内的抗日情绪与日俱增。西安事变前,许权中

应杨虎城将军的邀请，出任杨部警备二旅副旅长。十二月十二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许权中奉杨虎城之命率领总部特务营(营长是共产党员宋文梅同志)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里面的全部国民党军政大员。他们中有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张冲、蒋作宾、蒋方震、邵元冲等。后邵元冲因企图逃跑被击毙。这时，蒋介石已被抓住，而警备旅攻打西大街警察局公安总队及宪兵二团仍在负隅顽抗。杨虎城为迅速安定西安秩序，命许权中率总部特务营前往增援攻打。许权中指挥部队仅半小时就歼灭了敌人。至此，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武装全被杨虎城部队解除。许权中在西安事变中立下了大功，事变和平解决后，习仲勋、高克林同志曾向党中央、朱总司令推荐许权中，说他有勇有谋，具有很好军事指挥才能和作战经验，希望中央调许权中到延安去。许权中觉得自己在西北军中关系较多，便于开展统战工作，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去延安大一些，请求继续留在杨部工作。周恩来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同意许权中留在杨虎城部工作，并要李克农同志从华北局把许权中同志的组织关系转到陕西，交给许旅担任党的工作的汪锋同志。后杨虎城将军任命许权中为五二九旅旅长。

芦沟桥事变后，许旅请缨抗敌，开赴抗日前线，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十月，忻口战事紧急，许旅奉命增援。这一仗五二九旅将士同日寇精锐部队板垣师团血战十四昼夜，许权中亲自指挥冲杀，始终战斗在火线上。十月二十六日，日寇一发炮弹在许权中身边爆炸，他被震得昏了过去。醒来后，他拣起身边一块一尺多长的弹壳，题字于上：“落于吾右，而未使吾成仁，岂其留我以救国耶。抗战将四月，失地犹未还，吾知勉之”。

许旅在一千五百多米的的前沿阵地上歼灭日寇一千余人，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仍不能越许旅防线一步，使日寇板垣师团大为震惊。国民党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对战地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自许旅增援上来之后，局势转危为安”，深深敬佩许权中的勇敢和才能。

然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许旅不但不给嘉奖，不给补充，反而撤了许权中的旅长。鉴于此种情况，党组织决定由阎揆要派人护送权中到晋南组织抗日自卫军，他又浴血奋战在晋南抗日战场上。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许权中同志的处境多数时间是十分困难的。他始终以抗日大局为重，坚定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救国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留在杨虎城部工作后，许权中以杨虎城部九十六军万家原垦区主任的名义做掩护，组织了武装齐全的两个连队。由于许权中同志是著名的共产党员，积极抗日的战将，所以敌人总想下毒手谋害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他赴干阳查看地形，布置工作后返回垦区，途经眉县槐芽洪水沟时，被胡宗南指使的陕西省保安处长徐经济、保安大队长崔镇山下毒手将他暗杀。同时遇难的还有渭华起义前许旅六团团长任耕三同志和警卫员刘兴坤同志。

许权中同志遇害之后，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把他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和薪俸办起来的“民生小学”改名为“权中小学”。他的家乡也改名为“权中乡”。

权中同志牺牲后，党和人民牢记着他的功绩，怀念着这位历经坎坷而其志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曾询问：“为什么不早把许权中调到延安？”还对童陆生（许权中在云南讲武堂韶关

分校同学。曾任五二九旅参谋长)说过:许权中同志死了很可惜,他们(指反动派)抵不过他,如果调回延安就没事了。周恩来同志也十分感慨地对张归仁同志说:“如果许权中能早回延安,不会被敌暗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在权中同志牺牲六周年之际,西安、三原和临潼地区党、政、军民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表彰他的功绩,怀念这位革命先烈。他的四子二女,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小儿子许共和被习仲勋同志抚养成人,读到大学毕业。

我是跟随权中同志多年的一个老战士,听到他遇害的消息时悲痛欲绝。每当我想起他,心情总是激动不已。他的名字、思想、品德和情操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一九八三年四月)

阿金在舟山

——金维映同志早期革命斗争事略

车 鸿 云

金维映，即著名的阿金同志，又名金爱卿，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四日诞生在浙江岱山高亭镇。大革命时期，她在家乡舟山参与领导和发动了工、农、盐、渔民运动，参与建立了舟山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是舟山地区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金维映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出狱后，金维映转移到上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这期间，金维映组织发动了上海一〇四家丝厂的罢工斗争。一九三一年，金维映去瑞金中央苏区任江西省于都县、胜利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秋调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一九三四年兼任中央军委动员部副部长。一九三四年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她是仅有的三十位女同志之一。长征中金维映在中央纵队（红章纵队）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她任中央组织科长。一九三七年初，金维映任抗大女生大队政治助理员，后调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三八年春同蔡畅同志一道去苏联学习和治病。一

九四〇年病逝于莫斯科郊区，时年三十六岁。本文介绍的是她的早期活动。

金维映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廿七日）出生在浙江岱山县高亭镇。全家靠父亲金荣桂开的米店维持生活。母亲虞阿英是个心地善良、勤劳朴素的农妇。

金维映四岁那年，舟山发生了灾荒。金荣桂开的米店被迫关了门。为了谋生，他扶着年迈的父母，带着一家人从高亭来到定海。在朋友们的救济帮助下，一家老小六口在定海落了脚。不久他经人介绍在一家私人招待所里当了帐房。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革命风暴波及全国各地。这时金维映正在定海女子学校读书。她在校里学习认真，爱唱歌能演戏，还能宣传讲演，同学、老师、以至沈锐娟校长（沈毅）都十分喜欢她。五四运动象春风一样吹到了舟山，市民们奔走相告，学生们情绪高涨。金维映和定海中学的学生组织了演讲队，上街宣传，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

五四运动后，舟山的学生、知识分子中开始流传《新青年》、《新中国》和《新女性》等刊物。金维映从这些书刊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找到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找到自己的道路。

女校沈毅校长是位进步人士，金维映毕业后，被她留在女校任教。

一九二五年六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定海，引起舟山各界民众极大愤慨。金维映在沈校长帮助下，首先发动组织师生在校集会响应上海各界人民的爱国行动，并联络各校师生成立学生会举行罢课集会。她还带领学生上街演讲，唤醒民众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在她的推动提议下，学生会决定：

1. 立即罢课数天；
2. 建议本埠各机关团体，成立筹备委员会采取联合行动；
3. 立即开展宣传活动；
4. 组织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
5. 各校毕业生提前考试，将多余饭菜金一律捐献；
6. 全体住宿生于第二天开始一律素餐，把节省下来的经费作为捐献金。

在金维映的发动和学生会的宣传推动下，舟山的工人、职员、店员、商人也联合举行了罢工罢市，一时声势浩大。金维映率领学生到沈家门和岱山两地去宣传演讲，组织募捐。在她的发动下，沈家门和岱山两地的工人发动起来了，商人也开始抵制英、日货，声援工人和学生罢工罢课。学生会与宁波、上海的学联取得联系，宁波、上海的学联派来代表到舟山宣传和推动运动的发展，这次斗争坚持将近一个月。

一九二六年七月的北伐战争推动着全国革命新形势的到来。中共宁波地委先后派共产党人赵济猛、邬凤英、顾我、胡焦琴等同志来定海，在定海女校沈毅处落脚，担任教师，着手建立定海党的组织。金维映在自己房中让出一张床给胡焦琴（四·一二政变时被反动派在宁波杀害）住。她俩一见如故，亲同姐妹，胡焦琴把自己带来的《共产党宣言》和《湘江评论》拿给金维映看。晚上金又到邬凤英的宿舍里，听她讲大革命的形势和北伐革命胜利的消息。

一九二六年十月，经邬凤英、王士宪两同志介绍，金维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动开展舟山的革命运动，维映从女校的讲台走向社会，投身工人、妇女的解放运动。

鸦片战争后，随着航运、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定海已有相当数量的航运码头工人、产业工人、店员、手工业工人。一九二六年底，党决定金维映到定海最大的万润锅厂，帮助工友们成立工会。她首先在万润锅厂开办了舟山第一所工人夜校，每天晚上给工人讲课。在她的宣传教育下，一批先进的工人积极分子成长起来，并建立了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万润锅厂成立了舟山第一个工人协会，并带动了定海其他各行业，如：搬运工人、国药、酱园、南货、服务等行业也先后成立了工会和伙友联合会。

经过我党在舟山的勤奋工作，一九二七年二月，定海成立了总工会。总工会在定海公园召开，工人、学生、妇女等团体代表二千多人把整个公园都挤满了。共产党人顾我、邬凤英在主席台上讲话，金维映教大家唱《国际歌》，宣讲大革命的形势。

一九二七年春，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舟山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场斗争，就是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金维映被工人们推选为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对总工会执行委员提出的五项要求，资本家没有完全答应。代表们向金维映汇报了斗争情况，维映听后不顾自己正在生病，立即赶到谈判地点义正词严地向资方代表声明：“如资本家不全部同意工友们所提五条要求，那么我们退出谈判，举行总罢工！”工会执行委员代表在金维映的带领下回到总工会开会，决定第二天举行全体工人、学生会、妇女界的总罢工和大游行。

第二天金维映带领工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并和工人一道不时高唱《打倒列强》。游行后，全面举行总罢工，店员工人也参加了罢市。资本家一见工人罢工罢市着急了，被迫答应工人所提

出的全部条件。党领导的这次罢工斗争胜利了！

一九二七年春，舟山地下党决定到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的盐民居住区发动盐民斗争。

中共宁波地委首先派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顾我同志去岱山开展工作。舟山党组织接着派金维映去岱山组织盐民斗争，协助顾我同志工作。

当时岱山盐民受封建势力和地主豪绅的压迫很深，思想被禁锢。金维映到岱山岛后，立刻奔到盐民居住区，只身住在祠堂内，向盐民进行宣传，不久盐民就把她当自己家里人一样了，亲切地称她“阿金”。

经过金维映的艰苦工作，岱山盐民协会第一个分会在茶前山成立了。接着整个岱山岛上成立了十个分会。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岱山盐民协会成立了，到会的有一万余人。金维映心情十分激动，教大家唱国民革命歌曲，领队高呼口号。会后举行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

岱山盐民组织起来后取得了提高盐价、提高工资斗争的初步胜利。接着又召开斗争土豪劣绅大会。斗争了劣绅刘敬律和土豪祝元伦。会后盐民协会给刘、祝两个土豪劣绅背上插了小旗，用绳索牵着游了村。这次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威风。

巨山岛和岱山岛只隔一港。岱山岛轰轰烈烈的盐民运动对巨山岛影响极大，巨山盐民推派代表来向金维映、顾我等同志请示，要求组织起来。

舟山地下党决定金维映和顾我一道去巨山搞盐民运动。当时巨山岛的旧政权只有一个武装警察所，如能控制警察所，活动就方便了。于是他们便对警士们开展工作。伪警察所长顾玉坚被迫

表示不干涉金维映等人的工作，所以工作开展得很顺利。盐民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盐民分会。盐民组织后，首先要求提高盐价，降低盐税。释放局早已闻得岱山盐民运动的消息，立即答应了巨山盐民提出的条件。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巨山盐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盐民们高举盐民协会的大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来。顾我讲话后，金维映以共产党人身份上台演讲，组织盐民斗争了大土豪毛椒卿。巨山岛的盐民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金维映同志为了舟山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苦的努力，舟山人民将永远纪念她！

（一九八三年六月）